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魏晉南北朝的諧趣風尚

The Trend of Xiequ during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李瑞芬

Lee Rui Fen

指導教授：張蓓蓓教授

Professor Chang Pei-pei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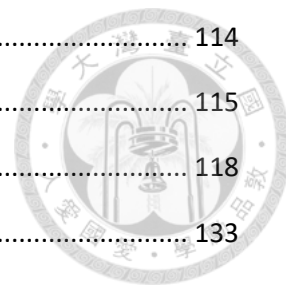
July 2019

目次




目次.....	a
論文摘要.....	i
Abstract	ii
前言.....	1
第一章 西方幽默理論簡介.....	3
第一節 優越理論.....	3
第二節 解放理論.....	5
第三節 不協調理論.....	7
第四節 小結.....	9
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的諧趣理論及其檢討.....	11
第一節 《文心雕龍·諧謔篇》的內容意涵以及諧趣的目的.....	11
第二節 何謂「諧趣」？.....	23
第三節 諧趣的結構.....	27
第四節 小結.....	32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文人作品的諧趣表現.....	35
第一節 傳統文體的新內容.....	35
一、 九錫文.....	37
二、 檄移.....	44
三、 表.....	52
四、 設論.....	55
第二節 附和流俗的新書寫.....	77
一、 「不怕低俗」的題材與筆法.....	78
二、 「不顧禮貌」的筆法.....	86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諧作的綜合分析.....	100
第四節 小結.....	110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文人生活的諧趣表現.....	113

第一節 俯拾即是的生活諧趣.....	114
一、 童言童趣.....	115
二、 社交場合的諧趣.....	118
三、 關於認同的諧趣.....	133
四、 形成輿論的諧趣.....	137
第二節 以諧趣濟世助人.....	142
一、 傳統諧趣在當代的轉化.....	143
二、 人物典範——謝安.....	148
第三節 以諧趣安頓自我.....	158
一、 以任誕求存的轉化.....	159
二、 人物典範——陶淵明.....	161
第四節 小結.....	171
第五章 結語.....	175
參考文獻.....	181
圖目錄.....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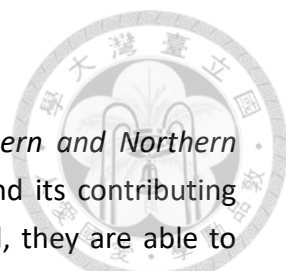
論文摘要



《魏晉南北朝的諧趣風尚》旨在發掘這個時代所展現的諧趣現象以及形成這些現象的深層原因。由於西方的幽默理論畢竟成形已久，可供借鑑之處甚多，因此本論文先爬梳西方三大幽默理論——優越理論、解放理論、不協調理論，其中因不協調理論對幽默的論述最全面，所以也是本論文主要的討論依據。《文心雕龍·諧隱篇》是中國最早的諧趣論述，劉勰把諧趣的三種主要的目的——諷諫他人、自娛娛人、諷刺他人——分成上中下等。然而這個時代還有一種諧趣目的是劉氏未提及的，即以荒誕狀示人，以消弭他人的覬覦。在四種諧趣當中，以自娛娛人以及諷刺他人的諧趣最為常見。在觀察當代的諧趣風尚之時，本論文將諧作及情景諧趣分述處理。在諧作的表現上，時人於傳統文體注入有別於過去注重體式及體面的新內容，藉由虛幻的人物及天馬行空的情節，針砭時事。同時，他們不吝以「不怕低俗」的題材與筆法書寫鄙俗的事物，以及「不顧禮貌」的態度主動頂撞他人。在情景諧趣的表現上，諧趣點綴時人的生活品味及各種社交場合。諧趣也大量用在輿論當中，出於道德公心，時人將評論濃縮成一句話或一段順口溜去譏刺某人某事或某種荒唐的現象。諷諫他人的諧趣在這個時代嚴重式微，僅有謝安為其中的典範人物。以荒誕狀示人的諧趣在魏末晉初最為鼎盛，竹林名士的阮籍與劉伶即代表人物，後代的陶淵明已無前二人如此激烈的言行。這個時代的諧趣如此盛行，主要歸因於儒家思想退出主流地位，由道家精神取而代之。道家中的「兩極」概念突顯各種不協調與矛盾，與諧趣的運作不謀而合。同時菁英權貴的篡奪謀算與道德典範相衝突，於是時人貢獻的對象從君王國家轉向家族門第，成就自我變成人生的第一目標。如此的政治、思潮與社會的氛圍激發諧趣的流行，從而構築一空前壯觀的諧趣風尚。

關鍵字：諧趣、魏晉南北朝、不協調理論、諧趣目的、兩極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e Trend of Xiequ during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to explore the *xiequ* phenomenon during this era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As the western humor theories is already well developed,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much reference to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As such, this dissertation first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ree major humor theories—the Superiority Theory, the Relief Theory and the Incongruity Theory. Of which, the Incongruity Theory provides the most holistic view on humor, it therefore serves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 chapter regarding *xiequ* in *Wen-Xin Diao Lung* is the earliest Chines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xiequ*. Liu Xie graded the three objectives of *xiequ*—admonishing, entertaining and mocking, in terms of their morality.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objective of *xiequ* which Liu Xie had not mentioned, that is adopting a conduct of ridiculosity to repel coveters. Among four purposes of *xiequ*, entertaining and mocking are most common. As for observing the trend of *xiequ*,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literary essays of *xiequ* and situational dialogues respectively. For literary essays, the authors of the era introduced new content that no longer emphasized on format and propriety, into traditional genres that suggested otherwise. It was done so via imaginary characters and fanciful plots to lay criticism on current affairs. In the meantime, the authors also were more than willing to take on distasteful topics and techniques. They were almost too keen to disregard propriety and offend others. For situational dialogues, *xiequ* enhanced portrayal of personal tastes and social events. *Xiequ* was also evident in public opinion. Due to moral compulsion, the public opinion was usually shaped as brief comments or doggerels to mock certain people, events and phenomena. *Xiequ* with an admonishing purpose was in decline in this era. Xie An is the only exemplary figure in this regard. *Xiequ* where one adopting a conduct of ridiculosity reached pinnacle during the end of Wei and the beginning of Jin, in which Ruan Ji and Liu Ling of the Seven Sages of Bamboo Grove were the most iconic figures in this regard. Tao Yuan Ming from a later period no longer had the same intensity as Ruan and Liu. The popularity of *xiequ* during this era could mainly be attributed to the diminishing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s the domineering zeitgeist and its position was taken over by Taoism. The concept of dualism in Taoism underscored various incongruity and contradiction,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mechanism of *xiequ*. In the meantime, the era had seen the clashes between the true color of numerous usurpers and moral values. As such, many had diverted their service toward the country to their families and clans instead. The portrayal of one's talents became the top life goal for many. The popularity of *xiequ* was heightened by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limate, as well as the shift in zeitgeist, and thus a sublime trend of

xiequ was formed during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Keyword: *xiequ*,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congruity Theory, objective of *xiequ*, duality



前言



西方先哲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注意到「幽默」，探討其本質問題，對這項議題的討論從未間斷。中國古代則要晚至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諧隱》才出現一套比較完整的諧趣論述。然而在劉勰以前，諧趣也是存在的，只不過沒有特別獲得重視。《論語》中，孔夫子與學生及友人之間的談話往往有詼諧的元素，讓人莞爾；《孟子》有不少的寓言，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驕其妻妾等，皆屬諧趣故事；《莊子》在這方面更是翹楚，詼諧的寓言比比皆是。到了西漢時代，太史公撰寫〈滑稽列傳〉，開創後人均認可為中國古代最正宗的諧趣，具有最獨特的標的及風格——以諧趣行諷諫事。能夠運用諧趣或幽默諷諫人君，這一作為後來蔚然成風，成為一項被人稱道的行徑，放眼全世界，大抵主要出現在中國古代。然而，諧趣言行大迸發的時代在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出現大量諧作，諧趣也佔據了時人的往來交際，成為社交的重要內容。

儘管如此，〈諧謔篇〉對此期的諧趣反而不以為然，盡是貶詞。〈諧謔篇〉序列先秦時代的諧趣人物、太史公〈滑稽列傳〉的眼光、東方朔與枚皋等武帝時代諧趣的質變，以及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墮落。然而，魏晉南北朝的諧趣之精彩及獨到之處其實值得進一步深究。本文擬探索此期對諧趣的運用，觀察諧趣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時人所展現的諧趣風尚。本文將於第一章回顧西方三大主要的幽默理論——優越理論、解放理論、不協調理論。第二章將分析〈諧謔篇〉的諧趣理論，以及由此勾勒諧趣的目的、定義與結構；第三章與第四章則將分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諧作與情景中的諧趣。第三章將分析此期重要的諧作，試圖歸納時人在文體、題材與筆法上的突破，並且追溯時人諧趣表現的緣由。第四章則將梳理史籍與小說記載的諧趣，這些諧趣通常以情景與對話的形式出現，本章將檢視時人如何運用諧趣，以及當時各種諧趣現象。第五章則為結語。

(空白頁)



第一章 西方幽默理論簡介




西方對於「幽默」的研究由來已久。據《牛津字典》，行為、話語或著述可引起樂趣(amusement)的特質即為「幽默」。西方幽默研究學者約翰墨瑞爾(John Morreall)根據這項定義，以為探索何謂幽默之際，必須區分「樂趣」與「發笑」，前者為一心理狀態，後者則為生理反應，而且並非所有生理的發笑皆由樂趣所引起。西方三個幽默的古典理論即環繞於「何謂幽默」、「何謂發笑」以及「兩者有何關係」三個主要的問題之上。這三個古典理論分別為優越理論(Superiority Theory)、解放理論(Relief Theory)、不協調理論(Incongruity Theory)。¹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優越理論

主張優越理論的有許多著名的哲學家，包括甚早期的柏拉圖(Plato, 428-348 B.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48-322 B.C)、西賽羅(Cicero, 106 B.C-43 B.C)以及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迪卡斯(Decartes, 1596-1650)。這派的理論主要認為諧趣來自對他人的優越感，主體從貶損譏笑他人的醜態或失態中獲得樂趣，因為從他人的失誤中，主體的尊嚴可以獲得強化，產生自己更為優越的良好感覺。因此，幽默是負面的產物。這派理論主宰西方的幽默逾二千年。

且看柏拉圖於〈斐萊布篇〉記載蘇格拉底與普羅塔庫的一段對話。在此對話中，蘇格拉底列舉人之不自量力，必以三種方式呈現：第一，高估自己財富；第二，高估自己的外表；第三，高估自己的智慧。這些無知的行徑實屬一種惡。蘇格拉底進一步把擁有這些錯覺的人分為强悍或位高權重的人以及弱勢或卑微的人，以為有能力對恥笑他們的對象進行報復的前者「可怕」或「可恨」；無力進

¹ Morreall, John. *The Philosophy of Laughter and Humo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頁 4-5。



行報復的後者「可笑」。既然無知乃是一種壞事，嘲笑無知則是快樂的，「但若我們在我們的朋友那裡發現這些錯覺，我們還要不要堅持我前面的說法，亦即它是可笑的呢？」蘇格拉底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論證的結果是：「當我們嘲笑我們朋友的那些可笑的事情時，我們這時候混雜著心懷惡意，也就是說我們的快樂與痛苦是混雜的，因為我們前面同意過，心懷惡意是靈魂的痛苦，嘲笑是一種快樂，二者在這種情況下同時出現。」²柏拉圖視嘲笑為一快樂卻經常心存惡意的行為，嘲笑的對象無分親疏，嘲笑的議題為基於無知而出現的醜態。亞里斯多德也持相同立場：「喜劇為下品性格之模倣，前既言之，第所謂下品，非即云惡，蓋『滑稽』特醜之一種。滑稽之成分為缺憾，而不含苦痛或毀傷之情。其顯例即滑稽面具，雖醜惡扭戾，惟不心含苦痛。」³由此可見，古希臘諸賢多視幽默、喜劇為嘲謔無知、下品的醜態而獲得樂趣之物而已。湯瑪斯·霍布斯更為直白，把「笑」歸為個人為了膨脹自我的幸災樂禍：「驟發之自榮，則成為笑。笑或由己之忽不期而有所獲，或見人有所缺陷，反襯自己之完美。此第二類之笑於寡鮮能力之輩為最甚。彼蓋無可自榮，只得以人之不榮而自悅。故常笑人者，即為怯懦之徵。至於大人物，則見人之不能，非特不笑，而常思所以助之；斷不以人之所不能自比，而惟以人之極能者自期耳。」⁴簡而言之，各個主張優越理論的論述皆視幽默為一項透過幸災樂禍而滿足自我的卑鄙行為。

優越理論雖然馳騁二千多年，如今卻已遭到學界的挑戰與反駁，以為此理論所能解釋的幽默現象過於狹隘。主張解放理論的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則以為羞辱他人亦可引發主體各種情緒，並不止於使主體發笑，而且許多產生幽默的狀況並不涉及個人的尊嚴。最重要的是，優越理論僅序陳發笑的

² [古希臘]柏拉圖著，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三卷，頁234-237。

³ 亞里斯多德著，傅東華譯：《詩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2月)，頁19。

⁴ 霍布士著，朱敏章譯：《利維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一冊，頁34。

條件而已，未解釋在這些條件下，主體經歷的奇特運動或活動。⁵這也是史賓賽企圖以解放理論解答的問題，下節將有討論。晚近學者麥克·克拉克 (Michael Clark) 序列優越理論無法解釋的幽默現象，包括童趣的滑稽行徑引人發笑並非因為吾人對孩童倍感優越；帶有色情的影射性幽默也並非對某個對象抱持某種幸災樂禍；因雙關語 (pun) 或文字遊戲 (wordplay) 而產生的滑稽亦非嘲笑任何對象的缺陷。⁶克拉克的論述正好可以補充史賓賽的論述，同時也佐證了優越理論無法全然解釋所有幽默情況的特點。

儘管優越理論可以解釋的幽默現象有限，然而在於惡意取笑他人的情況中，優越理論的確有可參照之處。

第二節 解放理論

主張解放理論的專家不是純粹的哲學理論家，他們往往有一定的醫學背景，諸如史賓賽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和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故他們的理論會結合心理因素與生理的反應，即笑。

史賓賽以為人體由於某些情緒或刺激，造成一些神經控制中心蓄積能量。這些能量有三種類型的揮發途徑，其中一種途徑即傳輸到機動神經，由肌肉的張弛釋放，笑即由肌肉的張弛所形成。強烈的心理感覺乃是導致笑的原因。發笑這項動作有別於像遇險避害之類的動作，遇險之際，逃離險境乃是肌肉驅動的目的；但是發笑本身則是身體純粹為了釋放能量的反應，沒有進一步的目的，發笑這個肌肉上的驅動本身就是心理感覺的終點站。神經蓄積的能量會最先傳輸到熟悉的

⁵ Spencer, Herbert. *The Physiology of Laughter*, ed. Morreal, John. *The Philosophy of Laughter and Humo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頁 99。

⁶ Clark, Michael. *Humor and Incongruity*, ed. Morreal, John. *The Philosophy of Laughter and Humo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頁 140。

揮發途徑，如果最熟悉的揮發途徑不勝負荷才會傳輸到其他途徑。譬如嘴巴周邊的肌肉是傳輸喜悅、亢奮最熟悉的肌肉管道，當人感受到樂趣或愉悅便會先發笑以釋放能量。如果笑不足以疏導內心的激情，其他肌肉才會加入揮發的過程，例如身軀會前俯後仰或手舞足蹈等。然而史賓賽亦承認其理論在解釋某些因由不協調（incongruity）而引起的幽默或發笑時是有其局限性。⁷

佛洛伊德在史賓賽的理論基礎上，推進解放理論，他把史賓賽理論中的「笑」理解為「一種心理興奮的釋放現象，同時也是這種興奮的心理釋放突然遇到一種障礙的證明。」⁸不過他也對史賓賽的論述有所修正，因為他認可李普斯（Theodor Lipps, 1851-1914）的主張——心理問題是不可孤立處理的。他對笑如何出現作出的修正：「如果先前為特殊精神道路貫注所運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額變得毫無用處，以至於它可以自由地釋放時，笑纔會出現。」結合培因（Alexander Bain, 1818-1903）的說辭（「笑是緊張感的一種解除」），佛洛伊德以為各種心緒、情感是千絲萬縷，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因此心理的能量可以各種形式的情緒呈現，並可經歷各種轉變，當心理能量經過各種轉變仍有所剩餘，這時才會透過笑來發散。因此，進行詼諧（joke）的人可以「產生一種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時這種力量無疑會給他帶來極大的樂趣。」佛洛伊德以為在心理抑制獲得解除的時候，詼諧的製造者才能夠得到這種快樂。⁹

解放理論如今同樣遭到學術界之反駁。克拉克以為解放理論的局限性與優越理論相似——解放理論無法有效解釋孩童滑稽的行為、文字遊戲與胡說所引起的

⁷ 同註 5，頁 103-106。

⁸ Freud, Sigmund 原著，彭舜、楊韶剛翻譯：《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臺北：胡桃木文化，2006年），頁 204。

⁹ 同註 8，頁 204-207。

幽默。¹⁰另一位現代學者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則指出解放理論與優越理論雙雙有一個相同的問題，即把論述重心放在幽默對主體或詼諧執行者的意義，而忽略了幽默對被揶揄或嘲弄對象的意義，畢竟大部分的幽默不是自嘲型，而是朝向他者的。¹¹

由於解放理論觸及許多心理學的層面，對製造幽默的心理有可借鑒之處，然而誠如諸位學者提出的反駁，解放理論有其狹隘性。另外對於古人的心理，今人縱使運用解放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也屬於臆測，因此本文僅能有限且謹慎地參照解放理論。

第三節 不協調理論

優越理論與解放理論探析的範圍彼此有別，優越理論探索幽默現象、諧趣背後的原理；解放理論則傾向於探索人體發笑的原因，其範圍甚至包括幼兒因為感官上的刺激而發笑的原理，試圖從人最基礎的發笑的原理，推而廣之至幽默現象。在這方面，不協調理論與優越理論是一致的，所針對的範疇亦是幽默及諧趣，但是主體發笑的生理症狀並非側重的領域。學界如今對優越理論與解放理論已提出反駁，以為兩者的範疇均過於狹隘，沒有普遍性。不協調理論遂成為主流理論。主張這派理論的哲學家主要有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他們認為主體對事物的特徵特質均帶有某看法或預期（expectation），然而當感官接受到的訊息或刺激不符合主體的期待，並且來之突然，便會產生荒謬感（ludicrous effect），給主體帶來愉悅（pleasure）。

¹⁰ 同註 6，頁 140。

¹¹ Roger Scruton, *Laughter*, ed. Morreal, John. *The Philosophy of Laughter and Humo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頁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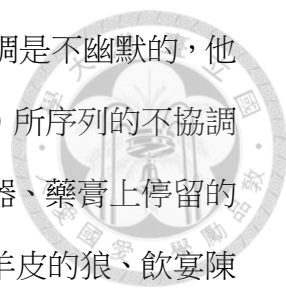
康德針對笑話曾作出如此的評述：「有某種荒誕的事（因而也就是說，有某種『知性於其中找不到愉悅』的事）必須呈現於那『足以引起衷心的捧腹大笑』的任何什麼事中。笑話是那『從一緊張的期望之忽然化歸於一無所有而發生出』的一種情感。」換言之，我們在聽到某個笑話逐漸成型之際，內心總是帶著某種期望的，這種期望是笑話所「含有某種『能夠暫時欺騙我們』的什麼事」，可喚起我們的緊張感。但是當熱切的緊張感忽然憑空消散，心靈上兩股截然相左的力量一張一弛，使我們心弦因此如釋重負，釋放一陣可娛樂我們的感覺。¹²康德的論述似乎有解放理論的影子，但是他的理論中注意到期望、荒誕，均可視作開不協調理論之先河。

叔本華對「笑」的論述便是更為清晰的不協調理論：「毫無例外的，笑是由於突然體會到一個概念，和以某些關係透過概念思考的真正對象間的不協調而來；笑本身正是這種不協調的表示。」叔本華以為這種「不協調」之所以出現是當兩個或以上的客體，由於片面的表徵、特質，被歸納或歸類在某一個概念之下，如果客體突然被注意到與概念相左的表徵、特質等，便產生不協調。譬如一位行為瀟灑、外形出眾的紳士，在大眾面前臉部朝下地摔倒。這位紳士平素「翩翩公子」的形象便是預期中的概念，而摔倒則是突然出現的不協調，荒謬感即因「翩翩公子」的形象與摔倒的不協調油然而生。客體與概念的分歧越大，荒謬感越強烈，也就越可笑。叔本華概括曰：「所以一切的笑是一個矛盾、預期不到的含攝造成的，不管拿言詞表示，拿行為表示，這都不關緊要。對於笑的解釋大致是這樣的。」

13

¹² 康德著，牟宗三譯註：《判斷力之批判》（臺灣：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10月），上冊，頁383-387。

¹³ 叔本華著，林建國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1月），§13，頁75。



不協調理論照樣遭遇質疑。克拉克質疑許多情況下的不協調是不幽默的，他以批評不協調理論的法國作家培因（Alexander Bain, 1818-1903）所序列的不協調情境為佐證，包括衰老的男人卻有養家活口的重擔、走音的樂器、藥膏上停留的蒼蠅、五月飛雪、阿基米德在敵軍攻城之際研究幾何學、披著羊皮的狼、飲宴陳屍、虐兒的父母、不肖子孫等均為不協調的情況，而它們並不會引起歡笑，反而令人痛惜、憤怒、悲傷、仇恨等。另外，克拉克也提出很多笑話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當時內容的話題性，當時過境遷，沒有話題性了，笑話就不滑稽了。¹⁴儘管如此，克拉克的質疑不是不能運用不協調理論解釋的。一個不協調的情況是否滑稽好笑，其中的不協調必須是突然、突如其來的，並且是令人愉快的。¹⁵換言之，滑稽與否有兩個條件，一為突然性，一為愉悅性。

不協調理論提供一個較全面的論述，解釋幽默現象，本論文將以之為主要的理論基礎。

第四節 小結

西方對幽默的古典理論大致可分成三個脈絡——優越理論、解放理論以及不協調理論。優越理論歷史最悠久，它對人運用幽默抱持悲觀的看法，以為人是為

¹⁴ 同註 6，頁 141。

¹⁵ 叔本華針對《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3 補充文章中提到，在直觀與設想訊息的相左，突然被發現時，直觀的版本一定比設想的版本正確，因為靠直觀而獲得的訊息無需外在的肯定，靠直觀獲得的訊息本身就足以提供相當程度的準確性。直觀與設想的訊息的相矛盾會突如其來地進入認知的範疇，因為設想本身就無法跟直觀一般，涵括事物無窮的各種面向與光譜。參見 Schopenhauer, Arthur, translated by E.F.J. Payne,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66, Volume II, page 98.

了突顯自身的優越而有意貶損他人；解放理論則企圖以生理與心理兩者的變化來解析幽默現象。然而，優越理論及解放理論雙雙都因為過於狹隘，無法通盤地解釋幽默現象，所以遭到學界的批評。不協調理論著重在作品或故事內容中呈現的不協調性。當不協調突然被揭曉，與聽者的預期產生出入，便可引人發笑或感到愉悅。雖然不協調理論也受到學者的批評，但是其接受度仍居首位。本文將以不協調理論作為理論基礎，運用於剖析魏晉南北朝的諧趣風尚。

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的諧趣理論及其檢討

西方古典理論的研究命題多為何為幽默，或是主體為何發笑，從解放理論到不協調理論大致皆如此。質言之，這些理論探索的即是幽默的本質。然而中國對於諧趣，打從一開始就視之為一種話術或行文的藝術，或為透過詼諧、任誕行徑傳達訊息的載具，亦即中國著重諧趣的功能性。諧趣早自先秦諸子的作品中已出現，然而諧趣系統性的論述則要晚至齊梁時期的《文心雕龍·諧謔篇》。茲分析〈諧謔篇〉的內容意涵，然後界定中國古典的諧趣指向，最後論述諧趣之特質與構造。

第一節 《文心雕龍·諧謔篇》的內容意涵以及諧趣的目的

劉勰（465-520）將「諧」、「謔」同置一篇不無道理，正如康德所言，笑話必須「含有某種『能夠暫時欺騙我們』的什麼事」，才能喚起我們的緊張感。雖然如此，這個所謂「欺騙我們的什麼事」必須是暫時的，因為祇有這樣，當不協調被突然揭示的時候，才能引起聽者的愉悅感和說者的滿足感，在諧趣的實踐上尤其如是。畢竟正如佛洛伊德所言：「每個詼諧都要求有自己的聽眾。」¹⁶質言之，諧趣的重點不在隱藏說者的想法，而在揭示的那一刻；如果諧趣無人欣賞並給予掌聲，無疑如同錦衣夜行，說者自爽，不是徒然嗎？古人因為一開始就視諧趣為工具或話術，目的性強，所以揭示情況的真相或說者真實想法的那一刻更為重要。而〈諧謔篇〉所陳序的便是中國古代諧趣目的的轉變。

〈諧謔篇〉曰：「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

¹⁶ 同註 8，頁 208。

¹⁷人心多變難測，雌黃卻可滔滔不絕而言不由衷；人內心的悲怨慍怒也不盡相同，所呈現的諧趣戲謔也千百種；因此要將諧趣分門別類，工程不但極為艱巨，而且難以全面地涵括。這點劉勰早已意識到，因此〈諧謔篇〉所序列的諧趣是從目的性出發的。

劉勰首先序列先秦時代的例子——華元「睥目」之謔、臧紇侏儒之歌、成人「蠶蟹」鄙諺、原壤狸首淫哇。詹鏜氏以之為說明「諧隱的意義和作用」，並且「舉例說明民歌諺語的教育意義。」¹⁸這些例子確實顯示這些謔歌諺語時有教育意義，尤其是成人及原壤二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謔歌諺語主要的功能還是製造輿論，尤其是前二例，因為這二例有明確針對的人物以及他們丟臉的行徑，這些輿論運用諧趣的方式去譏諷他們，是含有侮辱性質的；甚至很可能教育他人祇不過是附加價值，嘲諷這些人才是真正的目的。

〈諧謔篇〉論述的諧趣主要是將其分為上中下等，而這三個等級剛好符合先秦兩漢至魏晉諧趣的發展。茲節錄〈諧謔篇〉如下：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宴集，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鋪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嫖弄，故其自稱為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雖拊笑衽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

¹⁷ 【南朝梁】劉勰著、詹鏜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頁524-525。下《文心雕龍》引文及詹氏注均同，茲不贅述。

¹⁸ 同註17，頁528。

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¹⁹

劉勰以太史公（前 145-前 86）的〈滑稽列傳〉為最上等的諧趣。〈滑稽列傳〉所敘說的人物都是在談笑間，「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所以「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就是說他們的談笑風生背後有強烈的大我意識，言辭間九轉十八彎不過是一種話術，最終的標的還是導正國家的走向與人君的道德。太史公的「滑稽」何以成為劉勰眼中最上乘的諧趣？阮芝生氏於〈滑稽與六藝——《史記·滑稽列傳》析論〉一文對此有深刻的談論。阮氏以為太史公心中的「滑稽」有四大要件：一為「話語流利」，滔滔不絕，辯才高超；二為「巧於智計」，善用計謀，可隨機應變；三為「人莫之害」，指國君不會遷怒與說者；四為「以道為用」，其人的口才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是為了排解糾紛，利君利國利民。擁有這四大要件還不足夠。阮氏以「滑稽」為成功的諷諫，要成就一段滑稽，人臣必須採用間接的、暗示的，並且重視言語措辭的巧詞慧語，也就是諷諫的方式。諷諫符合「談言微中」，靠「巧妙、微妙地說中、擊中要害或目標」來達成與六藝義理相符合的「解紛」致治之高尚標的，如此才堪稱「滑稽」。²⁰

阮氏一文剖析了「滑稽」所具備的要件以及其解紛致治的目的。然而阮氏以「滑稽為成功的諷諫」一義或可更改作「運用諧趣方式而成功的諷諫」，因為諧趣在其間扮演了非常顯著的角色。阮氏據《白虎通》之說：「諷諫，智也。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以諷諫在五諫中為最佳，認為太史公是在為「諷諫」立傳。雖然文中一再強調諷諫須以技巧的方式迂迴進諫，但是卻忽略了〈滑稽列傳〉的迂迴進諫本質上是運用了諧趣的方式。而劉勰已注意到這點，將之納入〈諧謔篇〉。何以言諧趣是〈滑稽列傳〉重要的元素？首先，太史公對淳于髡

¹⁹ 同註 17，頁 529-541。

²⁰ 阮芝生：〈滑稽與六藝——《史記·滑稽列傳》析論〉（臺灣：臺大歷史學報，20 期 85 年 11 月），頁 344-357。

(?-?)、優孟(?-?)、優旃(?-?)三人近乎逗趣的外形及舉止均有所詳述，淳于髡「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²¹，折算成現今的長度大約少過 162 公分²²；優孟則高大，「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折算為約 185 公分²³；優旃則比淳于髡更矮許多，「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淳于髡和優旃均屬個子矮小的人，優孟則偏高，三人皆能言善辯，個性與形象上的逗趣是一貫的。他們擁有比一般人奇特的外形，加上名聲在外的幽默性格，與之往來的人很容易產生被娛樂的期待，而根據〈滑稽列傳〉也確實如此。齊威王(?-?)要淳于髡去趙國請救兵的時候，給了很少的財貨卻希望淳于髡說服趙國傾力幫忙。淳于髡先是「仰天大笑」才以田夫以少得可憐的祭品祈求豐收的故事來突顯齊威王的荒謬。以淳于髡當時的舉止來判斷，他必定是將田夫的故事包裝成一段諧趣來提示齊威王。要諷諫齊威王不應夜夜笙歌，淳于髡選擇的場地反而是在宴飲之際。所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令齊威王驚奇不已，才追問他何出此言。君臣之間黃湯下肚，當時的氣氛必定非常隨性而不正式，淳于髡一斗、二斗而醉並不足奇，精彩的是淳于髡在解釋喝八斗與一石而醉的時候，他居然竭力地敘述自己的醜態：「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后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薳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滑稽列傳〉)淳于髡是否曾如此近乎淫亂地失態，已不得而知，但是齊威王大抵是如此，因為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所以經由淳于髡含蓄地自攬失態之貌，其實早已直接道破齊威王荒淫的生活作風，

²¹ 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民 71.10. (1982.10.)，頁 1325。下《史記》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²² 折算方式據戰國銅尺 23.10 厘米為準，參見葉師國良，《禮制與風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8 月)，頁 111。

²³ 同註 22。

齊威王才停止長夜之飲。再看優孟，優孟平素「談笑諷諫」，前來諫楚莊王（?-前591）葬馬之際卻突然「仰天大哭」，舉止十分出格荒唐，此時楚莊王一驚；人人皆反對楚莊王以大夫之禮葬愛馬，唯優孟加碼要楚莊王以更高的人君之禮來葬馬，楚莊王又是一驚；楚莊王經過優孟仔細陳述馬匹應獲得的葬禮待遇以後曉得自己的荒唐，這時優孟才揭露真正的主張——將馬烹煮，但是優孟請以烹煮的這段話又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灶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壟灶銅歷怎麼是槨棺？薑棗木蘭哪是祭品？糧稻火光不是用以敬奉死者（馬），而是為了褻瀆牠，使其死無葬身之地的準備；吃下肚子以後，曾為楚莊王的愛馬將變成一堆糞土。但是優孟卻正經八百地把對馬最卑賤的待遇包裝成高貴的喪葬典禮。楚莊王必定啞口無言，此又為一驚。楚莊王的預期一再突破，標幟著優孟出乎意料的言行是充斥著各種不協調。最後是優旃，優旃是個侏儒，而且還是個倡優，一言一行更容易引人發笑。優旃如此的身高體型一般肯定在日常生活有諸多不便，乃人所不欲，可是優旃卻對長得高的侍衛說：「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秦始皇（前259-前210）要大擴苑囿，版圖涵括軍事要塞，當時的情況想必與楚莊王欲以大夫禮葬愛馬一般，反對的人居多，優旃卻加碼：「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一語點醒秦始皇擴建苑囿至如此規模有多荒謬。對於胡亥（前230-前207）要漆城，優旃也是如法炮製，加碼道：「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優旃當時的身體語言必然滑稽可笑，因為胡亥聽了他的話，笑了。以上種種例子都有諷諫者出其不意地指出人主行徑的荒謬之處，從而帶給人主某種愉悅感。若以不協調理論檢視的話，均可視為諧趣。因此，在〈滑稽列傳〉的諷諫，諧趣元素是很重要的。

劉勰如此推崇〈滑稽列傳〉，將其列為最好的諧趣，其實還是有賴於此文或其中所敘寫的人物有良善而關懷大我的出發點——「抑止昏暴」、「意歸義正」，

套一句阮氏的話：「試觀〈滑稽傳〉所寫三人八事，無一事是為一己一家之私利謀，每一事的結局都是排難解紛，獲得正果，於君、於國、於民有利的。」²⁴換言之，劉勰以為諧趣作為人臣的工具，達到諷諫人君的目的，而這項目的是崇高的、高尚的，所以才位列最上等的諧趣。

至於入漢以後，東方朔（前 154-前 93）、枚皋（?-?）的賦作，劉勰以為是遊戲之作，「舖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嫫弄。」要瞭解從〈滑稽列傳〉到東方朔的退步，還需先檢視東方朔的事跡。據《漢書·東方朔傳》東方朔得以出仕首先是由於武帝（前 156-前 87）初即位，欲徵天下賢士，有德者有望獲得破格提拔。東方朔上書自薦，於是被徵為衛尉，卻沒有獲得武帝召見。他第一次獲得武帝注意即仰仗諧趣取悅武帝，他先使馬廄的侏儒信以為武帝要誅殺他們，然後教他們哭著跟武帝求情。結果武帝因此召問他為何恐嚇侏儒。東方朔趁機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²⁵「生亦言，死亦言」是東方朔幾近耍賴般地向武帝撒嬌；他藉由身長九尺及三尺侏儒有相同待遇的荒謬（不協調）來逗得武帝大笑，因此換得晉升，東方朔這席話完全以自利出發。東方朔後來幾次都以投壺、猜謎、巧言等遊戲取悅武帝。據《漢書·東方朔傳》，他認真進諫的情況有三次，意見均未獲採納，第一次是為了勸阻武帝修葺上林苑，當時因為所牽涉的腹地遼闊，而且延伸到作為天險的南山，東方朔正經地分析三大不宜修上林苑的理由：一為腹地乃百姓賴以為生計的土地，不可阻斷百姓的生產以供享樂；二為腹地會荒涼化，在這裡生活的百姓必須遷離；三為腹地地勢險峻，恐怕皇帝不慎便會受傷。武帝因為這次的進諫，拜東方朔為中大夫，賜與黃金百斤，但是上林苑的工程沒

²⁴ 同註 20，頁 346。

²⁵ 【後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清】錢大昕考異：《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3月），卷 65，頁 1268 下-1269 上。下《漢書》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有作廢。另一次，東方朔陳三大罪狀請斬董偃（?-?），因為董偃以人臣身份，私通武帝的姑姑館陶公主（?-?），敗壞婚姻制度，並且生活極盡奢華糜爛。武帝依舊沒有聽從東方朔的意見斬首董偃，只賜與他黃金三十斤了事。東方朔最後一次直言相勸是武帝問他要如何移風易俗。東方朔序陳武帝大興宮殿及縱情聲色的生活作風無助於教化百姓，勸武帝改進，此事也不了了之。東方朔不是沒有志氣理想或治國的方針大計，在〈非有先生論〉裡，東方朔曾將很具體的方針納入他的文章：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²⁶

大抵東方朔以旁門左道上位晉升，武帝或許沒有認真看待他的意見。〈東方朔傳〉雖形容他「雖諛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但事實似乎不是如此。東方朔善於察言觀色，很懂得取悅武帝。武帝問他：「先生視朕何如主也？」他回話說：「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然後洋洋灑灑地列舉在位的官員三十幾人均負有各代聖賢的才幹。或許東方朔是說了反話，藉機諷刺武帝，但是聽在一個自詡功高蓋世的皇帝耳裡，豈不是一段逢迎拍馬的話，所以「上乃大笑」？聰明絕頂如東方朔又怎麼會不曉得武帝喜歡聽這種話呢？武帝問東方朔是否比得上朝中諸位賢才，他對曰：「臣觀其聿齒牙，樹頰骸，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尻，遺蛇其跡，行步僂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言談不入流至此，他究竟是骨幹之臣，還是跳梁小丑，武帝大抵已有定見，所以他一直未獲重用，而是「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喁而已。」（〈東方朔傳〉），比起

²⁶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10月），頁1262-1263。

淳于髡、優孟、優旃三人，東方朔大不如。

東方朔縱使有為國貢獻的志氣，但是露才揚己的意圖明顯，常以諧趣取悅武帝，其墮落之行已然十分明顯。魏文曹丕（187-226）著《笑書》及薛綜在宴會的賦作似乎又比東方朔、枚皋更為退步——「雖拊笑衽席，而無益時用矣」，其迎合取樂性質又更強烈了。此等作品實為自娛娛人之作，已無〈滑稽列傳〉匡正人主的大我情懷，從作文的目的而言，已然差了一大截。然而，以諧趣的目的而言，露才揚己、逢迎拍馬以及拊笑衽席均可視為第二個目的——自娛娛人。自娛固然是為了使自己愉快，娛人則往往有更進階的目的。除了娛樂他人所帶來的成就感，作者或說者能夠利用諧趣所帶來的愉悅感，傳達善意，與聽者之間建立更良好的社交關係。在酬酢的場合，適量的諧趣可以作為潤滑劑，使氣氛融洽，如此場合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不勝枚舉：

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簡傲篇〉2條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排調篇〉4條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排調篇〉18條

文人之間相互的調侃沒有火藥味，不是相互攻擊的利器，而是一種交際的雅趣，諧趣在這些社交場合上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情誼，這也是自娛娛人的諧趣所帶來的好處。

至魏晉以降，諧趣的目的從載道的角度來看更是每下愈況，常變成譏諷他人的缺點，以揭人之短為樂：「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

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諧謔篇〉）質言之，這項目的是帶有侮辱性質或攻擊性的。詹鏌氏引李曰剛《文心雕龍斟詮》曰：「此或謂應瑒形之醜，有如被盜賊削去一半之雞卵也」；又據《世說新語》以為張華（232-300）「握春杵」指他「頭著巾，形如齏杵也」，這些都是取笑侮辱人的辭語，所以「有虧德音」，所以劉勰評之為「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這樣看來，《莊子·列禦寇》曹商與莊子（前 369-?）的對話應該也屬於這種目的的諧趣。曹商向莊子炫耀從秦王得到的賞賜，莊子遂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²⁷莊子大可正經八百地教訓曹商恬不知恥，但是如此教訓曹商無法傳達他對曹商的鄙視。因此，莊子以舐痔者作比喻可形象化地表現曹商的下流，突顯曹商寡廉鮮恥的人格，低級到只配舐秦王的屁股。莊子以諧趣包裝侮辱，便能準確收穫侮辱曹商的快感。

除了上述三個等級，三種目的，實際上，諧趣還有劉勰未提到的第四種目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普遍，即以荒誕之言行偽裝本心，以逃避他人的迫害或甚至不得不做出違心的事情。古代箕子佯狂就是事例之一。這種例子到魏晉南北朝變得特別多，如阮籍（210-263）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225-264）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²⁸阮籍故作荒誕狀也可見於〈任誕篇〉13條，一段他與兒子阮渾（?-?）的對話：

²⁷ 錢穆著：《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年11月），頁269。下《莊子》引文均同，將僅列篇名，將不贅述頁數。

²⁸ 〔唐〕房玄齡等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新校本晉書一百三十卷》（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79年2月），卷49，頁1360。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大凡父親對兒子勸告才是最真實的。如果阮籍是真心擁戴任誕之風，他不會勸阻兒子阮渾作達，可見阮籍的荒誕狀其實另有目的。余嘉錫氏（1884-1955）評竹林七賢，對阮籍的評語為：「嗣宗陽狂玩世，志求苟免，知括囊之無咎，故縱酒以自全。」²⁹阮籍的荒誕行徑實際上就是一種與禮教的不協調，這份任誕幾近荒唐可笑，標幟無爭取之志，在求自保的同時又可與司馬家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因此或多或少成全自己不願同流合污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竹林七賢另一位成員的荒誕與阮籍有本質上的差異：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任誕篇〉 12 條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任誕篇〉 15 條

阮咸（?-?）的荒誕更似為一己之欲，作樂醉酒以後更加任意而為，又在居母喪之際，不惜追回鮮卑婢女，種種舉止衝擊禮儀體制，甚至為人的體面，都不是為了求生存，而祇是滿足個人的任性。余氏評之：「貽譏清議，直一狂生。徒以從其叔父游，為之附庸而已。」³⁰如果要將阮咸的荒唐動機作一分類，則可勉強歸諸自娛娛人之列。後代慕名阮籍，故作荒唐狀者，皆屬於此類，不可與阮籍混為一談。

²⁹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8月），〈品藻篇 71 條注〉，頁 636。下《世說新語》引文均採某篇幾條之格式，將不贅述頁數。

³⁰ 同註 29。

雖然諧趣之目的可分為以上四項，可是實際上，在一個談話或一段故事中，作者或說者往往有超過一個以上的目的。以下的例子均有一個以上的目的：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雅量篇〉27 條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排調篇〉24 條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

「元規塵汙人！」

〈輕詆篇〉4 條

在第一則，謝安（320-385）稱郗超（336-377）是入幕之賓，雖說是玩笑，但是他深知郗超與桓溫（312-373）兩人欲鏟除異己，所以必然對郗超不以為然。因此「郗生可謂入幕賓也」這句話表面上是一句玩笑，其實也是表達對郗超的輕蔑，帶有侮辱性的成分。桓溫是一個武將，儘管有才，其身份在第一流的名士之間，還是常被取笑，所以王濛（309-347）與劉惔（?-?）才稱其為「老賊」，對桓溫的裝束也甚為輕視。然而，桓溫位高權重，何嘗一直甘於被鄙視，故回嘴「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如果沒有人致力於國防之務，這些自詡名士之人何以有閑作風流狀？在桓溫看來，王劉二人恰恰是得了便宜又賣乖，所以必定心有不滿，故反唇相譏。庾亮（289-340）是國舅，與王導（276-339）一同受命輔佐幼主成帝（321-342），但是後來庾亮漸漸專權且有扳倒王導之意。王導稱「元規塵汙人」，可視為一句玩笑，但更可能因為對庾亮有敵意，所以才出言諷刺。因此，當談話被歸納為某一種目的，其實意味著它所顯現的創作目的較傾向於此，而不是單純地漠視其他次要目的的存在。如果有充足的背景資料作為佐證，作者或說

者擁有多項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簡而言之，以上雖說序列了諧趣的四種目的——諷諫人君、自娛娛人、譏刺他人、荒誕求存——不過說者多數有更進階的目標。說者諷諫人君，乃是希冀人君避免犯錯，導致蒼生受苦；自娛是說者爲了自己的愉快而製作諧趣，算是較爲終端的目的；娛人則往往帶有更多元複雜的進階目標，或爲了討好某人，博得對方好感，或爲展露才華，或爲了場面歡樂，這是幾個較常見的進階目標；譏刺他人也有多元複雜的進階目標，說者可能爲了報復而攻擊對方，也可能爲了批判某人某事某種現象，也可能爲了討好第三方；荒誕求存與自娛相似，也屬於較終端的目的，爲了自存性命與本心。換個角度來看，這也是說者對諧趣產生的愉悅感進行各種運用。說者可以利用這份愉悅感向人君傳達善意，藉此提升人君對諷諫的接受度；說者也可以利用這份愉悅感讓自己心情愉快，也讓別人如沐春風，社交場合氣氛融洽，因而收穫他人的友誼、敬佩；說者還可以欣賞或想像對方暴跳如雷的反應，而自己可以收割這份諧趣帶來的愉悅感，讓報復的快感使諧趣的愉悅感越發膨脹；也可能爲了抱不平，以這類諧趣伸張正義；最後，說者也可以讓嘲笑自己的一方，收穫到諧趣的愉悅感以及滿足自己的優越感而輕蔑或忽略他。諧趣的目的多元，而且不是一成不變的，參與者的動機與感受也是流動的，有可能隨時變化的，諧趣的效果或後果也可能不是在當場就發酵，也可能在一段時日以後。種種諧趣的演化、參與者的心計，在第四章將有更多的討論及例子。

要之，諧趣的目的主要有四大項，其中三項可從《文心雕龍·諧謔篇》中推演出來，第一項是如〈滑稽列傳〉的人物以諧趣諷諫人君，從而完成一個大我無私的任務或委婉勸誡人君改善行為作風；第二項是自娛娛人，如東方朔露才揚己兼奉承武帝即是；第三項是帶有攻擊性及污衊性地諷刺他人，如譏笑他人的身體缺陷。最後一項未見於〈諧謔篇〉，即以荒唐言行掩飾真心，甚至自毀聲譽，以求自存。在魏晉南北朝均多以這四項為目的的諧趣，茲將於下一章論述。

第二節 何謂「諧趣」？



討論了諧趣的衆多目的，本文尚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必須釐清——何謂諧趣？這一議題尚可引申出另一問題：諧趣是否一定會使人發笑？

何謂諧趣？諧，詒也（諧、詒互訓，《說文·言部》）。³¹趣者，原意為疾也（《說文·走部》）；《春秋繁露·五行變數》凌曙注引顏師古曰：「趣，謂意所嚮」，則從原意的肉身疾行引申至意念之疾趨，即趣向之意（《廣韻·遇韻》）。³²〈諧讖篇〉曰：「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詹氏引《文心雕龍注訂》曰：「《玉篇》作合和調偶諸義，咸不出皆字義也。」³³諧趣即以言語調和引導意向氣氛之意，所用的言語是淺俗易懂的話語，以達到使人歡悅和發笑的作用。劉勰舉淳于髡微言諷諫齊威王不應長夜飲宴，以及宋玉（?-?）著〈登徒子好色賦〉勸勉楚襄王（?-?）守禮為例，以為淳于髡及宋玉均在酒酣耳熱之際，將道理以平易近人的言語娓娓道來，使聽者愉悅之餘又有所啓迪，故「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優孟諷諫楚莊王葬馬則屬「譎辭飾說」，則是諧語的另一種表現方式。諷者，誦也，口發聲誦讀之意，段注曰：「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³⁴；後引申為諷諫、諷刺，《白虎通義·諫諍》：「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³⁵諫，証也（《說文·言部》），《周禮·地官·保氏》

³¹ 宗福邦、陳世鏞、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頁2135。

³² 同註31，頁2206-2207。

³³ 同註17，頁529。

³⁴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頁161-163。

³⁵ 同註31，頁2138。

云：「掌諫王惡」，鄭玄注：「諫者，以禮義正之。」³⁶東方朔〈七諫·序〉云：「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³⁷《玉篇·言部》云：「諫者，更也。」³⁸進諫是以禮義法度匡正人君，使之更正言行舉止，端正內心的思想。諧趣則隨著說者內心正面的意圖及目的，其手法也相較趨於和悅。但是諧趣的手法會隨著說者的意圖逐漸變化，是以出現〈諧謔篇〉所言之「譎辭」。《說文解字·言部》以譎為「權詐也」；《論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皇侃注：「譎，詐也。」雖然有譎諫一說，如卜商〈毛詩序〉云「主文而譎諫」，李善注「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又《玉篇·言部》以譎諫為「依違不直言」³⁹，儘管志在抑止昏暴，譎辭已有欺詐、詭辯之意。至東方朔、枚皋的「詆嫚媒弄」、曹丕《笑書》皆「俳」之屬。俳，戲也（《說文解字·人部》），俳諧為遊戲性質之文，為了收穫悅笑之效，往往訴諸譏嘲。譏，誹也（《說文解字·言部》）。《說文通訓定聲》云：「大言曰謗，微言曰誹。」誹、謗皆毀損他人之語。從微言諷諫至譎辭飾說，最後至譏嘲誹謗，諧趣的目的呈現一個由好至壞的光譜，諧趣的手法與內涵也從雅正逐漸變成惡俗的情況。

正如劉勰所言：「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是以諧趣的內容可以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從〈諧謔篇〉所列舉的例子來看，只有使人愉悅和發笑這一點是各種諧趣的內容的共同點。然而，諧趣是否一定會使人發笑？一段笑話只取悅了說者與旁觀者，而被嘲諷的對象痛惡之極，究竟要以何人的角度推定那是諧趣？一段笑話縱使第一次成功使人愉悅和發笑，如果被重複了十遍，還能否收穫同樣的效果？一段笑話縱使由甲表述，成功使人愉悅和發笑，由乙或丙來操作是否也能收穫同樣的效果？一種文體，例如設論體在東方朔

³⁶ 同註 31，頁 2135。

³⁷ 洪興祖撰：《楚辭補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9月），頁 388。

³⁸ 同註 31，頁 2135。

³⁹ 「譎」諸注同註 31，頁 2149。

〈答客難〉收穫使人愉悅和發笑的效果，在後代文人以同樣的套路一再書寫以後，是否也還能收穫同樣的效果？如果以上問題的答案都是「不」，那麼難道只有第一次說的笑話才是諧趣，由甲表述的才是諧趣，文體初次出現才是諧趣，重複以後的都不算？恐怕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不」，因為根本是同一則笑話，同一種文體。

質言之，一個談話或一段故事能否使人愉悅和發笑無法成為絕對地判斷它們就是諧趣的準則，正如主張不協調理論的叔本華所言：「一切的笑是一個矛盾、預期不到的含攝造成的。」要使人愉悅及發笑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正是跟「預期」的出入。重複的笑話已無法收穫出其不意的效果，因此在使人愉悅或發笑的狹隘意義上，我們充其量只能說這是一個失敗的諧趣，而不能全面地否定它們是諧趣。麥克·馬丁（Mike W. Martin）以為因幽默所帶來的愉悅感的笑是針對某個事物的，很多幽默所帶來的歡愉反而不會以笑呈現，因為要麼想笑的欲望會被抑制，要麼幽默的欣賞不一定伴隨著想發笑的傾向。⁴⁰這點尤其合應於文學作品的諧趣。文學作品的諧趣與情景的諧趣應分開看待。文學作品不言而喻，而情景一般是指一段對話或故事，像《世說新語》的記載或《笑林》中短篇的小故事。文學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較長，尤其古人有遵循文體格式的傳統，所以很難收穫出其不意的效果，因此不能單一地以能否使人發笑為準。情景則比較能夠以發笑為判別的基準，但這也不是絕對的。

如果連能否取悅及使人發笑都不能成為判別或定義諧趣的基準，那麼千百種諧趣的共同點究竟是什麼？現代學者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也指出「笑」其實是誤導性很強的詞彙，因為它所指涉的是人體的一項症狀，所以甚至哲學家都更傾向於使用沒指示症狀的詞彙，例如以『愉悅』形容心境；以『幽默』形容令

⁴⁰ Mike W. Martin, *Humor and Aesthetic Enjoyment of Incongruities*, ed. Morreal, John. *The Philosophy of Laughter and Humo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頁 175。

人發笑的事物。然而，這些詞彙都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因此斯克魯頓以為要系統化這些語彙的運用，首先必須認清「笑」、「愉悅」、「幽默」均不是理論論述的對象，而是因什麼而發笑，因什麼而感受到愉悅，事物為什麼幽默。質言之，人是看到或意識到某些事物才會發笑或感到愉悅的，所以可以引起人發笑或感到愉悅的事物才是論述的對象。斯克魯頓認為可以引起人發笑或使人內心愉悅的正是叔本華所主張的不協調。當人辨識到事物「不協調」的本質，而且享受這些矛盾，便會發笑，內心感到愉快，從而完成諧趣的欣賞。⁴¹

斯克魯頓的論述可用以解答諧趣的共同點究竟是什麼——還是所謂「不協調」。若以不協調理論來檢視〈諧謔篇〉序列的例子，便可發現其中的不協調之處。〈滑稽列傳〉的荒謬感前已論之，不再贅述；詆嫚媒弄與譏嘲誹謗的不協調出現在被嘲諷的對象的醜態跟道德的基準產生衝突感，如東方朔、枚皋之屬的賦作，以及魏晉的祗席拈笑；被嘲諷的對象的醜態跟社會一般所推崇的審美標準大相徑庭也會產生衝突感，如「應瑒之鼻」、「張華之形」，甚至是東晉（261-300）的〈餅賦〉。下一章將更深入分析各種不協調。

綜合了上述的分析，本文將「諧趣」定義為有潛力（但不必然）使人感到愉悅或引人發笑的不協調特質；「幽默」則取前述第一章墨瑞爾所據之《牛津字典》的定義——行為、話語或著述可引起樂趣的特質。「幽默」者好笑詼諧，「諧趣」則不僅包含「好笑」，同時也包含「可笑」，因為荒唐可笑的事往往發生在捍衛規範失敗，而招致他人的訕笑諷刺，如宋襄公的仁義之師、東施效顰等，甚至可以說若以「可笑」類型的諧趣來揭人之短，其帶來的愉悅感恰恰是因為它挑戰規範的極限，所以說者承擔的風險要比「好笑」類型的諧趣大得多。換言之，「可笑」的人事物不但可以催生參與者的愉悅感，同時也可使人惱羞成怒或側目，其引起的情緒要比「好笑」複雜許多。因此，「諧趣」與「幽默」固然有相通之處，惟

⁴¹ 同註 11，頁 157-161。

本文之「諧趣」不僅分析詼諧有趣者，亦側重在事物的荒謬、矛盾等不協調之上，故「諧趣」將用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作品與情景的討論，「幽默」則以指示西方幽默傳統與理論。既然諧趣之作的共同點在於不協調，因此各種矛盾及荒謬的情景、社會狀況等將是本文著重論述之處。



第三節 諧趣的結構

諧趣既然是一種話術、撰文的筆法或是傳達訊息的載具，具有工具性質，其結構便有跡可循。佛洛伊德於《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中提到：

沒有人滿足於僅自己講詼諧。把詼諧講給他人聽的這種衝動與詼諧工作密不可分。實際上，這種衝動非常強烈，以至於它常常無視重重疑慮而成功地傳達了詼諧。⁴²

諧趣是必須共享的，因此諧趣的產生必涉及至少兩個人以上。所有諧趣大致都有以下的參與者：



圖表 1 諧趣的結構

第一人即諧趣的說者或生產者；第三人為旁觀者、聽眾或讀者；第二人則為代價付出者。⁴³一個諧趣的產生一般是如此：第一人發現一件負面的事物，負面的事

⁴² 同註 8，頁 200-201。

⁴³ 佛洛伊德：「一般說來，傾向性詼諧需要三個人在場：除了詼諧的製作者外，還必須有充當敵意或性攻擊對象的第二者和使產生快樂這一詼諧目的得以實現的第三者。」同註 8，頁 142。

物與社會一般提倡的道德規範、行為準則、審美標準等相違或產生矛盾（即不協調），程度的大小不一，小至如一個不太好的長相，嚴重至如傷風敗俗或禍國殃民；第二人即是長相不好的人，或是做出傷風敗俗，禍國殃民行徑之人。在諧趣的產生當中，第二人成為第一人取笑或譏刺的對象，所付出的代價是顏面受到的傷害。第三人或在現場為旁觀者，或不在現場為讀者，或轉述者的聽眾。⁴⁴而在這個過程中，第一人（甚至包括第三人）都可以收割到心靈上的愉悅感。舉例而言，《世說新語·排調篇》43條：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徽之（338-386）與謝萬（320-361）同為第一人以及接收諧趣的第三人，也就是說當王徽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萬為第三人；同樣地，當謝萬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王徽之為第三人。支道林（314-366）就是被揶揄，付出顏面代價的第二人。第三人的存在也可能使第二人付出更大的顏面代價，畢竟私下被揶揄，比眾目睽睽之下被譏笑所付出的代價來得小。另一種情況是第一人與第二人是同一人，這種情況即所謂的自嘲，有濃厚的自娛娛人的意味。如王徽之與謝萬兩人的互動便有自娛娛人的意涵，因為兩人進入一個爭相說出比對方更能嘲笑支道林的競技中，而這個比賽讓王、謝二人十分愉快。當然，付出代價的人是支道林。以譏笑、反譏、辱罵為標的的諧趣，

⁴⁴ 在第三人是讀者的情況中，第一人是書寫諧趣的作者；而在第三人是轉述者的聽眾中，第一人是該轉述者。質言之，在某些情況中，當下的參與者未必將對話視為諧趣，但是他人卻發現其中的不協調，然後書寫之。在這種情況下，書寫或轉述的人為第一人，第二人為當時對話的參與者，而第三人則是讀者或轉述者的聽眾。由於本文的議題關注魏晉南北朝的諧趣風尚，而書寫者或轉述者在較大的程度上反應個人的諧趣風格，故這類諧趣構造的討論將較為有限。

其構造與其他兩種諧趣並無二緻，差異在於說者(第一人)的意圖是否出於惡意，貶損付出顏面代價的人。

有趣的是，第二人與第三人對諧趣的解讀，很可能與第一人的意圖是不同的。箇中因果取決於各方對第一人與第二人關係的親疏，以及對第二人重視(該諧趣的)議題的程度有不同的研判，甚至第一人如何執行諧趣都可能影響諧趣被各方的解讀。以譏笑、反譏、辱罵為標的的諧趣，較容易被識別，因為對惡意的感觸較容易判別。那麼，什麼時候以勸諫與教育、譏刺，以及自娛娛人的諧趣會變質成為帶有譏笑、反譏、辱罵意圖的諧趣？或者更直接了當的問題是——什麼時候諧趣從好笑好玩變成不好笑、歧視性語言？這大概取決於第二人，當第二人的顏面代價大到他必須採取報復行動，直接傷害第一人，或遷怒於第三人的時候，諧趣就變質了。所謂的報復行動並不是指第二人同樣運用諧趣以反擊和化解，而是輕則斥責第一人與第三人，重則甚至讓他們付出身家性命。比如前面王徽之、謝萬與支道林的例子，如果支道林懷恨在心，報復王徽之與謝萬，這時諧趣不僅僅變質，而且完全失敗了。試觀以下有關名諱的實例：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臬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排調篇〉2條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名播海內，甯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方正篇〉18條

第一例是成功的諧趣，鍾會的父親是鍾繇(151-230)，「繇」與「遙」諧音，晉文帝(211-265)與陳騫(212-292)、陳泰(?-260)調侃鍾會「望卿遙遙不至」是犯鍾會的父諱。鍾會回擊「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因為司馬昭父親是司馬懿(179-

251)，陳騫父親是陳矯（?-237），陳泰父親是陳寔（104-187）（通「實」），鍾會一句簡短的回答就嵌入三人父親的名諱。司馬昭再犯鍾會的父諱——「梟繇何如人」，鍾會還是回敬以司馬昭父諱「亦一時之懿士。」名諱是當代的禁忌，但是如果有好交情，就算犯諱也可以無傷大雅，足以博君一粲。反觀第二例，陸機（261-303）與盧志（?-312）之間不但沒有交情，而且是時吳已亡，陸家兄弟以南方名門的身份入洛求功名，立場本來就有些難堪，「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縱使是一句玩笑話，也是出言不遜。陸機大可如鍾會一般回敬盧志，以化解尷尬，如此一來陸機便可成就這段諧趣。但是盧志在眾人面前態度輕蔑地觸犯陸家兄弟的父諱，陸機不難視之為對整個吳郡陸氏的侮辱，所以他沒有餘裕瀟灑地賣弄諧趣化解當時的尷尬。而且其性格剛烈，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他的反擊就義正詞嚴。當陸機認真之際，他的回應不但使這段諧趣失敗了，同時也彰顯出盧志的「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有多麼無禮，以及自己有多麼被冒犯，這就是報復行為了。也就是說，如果陸機以諧趣化解，盧志的提問尚可被視作玩笑話，雖然其中可能有暗中較勁的意味，但不失為交際場合的相互調侃。不過因為陸機認真反擊，所以這段問答便升級為一場口角。

至於前述第四種目的，即以荒誕之言行偽裝本心以求自存，第一人與第二人同屬一人，但是其目的並非自嘲以自娛娛人，而是特意擺出荒誕的姿態，誘使旁觀者的第三人變成諧趣的執行者第一人，即對故作荒誕狀者進行第三種目的的嘲諷，隨之低估荒誕者甚至是漠視其存在。可以說，第四種目的的諧趣是雙重的。首先，荒誕者作出驚世駭俗之行，故為第一人，同時也付出令人側目的顏面代價，即為第二人，這是第一個諧趣。其行徑看在旁觀者（第三人）的眼裡，旁觀者因而諷刺荒誕者，這是第二個諧趣，這時的第三人又變成第二個諧趣的第一人，荒誕者依舊是第二人。〈任誕篇〉6條：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幃為入我中？」

在屋內裸露乃驚世駭俗之舉，劉伶如此的舉動自然引人譏嘲，他個性不乏機鋒，所以也反唇相譏，回擊譏嘲他的人。劉伶(??)的諧趣是複雜且多重的，與人(尤其是他鄙視的俗人)的交際往往流於相互諷刺、具有攻擊性(第三種目的)的諧趣；自處喝酒之際，又有自娛自樂的意味，劉孝標(262-521)注引梁祚(??)

《魏國統》形容他「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⁴⁵，便是捕捉到他自娛自樂的一面；然而，若細讀其〈酒德頌〉，其諧趣又有另一番味道：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烏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暮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⁴⁶

顏延之(384-456)的〈五君詠·劉參軍〉曰：「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⁴⁷顏延之是東晉末的人，時代與劉伶相對接近，他亦以為劉伶內心深藏的志向可見於〈酒德頌〉。劉伶是有才情之人，其「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意味他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故以遁隱為志，醉心杯中物，視擾擾萬物與他人之目光如無物。事實上，雖曾為建威參軍，但是劉伶藉由醉相隱藏得很好，而且其志甚篤。何以知曉？〈賞譽篇〉29條：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

⁴⁵ 同註 29，頁 720。

⁴⁶ 同註 26，頁 1178-1179。

⁴⁷ 同註 26，頁 546。

疏通高素。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凡此諸子，惟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竹林七賢的後代個個都留名歷史，除了劉伶。劉注引《晉書》王戎（234-305）兒子的事跡：「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⁴⁸蓋連一個胖子減肥都可以藉父親盛名而留名史冊，難以想像驚世駭俗的劉伶與兒子的事跡沒有留下隻字片語，這大抵是劉伶有意為之的結果，相較於自己作荒誕狀卻勸阻兒子阮渾不要作達的阮籍，劉伶藏志自存之心似乎更堅定，所以連兒子都不予露面。劉伶平素的飲酒等荒誕狀正是他的保護色，使他可以保全自我，又不至於墮落於混世之中。如果比較他與阮籍在第四種諧趣目的的表現，兩人雖均有任誕的作風，但是策略又有所不同。阮籍「未嘗臧否人物」（〈德行篇〉15條），就算言語犀利，對晉文帝司馬昭發出驚人之語：「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因為「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⁴⁹，阮籍都沒有冒犯一個特定的對象。然而劉伶卻對前來諷刺他的人道：「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劉伶的諧趣沒有一絲婉轉或遲疑，他的風格是迎頭回擊那些對他冷嘲熱諷的人，與阮籍大不同，他尖刻、富有攻擊性的話語已成其荒誕狀的一部分，配合飲酒後種種越份的行徑，他將任誕作風執行至極至，藉此自存本心，連同兒子也被保護起來。兩人均以荒誕狀作為偽裝，或因機遇、個性、堅決的程度，所以兩人的諧趣還是有些許不同之處。

第四節 小結

儘管西方出現諸多幽默理論與學說，諧趣的定義相當難以界定，因為諧趣雖

⁴⁸ 同註 29，頁 518。

⁴⁹ 同註 28，卷 49，頁 1360。

然有一些顯著的特徵，如引人發笑或帶來愉悅感，這些特徵都有失效的時候，因為要成功使人發笑，必須出其不意，超出聽者的期待；若說要帶給人愉悅感，以哪一方為基準又是另一個問題。因此，本文採取較為寬泛的定義，以諧趣為有潛力使人感到愉悅或（但不必然）引人發笑的「不協調」特質，另以「幽默」指前述墨瑞爾所據之《牛津字典》的定義，即行為、話語或著述可引起樂趣的特質。

「諧趣」專用於討論魏晉南北朝的諧作與情景；「幽默」則用於指示西方的理論基礎。諧趣的基本結構一般上有三個參與者，第一人是諧趣的說者或作者，第二人是被調侃或譏刺的對象，也是付出面子代價的人，第三人則是旁觀者。諧趣的愉悅由三方來收割，但是在有些情況下，只有第一人及第三人（甚至只有第一人）享受這份愉悅感，第二人的面子代價太大，所以無法與其他二人同樂。蓋第二人若因面子代價而採取報復行動，危及第一人或遷怒於第三人，諧趣便以失敗告終。無論如何，這份愉悅感以及想發笑的欲望是執行諧趣最直接的追求。

西方古典幽默理論對幽默的本質作出諸多研究和論述。然而中國古代卻不在這方面琢磨，而視諧趣為一種話術、撰文的筆法或傳達訊息的載具，從諧趣中收穫的愉悅感有什麼樣的意義才是中國古典諧趣理論的著力點。《文心雕龍·諧謔篇》以太史公的〈滑稽列傳〉為最上乘的諧趣，因為列傳中的人物以諧趣完成一個大我的任務，巧妙地諷諫人君向善、改變生活作風、婉轉地提示人君的不足及錯誤，從而改善國家的命運，種種行徑均屬利他性質。〈滑稽列傳〉標幟諧趣的第一個目的或作為——諷諫人君。時代推移至西漢，劉勰以為諧趣出現了墮落的趨勢，如東方朔、枚皋等人利用諧趣取悅武帝，兼露才揚己；又如是時的交際場合，文人之間以諧趣作為交往酬酢的工具。由此來看，諧趣的第二個目的為自娛娛人。墮落的趨勢並未停止，諧趣也可用於攻擊、反擊或侮辱他人的武器，諸如歧視他人的外貌、揭人之短等行為，此種諧趣帶有傷害他人的意圖，也是本文序列的第三個目的。第四個目的是自存性命或本心而故作荒誕狀，所以有偽裝的意味，這種諧趣在竹林名士中較常見。

(空白頁)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文人作品的諧趣表現

儘管不協調大致是各種諧趣的共同點，然而在文章作品以及其他情景裡的對話往來中，兩者表現不盡相同。茲就兩者分述。本章討論文章作品，包含文人的詩賦、書信、公文如奏章表論等；下一章則討論不同情景的對話，即涵括文人之間往來交際上的對談。

第一節 傳統文體的新內容

《文心雕龍·詔策》曰：

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救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

公文的文體在秦漢時代獲得確立，策、制、詔、戒敕四種文體乃上行下的公文。另外〈章表〉曰：

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章、奏、表、議為下呈上的公文。這幾類文體皆擁有高度的莊嚴性、嚴肅性。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逐漸在這些公文注入詼諧旨趣，從而揭露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所呈現的不協調。現代學者李士彪氏對此有所觀察：

作為體裁，俳諧沒有固定的格式。它像寄居蟹一樣，寄居在別的體裁中。它可以借用多種體裁，來達到幽默滑稽的效果。⁵⁰

⁵⁰ 李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頁162。

當代的若干諧趣作品其實不僅僅停留在「幽默滑稽」的程度，作者往往有更深刻的意涵，許多為針砭時政或批判社會現象的作品。這與中國古來的諧趣傳統仍有一定關係。另外，仇國華氏也認為南朝奏議文出現變格的現象：

南朝奏議文中有少量「擬體」，其文章體式為奏議類，文體功能卻並非用於進御，實為文學之文。……此類擬文或為遊戲之作，無關事實，抑或有所寓意，含沙射影。由於文章寫作背景多難考實，因而難有定論。⁵¹

事實上，公文文體打破制式的書寫發生在更早以前，以曹操（155-220）〈追稱丁幼陽令〉為例：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病，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遣歸，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⁵²

〈追稱丁幼陽令〉不似一篇公文，反而像一篇雜文，曹操回憶一個故人以及一段往事，文字溫暖，富有人情味。在這段故事中，曹操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當朝丞相，他也擁有凡夫的恐懼。儘管昔狂今不狂，可是曹操與丁幼陽開玩笑之際，仍不免流露一絲絲小心翼翼的態度，生怕丁幼陽狂疾復發，在一旁的他平白無故遭殃。丁幼陽本來只是曹操的同鄉，卻能夠使權傾天下的曹操半開玩笑半哀求地跟他商量不與他共宿，這篇令文其實已經含有諧趣的元素。

除了公文，其他嚴肅、莊重的文體如論體，或說設論體，也從莊重的說明及論證文體，變成當代文人用以書寫諧趣的媒介文體，但是其說明及論證性質卻沒有改變。論體在此時期有莫大的發展，為當代文人喜用的書寫手法。下文將次第

⁵¹ 仇國華：《秦漢魏晉南北朝奏議文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4月），頁150-154。

⁵²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日本：中文出版社，1981年6月），頁1066。

討論。

叔本華以為發笑與諷諧的對立面是認真 (seriousness)。一個最符合認真的協調狀態是最容易被最無關緊要的不協調所戳破的，所以兩性話題最容易被打趣，像許多黃段子的出現便由於如此，因為這類話題的基礎最為嚴肅，在某些年代甚至到了禁忌的程度。⁵³因此要發現與理解文本中不協調而形成的諧趣，必須先對其文體的正統有所理解。本節將先就相關文體，梳理《文心雕龍》以及其他相關的文學批評著作所歸納的書寫傳統，或者以其推舉的模範文章作為比較的基準，從而探析若干諧趣文的矛盾與不協調之處，進而理解作者的書寫意圖。

一、九錫文

九錫文屬策書一種，其發源可追溯至西漢王莽（前 45-23）時期。王莽所拔擢的部屬陳崇（?-?）上奏，稱頌王莽，以為其輔佐王室的功勞堪比周公，不加九錫不足以賞其功。奏章序列王莽私德清廉高尚，樂道孝友，克制自愛；於公，王莽忠於漢室，數除奸佞如淳于長（?-前 8）、董宏（?-?）、董賢（前 23-前 1）等，對朝廷一片丹心；故請朝廷比照周成王賜周公，「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是時，九錫之議暫因呂寬之事而擱置。後來王莽大力設置經學博士，網羅數千人。這批人重新上奏序數王莽之功，請朝廷封賞王莽，終於得到朝廷的允許（《漢書·王莽傳上》）。周壽昌（1814-1884）注王莽之九錫曰：「一衣服，二車馬，三弓矢，四斧鉞，五秬鬯，六命珪，七朱戶，八納陛，九虎賁。」⁵⁴

自此以後，歷朝更迭，大臣的勸進文以及皇家的九錫文成為末代皇帝「禪讓」的前奏曲，漢末之際有潘勗（?-215）〈冊魏公九錫文〉；魏晉之際有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牋〉、魏元帝曹奂（245-302）〈策命晉公九錫文〉；晉與劉宋之際有傅亮（374-

⁵³ 同註 15，頁 99。

⁵⁴ 同註 25，頁 1695。

426)〈策加宋公九錫文〉；劉宋與蕭齊之際有王儉(452-489)〈策齊公九錫文〉；蕭齊與蕭梁之際有任昉(460-508)〈策梁公九錫文〉；蕭梁與陳之際有徐陵(507-583)〈冊陳公九錫文〉；北朝亦然，東魏與北齊之際有魏收(506-572)〈冊命齊王九錫文〉；北齊與隋之際有李德林(531-591)〈冊命齊王九錫文〉。其他篡位失敗的逆臣居然也多獲得九錫文，包括桓溫桓玄(369-404)父子以及八王之亂的趙王司馬倫(?-301)等，九錫文幾乎成為逆臣昭告篡位倒數計時的標誌已十分清楚。

九錫文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即長篇序列賞賜對象的功德，以佐證九錫的合理性。茲節錄〈冊魏公九錫文〉為例：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蕪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箠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

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⁵⁵

序列賞賜對象的功業一般都有類似「此又君之功也」的字眼，而且也是九錫文的主要內容。作者把賞賜對象描述得正大光明，是國家不可多得的棟梁之材。文章也都寫得雍容大雅，《文心雕龍·詔策篇》即以〈冊魏公九錫文〉為「典雅逸群」。

劉宋袁淑（408-453）卻有三篇諧趣的九錫文——〈雞九錫文〉、〈驢山公九錫文〉、〈大蘭王九錫文〉——篇幅都不長，以及一篇勸進文〈勸進牋〉，附在〈雞九錫文〉之後。茲錄各篇文章如下：

〈雞九錫文〉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雒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為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浚雞山為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⁵⁶

〈勸進牋〉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鳧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勳加鵷鷺，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令鳳鵠等在柏外，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樓下以聞。⁵⁶

〈驢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邗，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

⁵⁵ 同註 26，頁 904-906。

⁵⁶ 同註 52，頁 2681。

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麩，負磨回衡，迅若轉電，惠我眾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眾能，是用遣中大夫閻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中廬公。⁵⁶

〈大蘭王九錫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群形於玄質，體肥腠而洪茂，長無心以游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千世，此君之美也。白躡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游，唯君為雄，顧群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駟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⁵⁶

九錫文的賞賜對象無一例外是位極人臣，人人趨之若鶩的權貴。然而，袁淑卻以九錫文來賞賜一隻雞、一頭豬及一頭驢。在這三篇九錫文當中，敷陳雞豬驢三者功業都荒誕可笑。所謂的功業一部分，甚至專門針對牠們天生的外形特徵——浚雞山子「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驢山公「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大蘭王「體肥腠而洪茂」、「歎沫」、「奮鬣」，這些形容皆為雞豬驢不費努力就擁有的特質，獲頒九錫實屬無稽。至於牠們的作為同樣是近乎其本能——浚雞山子啼叫，「乘機晨鳴」；驢山公是負重，「荷囊致餐」，以及拉磨，「負磨回衡」；大蘭王則是「資豢養於人主」，成為肉豬。任何雞豬驢都可以勝任，何以符合封賞九錫的資格？除此以外，〈雞九錫文〉與〈大蘭王九錫文〉看似正式載錄封賞的日期，但是卻與封賞對象的生肖相關。「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連續用了三次「酉」，即對應雞，所謂「神雀元年」的神雀即雞的美稱；「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也採取相同的筆法，以「亥」對應豬。〈驢山公九錫

文〉或因驢未有對應的地支，所以沒有採取類似的書寫。如此粉飾誇大雞豬驢的功業，並且鄭重其事地記錄封賞的日期，作者企圖仿效真正九錫文的莊嚴感，可是愈正式，這三篇九錫文因封賞對象為三隻畜牲愈發顯得不倫不類。

其實從最早創為九錫文這種特典開始，九錫文就幾乎可以看成是一種充滿不諧調，甚至充滿諷刺性的文體。因為賞賜的對象都是一群磨刀霍霍，等不及篡位的權臣，可是九錫文卻將之粉飾為正直偉大的國家棟梁。若說在袁淑眼裡，這些所謂的人中龍鳳不過是畜牲一般的人物也不為過——所謂的功業也不過是這些號稱社稷功臣乘勢而為的行為模式，正如雉雞啼叫、驢騾負重拉磨、肉豬供人果腹一般，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卻被部屬眾星拱月地大肆奉承，提升至豐功偉業，堪比周公之於成王。這些被吹捧的權臣自鳴得意的醜態，宛如抬頭挺胸的雞「天姿英茂」，其樣貌體態如「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的驢，其實則「體肥臃而洪茂」，不堪入目。

袁淑不但諷刺這些功勞蓋世的權貴，三篇九錫文阿諛奉承的口吻也在諷刺著歷來書寫九錫文的作者。〈雞九錫文〉形容浚雞山子「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不過是站著啼叫，就奉為「奇聲」；〈驢山公九錫文〉曰：「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豪分不忒」，也就是待命不動，偶爾嘶鳴，居然被奉為智慧；「負磨回衡，迅若轉電，惠我眾庶，神祇獲薦」，拉磨也能誇張成奇能大功；〈大蘭王九錫文〉曰：「稟太陰之沈精，標群形於玄質，體肥臃而洪茂，長無心以游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竟把豬的肥胖與無能為力美化成品格的純良；「白臆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更屬過度聯想，無中生有；「俯歛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則是把豬醜惡的體態粉飾成威猛的形象。三篇九錫文阿諛奉承的口吻突顯一個荒謬的書寫態度，也反諷了其他作者書寫九錫文諂媚的態度。

〈驢山公九錫文〉以及〈大蘭王九錫文〉諷刺的對象是什麼人，如今已不得

而知，⁵⁷但是〈雞九錫文〉與〈勸進牋〉或影射始興王劉濬（429-453）。「濬」與浚雞山子的「浚」為異體字。⁵⁸袁淑曾經出任劉濬的北長史以及南東海太守。〈袁淑傳〉曰：「淑憲為誇誕，每為時人所譏」。⁵⁹袁淑第一次與劉濬的會面，兩人的機鋒相對就充滿諧趣：

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⁶⁰

這不是兩人惟一幽默的交鋒：

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懜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味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

⁵⁷ 宋前廢帝（449-466）曾稱叔父湘東王劉彧（即宋明帝，439-472）為「豬王」（參見《宋書·文九王》，卷 72）、東海王劉禕（436-470）為「驢王」（參見《宋書·文五王》，卷 72）。然宋前廢帝乃立於宋文帝之後，也就是說袁淑此時已過世，不可能得知宋前廢帝云云等事。不過筆者臆測宋前廢帝卻可能取材自袁淑九錫文或當時盛傳湘東、東海二王的綽號（今或已不得而知）去譏笑二王。儘管如此，從二篇九錫文以及二王的記載來看，筆者難以確定「大蘭王」、「驢山公」為湘東、東海二王。茲補充說明，以資參考。

⁵⁸ 同註 31，頁 1268、1333。

⁵⁹ 同註 28，卷 70，頁 1839。

⁶⁰ 同註 28，卷 70，頁 1836。

壁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⁵⁹

劉濬派人送了三萬錢給袁淑，隨即又說送錯了，要把錢取回，借此讓袁淑空歡喜一場，順便等著看袁淑出洋相。殊不知袁淑回信給劉濬，以忠臣之姿為了不讓劉濬隨便「一與一奪」，蒙上糟蹋義士的罵名，順水推舟把三萬錢據為己有。

劉濬與其兄劉劭（424-453）在歷史上被稱作「二凶」。劉劭是當時的太子，聯合劉濬製造巫蠱事件，弑殺宋文帝（407-453）。劉劭即位三個月，其弟武陵王劉駿（430-464）率軍征討，大敗劉劭軍隊，劉劭劉濬先被生擒後斬首，投屍江中。劉劭篡位前夕，袁淑時任太子左衛率，正在值班，劉劭邀袁淑以及一同值班的蕭斌（?-453）加入太子集團，遭到袁淑嚴正的拒絕：

二更許，（劉劭）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及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節，況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為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息之。」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因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為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⁶¹

就算在生死關頭，袁淑不失黑色幽默個性，頂撞他的直系長官太子劉劭，反詰劉劭該不會是疾病發作才以下犯上：「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袁淑最終選擇忠於宋室而遭到劉劭毒手。另一方面，劉劭因為生母元皇后嫉妒劉濬生母潘

⁶¹ 同註 28，卷 70，頁 1839-1840。

淑妃(?-453)得寵，含恨而死，所以記恨潘淑妃與劉濬母子。劉濬擔心劉劭即位以後，會遭到迫害，因此對劉劭百般討好，成為劉劭心腹。巫蠱事件東窗事發，宋文帝即將處理劉劭劉濬，潘淑妃抱著劉濬求他悔改，以死謝罪，劉濬答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及劉劭派人殺死潘淑妃，然後騙劉濬說潘淑妃被亂兵殺死，劉濬對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劉劭劉濬諸事語在《晉書·二凶傳》。袁淑是劉宋忠臣，劉濬是悖逆之子，兩人的道德觀南轅北轍。袁淑曾是劉濬的部屬，對劉濬的品行必定了解，兩人自首次見面即有暗暗較勁的意味，一向相互調侃與諷刺對方。大抵因為如此，袁淑才膽敢犯諱，以浚雞山子影射劉濬，諷刺他一無是處以及藏有不軌之心。

九錫文作為最高封賞的公文文體，一方面書寫的方式極為莊嚴，另一方面又是權臣篡位的前奏曲，兩者高度矛盾。袁淑透過九錫文，將權臣與畜牲相提而論，藉機突顯、揶揄、羞辱他們的貪功冒利以及部屬急於阿諛奉承的無恥行徑。〈雞九錫文〉因主角取名為浚雞山子，「浚」觸犯劉濬名諱，很可能是袁淑有意為之，旨在諷刺劉濬。其餘二篇九錫文雖一時難以確定隱射的對象，然而觀其〈雞九錫文〉，推測袁淑亦意有所指，可能因為對方權勢更大，袁淑才不得不書寫得更加隱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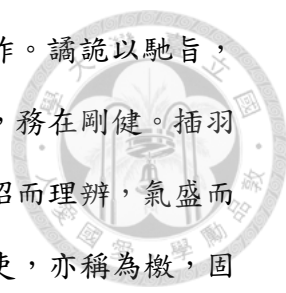
二、檄移

《文心雕龍·檄移篇》曰：

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檄移的書寫精神大同小異，檄文為軍隊出征以前，以厲辭責難對手，從而賦予征討對方正當性的文章；移文則較為平緩，以教化教導為目的。〈檄移篇〉又曰：

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弱，角權




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鞏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眾條，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材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檄移文的寫作特點即以簡單明快的文辭，向訓斥或教化的對象曉以正義，這個對象通常是下層官員兼及普羅大眾，文化程度參差，所以需要簡明的言詞促進檄移文的傳播及閱讀。作者以正確正直的姿態，企圖宣揚他所代表的一方之義理，因此檄移文也是一種宣揚理念的文類。

南朝齊·孔稚珪(447-501)的〈北山移文〉卻打破了檄移文一貫的寫作特點。茲先錄〈北山移文〉如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諂。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礪愧不歇。秋桂遭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臬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棧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于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污淥池以洗耳？宜烏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⁶²

〈北山移文〉與一般的移文大相徑庭。首先，孔稚珪並未直接闡述他要宣導的義理，而是以一個虛擬的山神宣洩被欺騙以後的憤憤不平，藉以突顯假隱士真求名利的虛偽。李善引《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鍾山之英，草堂之靈」似暗指周顒（?-?）本為高尚的俊傑隱士，然而其高雅的世外形象，於俗世不值一顧的高潔品行，不過是障人耳目的把戲。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一旦聘書送到跟前，便露出真面目，對當權者趨之若鶩。山神被自以為志同道合之士所欺騙，山

⁶² 同註 26，頁 1096-1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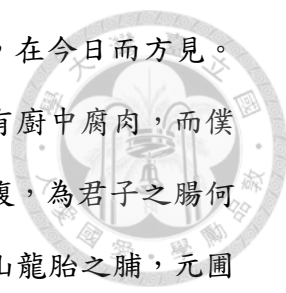


岳、林壑也趁機嘲笑山神上了小子的當。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山神決定不再接受周顒到山裡，以免山林再度被利用為粉飾周顒形象的工具。其次，〈北山移文〉未訓斥或教化任何人，包括周顒。這與傳統的移文很不同。〈北山移文〉更像山神的呢喃和埋怨，透過戲謔的書寫，敘說山神自白內心的心路歷程。本該有洞見的神明，居然也不敵隔著肚皮的人心，悲憤地控訴著周顒虛情假意。雖然〈北山移文〉未有訓斥或教化的對象，可是對周顒以及其他抱有類似目的的隱士，其諷刺的意圖斑斑可考。最後，〈北山移文〉的書寫並未採取簡明的散體，而是運用押韻的四六文，並且引用許多典故，時而憤慨，如「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時而幽怨低回，如「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這點也與檄移文簡單明快的用詞大相徑庭。

由於上述種種不協調，這篇移文的作用已經從宣導義理變成諷喻。孔稚珪運用諧趣的手法——洞察明鑒的神明卻有如凡人般，叨叨唸唸地控訴被欺騙的委屈。〈北山移文〉諷刺的對象固然主要是周顒，可是當時假藉歸隱賺取美名的偽君子也不少，這個墮落的社會現象也成為此篇移文批判的陋習。〈北山移文〉沒有移文本該肩負宣導義理，從而教化人心的作用，反而成為揶揄假隱士以及虛偽的社會風氣的文學作品。

另一篇運用諧趣的移文出自南朝梁吳均（469-520）之筆，叫作〈食移〉，茲錄如下：

月光離畢，風氣入簾，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恆情，羌難得而覩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雞有呼群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綺窗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恆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雁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泉綠菹之筍，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元圃鳳足之菹，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為不祥，於人為愆義。⁶³

吳均假托一名求仕者，請求權貴之士拔擢。這篇移文一開始採取比興的文學手法，從外在冷清的風景，接連到求仕者內心「企龍門而不見」的煩惱。儘管敘述的手法與傳統曉以大義的移文有所不同，可是與一般的文學作品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然而接著所言「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雞有呼群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便出現違和感。原來求仕者以「企龍門而不見」，說明自己求仕的意圖，然後要求對方要效法鮑叔、華歆，有分財讓位之義，求仕者實要求對方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而方法即為拔擢自己。求仕者希望得益於對方的權勢已相當明顯。求仕者暗示如果不提攜自己就不能稱為「仁義之君子」，如此的說法已近乎半要挾的狀態。道德是用以自我要求的行為規範，怎麼能夠用來要求他人？就算勸誡他人要遵循道德規範，出發點也應該是利他，而不是自利的，如此訴求不是誇張嗎？接著「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闈洞房，綺窗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恆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這是求仕者繼道德要挾以後，又祭出情感要挾，訴諸權貴之士的同情心，不可任憑故人深陷貧賤之窘境，這是更為露骨的說法。「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雁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

⁶³ 同註⁵²52，頁3306。

腸，何如哉？」這段話吳均雙雙諷刺了求仕者以及權貴之士，求仕者以「廚中腐肉」、「雁鷺之食」形容權貴之士的官祿，似乎表示權貴之士貪得不義；求仕者「不厭糟糠」，「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腸」，則以搖尾乞憐之貌自我矮化，對「廚中腐肉」、「雁鷺之食」趨之若鶩，展露寡廉鮮恥的醜態。最後求仕者羅列各種名菜美食，然後曰：「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為不祥，於人為愆義」，依舊是半要挾半討好的口吻。〈食移〉也沒有什麼教化作用，純屬諷刺時事之作。

吳均另有一篇檄文〈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應也是諷喻之作，茲錄如下：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勛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為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釁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呼，子羽濟川而怒目，攸飛舞劍而東臨，蓄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為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吒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鈎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燹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⁶⁴

所謂周穆王(?-?)沉璧的地方並不在江漢，也不是發生在南巡時，是西巡的時候。閩地當時也不在周朝的版圖內。據《穆天子傳》：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褱、帔帶、搢習、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沉璧

⁶⁴ 同註 52，頁 3306。

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⁶⁵

既然周穆王未在南巡之際，於漢江水域沉璧，時間地點皆不吻合，〈檄江神責周穆王璧〉一文所指的究竟是何人？所責求的玉璧又有什麼含意？吳均為什麼選擇檄這個文體？這裡姑且作一推測。

歷史上曾有另一位皇帝曾在長江水域沉璧，《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是故〈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所指的君王很可能不是指周穆王，而是秦始皇。〈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曰：「自郢徂閩」，郢是楚都，位於〈秦始皇本紀〉所稱「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的南郡⁶⁶；閩地在周代並不屬於周朝的領土，在秦朝方設為郡，〈考證〉引梁玉繩曰：「始皇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皆在二十六年後。」⁶⁷。秦始皇所到的湘山雖不在閩中，可是湘山與閩中均在郢都的東南方。⁶⁶

⁶⁵ 顧實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6月），頁28-31。

⁶⁶ 參看張其昀監修，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71年6月），頁13-14。

⁶⁷ 同註21，頁117。

因此〈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文中周穆王云云與秦始皇南巡的路線十分相似。

如果〈檄江神責周穆王璧〉的周穆王暗指秦始皇，那麼責求的玉璧所代表的意涵就很可能猶如「今年祖龍死」的亡君亡國凶兆。吳均生於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卒於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其青壯年跨越整個南齊卻未曾在南齊出仕，要晚至梁武帝天監年間才出任郡主簿，當時吳均已三十幾歲。⁶⁸吳均很可能有意避開南齊動輒得咎的政治環境。在齊武帝（449-493）駕崩以後，南齊有五位皇帝，由於皇位篡奪頻密，所以在位時間都偏短，政治因此急轉直下。在這五位皇帝當中，以齊明帝蕭鸞（459-498）及東昏侯蕭寶卷（483-501）父子最為殘暴，兩人誅殺多位蕭室子孫以及朝中大臣，生活作風荒淫奢侈，多次興造宮殿，語在《南齊書·明帝本紀》與〈東昏侯本紀〉。吳均或在此背景之下書寫〈檄江神責周穆王璧〉，責求沉江玉璧可能是吳均諷刺南齊如秦朝一般，天命已絕。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是一篇奇特的檄文，吳均大抵出於自我保護的考量，所以寫得非常隱晦，因此讀者很難完全理解這些隱喻箇中真正的意涵。但是若以秦始皇渡湘江的故事為背景的話，這篇檄文就變得合理。秦始皇這段事跡有很多奇幻的情節。最初，在往湘山祠的途中，江上刮起大風，當時意氣風發的秦始皇遷怒湘君神，伐樹罪山。八年後，當時本該沉在湘江的玉璧突然出現，而且過程十分離奇，有人在夜裡把一塊玉璧交給始皇的使者，然後說了一句「今年祖龍死」的預言就神秘地消失了。這塊玉璧後來證實是當年沉於湘江那一塊，秦始皇當時也以為神明顯靈，所以才說「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語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果〈檄江神責周穆王璧〉以這個故事為背景，那麼吳均的寫作邏輯就有跡可尋了。玉璧的重現彷彿在告示江神賞善罰惡的意志——如果天子失德，江神將收回天命。故吳均向江神發難，以為南齊已經失德，應該把天下交出來；如果

⁶⁸ 〔隋〕姚察、〔唐〕魏徵、姚思廉同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梁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80年），頁698-699。

江神不將南齊沉到江裡的玉璧交出來，便有失神明的職責，得以討伐之，而征討江神即征討南齊。檄文為興兵事以前，鎮懾對手的文章，「公孫躡波」、「子羽濟川」、「攸飛舞劍」、「菑丘南逐」、「川人勇俊」皆言辭上的譎詭煒燁，在神話色彩的掩護之下，吳均似乎要南齊交出天下。可是他的悲憤隱晦得彷彿只閃耀於一瞬，便消失在天馬行空的神境裡，而人事時地的錯置，也使這篇檄文充滿不協調的奇趣。

三、表

表為下呈上的公文，在戰國以前，與章無大差異，皆稱為「上書」。⁶⁹詹鍇氏注曰：「漢代的章表今已無存。魏晉南北朝把奏議統稱為表，例如諸葛亮（181-234）的〈出師表〉、曹植（192-232）的〈求自試表〉、李密（224-287）的〈陳情表〉，只是有的以言政事為主，有的以表達哀情為主。」⁷⁰

至於此一文體的書寫傳統，《文心雕龍·章表》曰：

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貴，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屈，必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

劉勰以為表必須兼顧內容與文采，內容須雅正而且言必有據，不宜多賣弄文采，清麗簡約為上，兩者並重方有利於讀者在內容上的理解，同時也便於誦讀。後代

⁶⁹ 《文心雕龍·章表》：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

⁷⁰ 同註 17，頁 820。

有些文學批評著作卻以為表體應簡潔，不可艱澀，反而未注重文采上的表現。詹氏引唐·牛希濟〈表章論〉：「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奧學深文，研窮古訓。……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倘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略不為難。……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倘端明易曉，必庶幾免於深僻之弊」⁷¹，詹氏進而把牛希濟與劉勰的立場作一番比較，以為：「這些話和劉勰所說的『繁約得正，華實相勝』也稍有出入，而更注重簡要和『質勝於文』，這是為了易於為最高統治者所『省覽』而設想的。」⁷¹無論文采上的表現是否重要，表所要傳達給人主的内容必須「循名課實」，意涵雅正。

南北朝時也有以表體作諧趣文的事例。《太平廣記·詼諧二》：「後梁王琳，明帝時，為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臧否人物，眾畏其口，常擬孔稚珪。又為〈鮒表〉，以託刺當時。」⁷²王琳(?-?)的〈鮒表〉假托鮒魚上表以謝人主隆恩，口吻諂媚：

臣鮒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糝蒸將軍、油蒸校尉、才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臨憑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綺羅，白鮪女兒，豈期心于珠翠？臣美愧夏鱸，味慙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鼈巖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鈞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煩象筋，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佩櫛，輕瓢纔動，則樞槩如雲。濃汁暫停，則蘭膏成列。婉轉綠壘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鑪門奉表以聞。

⁷¹ 同註 17，頁 847。

⁷²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 247，頁 1910。

詔答：省表是公卿，池沼縉紳，披渠俊乂。穿蒲入藻，肥滑系彰。正膺茲選，無勞謝也。⁷³

〈鮒表〉與前述〈食移〉有些相似之處，王琳假托佞臣，自我矮化，言之鑿鑿地向統治者輸誠，表示願意奉獻一切，並且惺惺作態地反省自己，辭謝不遑。如此諂媚口吻實以譏刺寡廉鮮恥向統治者阿諛奉承的官場小人；「詔答」則陳示人君甘之如飴地接受奉承。

表文本是嚴肅莊重的文體，初用於向人君陳述政事，後來擴展到陳情之用。當表文用於陳情之際，作者的表露的情感必須真摯不做作，如〈陳情事表〉，李密陳述自己自幼喪父、母親改嫁及祖母撫養成人的家世背景，因此不得已而辭謝除官的命令，以奉養祖母終老，⁷⁴字裡行間透露著無限真情。然而，當表文用於獻媚，其莊嚴性便將大打折扣。推而廣之，如此玷污朝堂之文，人君與人臣的威儀自然也不復存在。王琳〈鮒表〉乍看像遊戲之作，內容充斥誇張露骨的輸誠之辭，以致讀者一時難以察覺作者背後針砭時事的意圖。然而仔細探析，便可察覺這篇表文之所以能夠突顯其荒謬感，以及人物的行為模式與道德範式相衝突的違和感，這巨大的反差正源自表文為一本正經的公文，然而所述人物卻卑鄙可恥。質言之，公文文體直接或間接奠立了正規的道德典範，但是王琳卻在內文上呈現人物卑劣的行為模式，這些行為模式與公文的道德典範激烈衝撞，因此產生巨大的不協調。再者，公文文體夾帶了王琳譏刺對象的訊息，因為公文文體的使用對象是相當固定的，即本該是高高在上的朝堂之士。但正如莊子把曹商與舐痔者相提並論一般，王琳將朝堂之士與牲畜並列，使本該忠義皆備的官場措辭，透過畜

⁷³ 同註 52，《全梁文》，頁 3361。

⁷⁴ 李善引《華陽國志》：「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贍。」同註 26，頁 945。

牲之口道出，瞬間變得滑稽古怪，高高在上的形象立即破滅，等級還與牲畜同列。

〈鮒表〉即在文體與內容兩股力量的拉扯下，迸發諧趣，突顯荒誕的官場現象。不但〈鮒表〉如此，袁淑的三篇九錫文及勸進文亦如此。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和吳均的〈食移〉、〈檄江神責周穆王璧〉雖未以畜牲角色扮演，但是其公文文體的嚴肅性與內容的滑稽相衝突而產生的諧趣，皆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設論

《文心雕龍·雜文篇》云：

原夫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體之大要也。

設論體是文人懷才不遇之際，寄情文章，解釋自己未能功成名就的理由，並以固窮守節明志。詹注引《漢書·東方朔傳》：「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⁷⁵《文選》選取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前 53-18）的〈解嘲〉及班固（32-92）〈答賓戲〉都以這個模式進行。在設論體中，作者往往先用「客問」來框定議題的範圍，然後在「主答」的部分提出贊同或反對的論述。以〈答客難〉為例，「客問」把蘇秦和張儀列為人臣中最成功的例子，東方朔在「主答」便解釋這兩個人可以發揮才幹，達到如此成就，是因為處在亂世，而他身在漢武盛世，並不具備這個條件。〈答客難〉對世道的討論，如蘇張處亂世的例子，都是東方朔為了辯護自己為何無法功成名就而設，其論述的議題一直縈繞在處世的選擇中。揚雄的〈解嘲〉及班固〈答賓戲〉也都因循這個脈絡，不過揚雄與另外兩篇稍有不同的是他對世道尚有所批評：「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

⁷⁵ 同註 17，頁 499。

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⁷⁶可是對世道的批評不是文章的主軸，揚雄主要還是集中在自己人生選項的討論中。到了張衡（78-139）的〈應間〉還是如此。

然而從蔡邕的〈釋誨〉開始，這類文章從討論出處進退的選項，轉移到針砭時事。〈釋誨〉的「客問」即鎖定當時世道的概況：「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于此時，遭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⁷⁷在「主答」的部分，蔡邕幾乎把所有篇幅都用在陳述理想政治的狀態，然後運用理想的狀態檢驗當代的政治，陳列當代政治的弊病。至於出處進退的討論，蔡邕的邏輯是——在如此混沌不清的政治，要求士人有任何作為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兼善天下的途徑，所以他情願獨善其身。也就是說，就算是出處進退的討論也都用以服務針砭時政的目的。陳琳（?-217）〈應譏〉的「客問」也跟〈釋誨〉一樣觸及時政的狀況，不過陳琳的態度還是迎合當政者的，所以「主答」流於歌功頌德，這還是與評論政治相關。如此一來，從蔡邕開始，設論文已經不純粹「發憤以表志」，也失去了「以自慰諭」的目的。比較當代政治與理想政治的距離，藉此針砭時政，成為設論體的內容。魏晉南北朝所謂的設論文都套上設論體以「客問主答」討論出處進退的形式，進行政治批判，以及傳達個人的訊息。此期的設論文大多因循蔡邕的〈釋誨〉，其實都是設論體與論體雜糅的產物，而且可能更傾向於論體一些。

對於論體，《文心雕龍·論說篇》云：

聖哲彞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

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⁷⁶ 同註 26，頁 1129。以下〈解嘲〉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⁷⁷ 同註 52，頁 872-873。以下〈釋誨〉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簡而言之，論體是敷陳真理的文體。欲敷陳真理，撰者不得不辨名析理，〈論說篇〉繼云：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於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辨正然否」、「貴能破理」即指論體必須要能在衆說紛紜中推翻假象，找到真理，在諸多選項中尋得最佳辦法。詹氏注云：「『鑽堅求通，鈎深取極』就是說要打攻堅戰，把道理鑽通，從而鈎取出極其深刻的結論。要像轉螺旋似的，節節進逼，達到最深的一層。要能掃清論述中的一切障礙，才能豁然貫通。」⁷⁸

劉勰序列論體的品目，總結出四個品目——陳政、釋經、辨史、銓文，設論不在其中。如前所述，劉氏把它歸為雜文。然而，昭明太子（501-531）在《文選》設置了設論體。蔣伯潛氏（1892-1956）分析設論體作了如此的評述：

《文選》把「論」分成三類：一是「設論」，一是「史論」，一是「論」。它所選的設論是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三篇。這種設論，完全假託的，而且目的是借此發牢騷，上之和《楚辭·卜居》，下之和韓愈〈進學解〉，同一作法。嚴格地說，是辭賦的作法，不是論說底作法。（〈論說〉）⁷⁹

對於設論體的作法，蔣氏在〈辭賦〉進一步說明：

「設論」，如東方朔〈答客難〉等，雖無賦底名稱，實是賦底作法。……

⁷⁸ 同註 17，頁 697。

⁷⁹ 蔣伯潛編著：《文體論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42年6月），頁 88-89。

縱橫游說之士，與詩賦有密切的關係。章學誠《文史通義》有云：「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子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務》之義也。」……「賦者，鋪也。」（《文心雕龍》語）賦雖直陳其事，也用一種鋪張的寫法；這就是章氏所謂「恢廓聲勢」。辯士遊說，外交辭令，往往也用這種「設辭託諷」、「假設諧隱」和「恢廓聲勢」底方法。⁸⁰

魏晉南北朝的設論文大體乃設論體與論體的結合，固然採用了辭賦「設辭託諷」、「假設諧隱」和「恢廓聲勢」為寫作手法，其書寫宗旨仍不離論體的「辨正然否」，尤其《文心雕龍·論說篇》云「江左群談，惟玄是務」，清談的辯論風氣既盛行，自然也會促進論體的發揚。早期的設論文——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以作者的出處進退為題材，蔣氏以這三篇文章為作者發牢騷之作，雖然不無道理，但是從蔡邕的〈釋誨〉開始，如前所述，設論文已超脫發牢騷，進入論體的範疇。

然而論體的的類型多樣，魏晉南北朝的設論文應屬哪種類型的論體？蔣氏依梁啟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提出五個議論文的種型——說喻、倡導、考證、批評及對辯，⁸¹其中針對「對辯」類型，蔣氏云：

至於和別人站在對面的立場，互相辯難，或者事實上並沒有和我對辯的人，而在文中假設有一站在對方的人，和我一層地辯難；這種論說文，便是「對辯」了。⁸²

魏晉南北朝的設論文如果是設論體與論體的結合，其論體的特質則偏向「對辯」

⁸⁰ 同註 79，頁 164-165。

⁸¹ 同註 79，頁 81。

⁸² 同註 79，頁 88。

的形式，以「客問」為「對面的立場」，撰者則藉「主答」提出辯難。至於「對辯」的書寫態度，蔣氏則認為：

「對辯」須憑純粹的客觀的理智；萬萬不能加入主觀的情感。否則，……對辯尤易引起無謂的糾紛，甚至出一嘲弄嫚罵，失了學者底態度。⁸²

此期的設論文則未必遵照「對辯」的書寫態度。撰者的目的往往不盡相同，有的誠然為了批評時政，有的卻是為了作某種政治表態。他們多憑藉闡述出處的選擇，然後在「時」的討論中，營造諸多不諧調，或直接或間接地評斷當時的政治現狀。

「時」一般指示時機，而時機則與政治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於是時機的討論遂成為突顯時下政治的重心。作者固然可以理性對待，但設論文在某程度上，始終保留了對於出處進退的討論，而這方面關乎作者的道德哲學與晉升的利益，基於這個立場，作者無法完全客觀地置身事外，所以他們的設論文往往呈現相當的情感。這也是此期設論文不免表現為設論體與論體交雜的特質。茲舉數例以綜合說明此期設論文的內涵與文體特性。

西晉·夏侯湛（243-291）的〈抵疑〉因循設論體，以客發問夏侯湛何以於邦有道之時不積極進取，夏侯湛則以己之不足回應。文中多次談及「時」：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⁸³

（客曰：）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

夏侯子曰：「……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

⁸³ 同註 52，頁 1855-1856。以下〈抵疑〉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露狂簡而增塵垢。」

文中亦多次稱道當時政治清明，也是討論「時」的開展與延伸：

（夏侯子曰：）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游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

（夏侯子曰：）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

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

然而吊詭的是文中或透過客之提問，或由夏侯子的答述，盛讚夏侯子的才華：

（客曰：）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

（夏侯子曰：）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

於是最大的矛盾或不協調便浮現——何以一個自幼才德兼備的人，在一個有道之邦不得大放異彩？是人無才，還是邦無道？夏侯湛自述他當時的待遇是如此：

(客曰：)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

(夏侯子曰：)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

(夏侯子曰：)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于鄙劣，而莫之能起也。

夏侯湛認為自己的懷才不遇，猶如「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試問若邦有道，何以從小聰慧，博覽六經及百家之學的人「英耀禿落，羽儀摧殘」，「頓于鄙劣，而莫之能起」？在文中，夏侯湛兩度捅破這項刻意形塑的不協調，直接道出當時的政治現實，但是隨即又以個人的無能及失言自責，回到不協調所提供的掩護：

(夏侯子曰：)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

(夏侯子曰：)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勛，抵捩管仲，蹉電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養真。雖力挾泰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蹙蹙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

朝堂之上充斥著穿金戴銀卻不學無術的人，但是輿論都由這些人主導，飽讀六經和百家之學的人反而是極少數，其言談被視為糞土，要改變陋習作風根本是杯水車薪，有志之士無法力挽狂瀾；古之君子深曉居安思危的道理，所以求才若渴，當代的在上位者卻偏聽偏信，自以為任用的人皆媲美古代賢能，自詡自處的時代堪比黃帝、唐堯，因而沾沾自喜，傲慢自大，所以不肯踏踏實實地任人以賢，努力致治。這才是夏侯湛的真心話。前述對當時政治的稱道皆反語：天下雖已統一，但是天子未以茂德君臨天下，世臣之胤亦非天下之彥，既然「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⁸⁴，所以夏侯湛選擇效法「季札抗節于延陵，揚雄覃思于《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紕于士官。」由此可見，夏侯湛的〈抵疑〉沒有因循東方朔〈答客難〉「用位卑以自慰諭」的宗旨，而是繼承了蔡邕〈釋誨〉的模式——明裡探討出處進退，實際上卻針砭時政，也就是設論體與論體交雜的產物，同時其中的辛辣諧趣也不言自明了。

在同一期的王沉（?-266）〈釋時論〉乾脆省略第一人稱假裝探索用世出處的佈局，直接設計第三者的對話，因此批判時政的痕跡更加顯著，也進一步向論體靠攏，但是針砭時事的内容仍多不協調之趣味，仍不出此期的設論文。〈釋時論〉著錄一個寒門子弟冰氏之子問途於隱士東野丈人。東野丈人於是藉機剖析世道的形勢：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冱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

⁸⁴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1989），

〈泰伯第八〉，頁 5400。以下〈論語〉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⁸⁵



這場對話寓意甚深，源自《論語·微子篇》，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的典故。而且本篇設論文以「釋時」為篇名，對「時」的討論再明顯不過。因此〈釋時論〉有針對時政指點迷津的意涵。東野丈人對當時的政治亦採取先褒讚後否定的手法：

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胸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粗發為高亮，韞蠹者以色厚為篤誠，掩焚者以博納為通濟，視視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嘽閃者得清剽之聲，嗆啞怯畏于謙讓，闖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于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向而遠視，鼻齶齶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教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于所受，聽采惑于所聞。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閹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于靖室，疏賓徙倚于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

⁸⁵ 同註 52，頁 1974-1975。以下〈釋時論〉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
欲聘韓盧，時無狡兔，眾塗圯塞，投足何錯！

東野丈人對時政的稱道只有短短地幾句話就結束——「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可是東野丈人在此之前便已告示冰子「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出仕必須要有背景後臺支撐，否則便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對時政的稱讚不過是諷刺之辭。東野丈人痛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官場陋習，「賤有常辱，貴有常榮」，當時的官爵代代都由貴族把持，社會階級的流動猶如一灘死水，既得利益者的貴族階層皆是愚昧、奢侈、虛偽，「諂媚附勢」、「因資而隨形」皆稀鬆平常的事，有才德之士根本沒有向上的途徑，恪守儒家價值的寒門子弟也就更無插足的餘地。因此〈釋時論〉總結曰：

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于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沈。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卻尸晉，宋華咎深，投烏正幅，實獲我心。」

有志之士的出路只有固窮守節，遠離朝堂這個是非之地。

北朝末造盧思道（535-586）〈勞生論〉傳達的意旨與〈抵疑〉及〈釋時論〉也有相似之處，但是其批判力道沒有後二者來得尖銳。對於當時的政治，盧思道如此稱道：

今泰運啟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
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⁸⁶

⁸⁶ 曹道衡編選：《漢魏六朝文精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頁386-395。以下〈勞生論〉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然而盧思道隨即闡述對官場趨炎附勢的失望：

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溫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獲，睹時路之邇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嘆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撓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啖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簣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弦。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

盧思道對世態炎涼的刻畫十分深刻，如此狀態恰恰是常態，豈是一朝一夕改朝換代就能根除的現象？質言之，儘管「泰運啟開，四門以穆」，皇帝換了，留下來當官的仍然是同一批人。盧思道即當過北齊、北周以及隋代三朝的官。⁸⁷儘管如

⁸⁷ 盧思道曾任北齊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丞相西閣祭酒、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北

此，盧思道對新時代還是有些期許：

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斫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跡，礫石變成瑜瑾，莨莠化為芝蘭。曩之扇俗攬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斯之謂乎！」

「聖人作而萬物睹」，盧思道寄盼隋文帝能夠成為引領新時代的聖人，因此文末亦夾帶對當朝的諫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跡，礫石變成瑜瑾，莨莠化為芝蘭。」這番諫言標誌著盧思道個人對新朝代的善意，也是〈勞生論〉在批判政治現狀的同時，比〈抵疑〉及〈釋時論〉來得和善之處。

在這三篇批判時政的設論文當中，最尖銳的要數夏侯湛〈抵疑〉。王沉〈釋時論〉與盧思道〈勞生論〉僅涉及朝堂的風氣與陋習，但是〈抵疑〉已直接點名國君。在稱道時政的時候，夏侯湛曰：「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並且在比較今古作風的異同之際，夏侯湛兩度提及天子之作為：

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

周時代，其官位等同三司；隋代，盧思道當過文帝丞相、武陽太守、散騎侍郎。參見〔唐〕李延壽撰、〔民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85年3月），卷30，頁1075-1077。

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

夏侯湛於第一段引文敘述「古者天子」畫土封后、「在位者以求賢為務」的作為；於第二段引文則讚揚「古之君子」、「居位者」的德行。因此當他後來否定當代的現狀，即也直接攻擊了當朝國君。在批判的立場上，〈抵疑〉是較嚴厲的。

設論文也不盡然只被用於批判世道，在有些情況之下，撰者也可趁機作政治表態。西晉·皇甫謐（215-282）〈釋勸論〉似乎對當朝沒有任何批判，而是對在朝者解釋自己長年嬰病，不適出仕，因此文中數度表示自己疾篤：

唯余疾困，不及國寵。⁸⁸

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

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

寢疾彌年，朝所棄也。

文中亦稱道時政與國君：

相國晉王闢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

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

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衝邁，此真吾生濯發雲漢、鴻漸之秋也。

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

與前述諸篇設論文不同，皇甫謐未以矛盾或不協調去推翻自己對時政的讚揚，而

⁸⁸ 同註 52，頁 1870-1871。以下〈釋勸論〉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是敷陳衰世政治角力的殘酷，以及創立新時代新氣象所應採取的態度與措施：

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顏闔恥于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忽者也。豈道化之本與！

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暗然而日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遁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味，得道之概；一馳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眾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

皇甫謐雖然沒有批判當朝，可是其諷諫也恰恰說明時政未臻至清明之世。然而，他的敷陳與建議依舊是一種善意的表現。

如果說皇甫謐對晉朝的態度是友善的，那麼東晉·曹毗（?-?）〈對儒〉的態度便可視為對當朝的積極擁戴。在這篇設論文中，「客問」的立場反而變成固窮守節於山林之間，遠離俗世的是非紛擾：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

「今子少希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楊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已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蔥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泛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駮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蕘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于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

「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為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于玄圃，蔭瑤林于蓬萊，絕世事而雋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鯢者矣。蒙竊惑焉。」⁸⁹

「主答」的立場則換作隨性自然的訴求，有志之士如果嚮往出仕，有志於事業，不妨追隨心之所願：

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

⁸⁹ 同註 52，頁 2076。以下〈對儒〉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粗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

「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克明于百揆，虞音齊響于五弦，安期解褐于秀林，漁父擺釣于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于慶雲，招儀鳳于靈山，流玉醴乎華閨，秀朱草于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喻晦朔，螻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雖然〈對儒〉顯示擁抱事業的意向，這篇設論文主要仍觸及在出世或入俗兩者間的思考與選擇過程，在儒道兩種路線之間，主體應採取何種態度，要如何自處，自我該如何安頓。〈對儒〉以僵化的道家思想為「客問」的依據，也是曹毗要反駁的立場。「客」一味地以為「士以藏器為峻」，何必在「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禍福難明的塵俗之地糾纏不清，「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努力？有賢德遠見的人應該「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曹毗的回應雖然擁護儒家入世的立場——「五典克明于百揆，虞音齊響于五弦」，可是其論證的原理卻來自道家。他認為天地瞬息萬變，人應該隨性自然，而不可局限於外在標榜的價值，真正達觀的人「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若有兼善天下的機會，何樂而不為，非要以退居山林為高潔？

曹毗〈對儒〉擁戴出仕的意向是較為少見的，一般設論文的立場均與〈對儒〉相反，西晉·束皙〈玄居釋〉即為一例。〈玄居釋〉討論「時」的角度縈繞在士人要不要或該不該出仕之間：

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于時。⁹⁰

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



束皙以周代漢代末世的衰敗，對比今晉朝的繁盛，並予以讚揚：

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巍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筍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

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蹙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

雖然如此，束皙未若夏侯湛〈抵疑〉與王沉〈釋時論〉一般，並不以有志之士的窘境去反駁對晉朝的讚揚，借機營造不協調；而是以過去衰世為戒，軟性地諷諫在朝者應採取何種態度招攬人才，訴諸當朝給予徵召的士人要不要出仕的選擇，並且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率性」或「從志」的抉擇，藉機明志，表達不想接受朝廷徵召的意願：

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

⁹⁰ 同註 28，頁 1428-1430。以下〈玄居釋〉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則儋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綉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較〈抵疑〉、〈釋時論〉及〈勞生論〉，〈玄居釋〉所呈現的不協調沒有那麼尖銳或明顯。東晉要西晉的國君以周漢為戒，即已暗示他對當朝是否能容忍拒絕徵召的人存疑。然而這份懷疑可能呈現的批評被其以諷諫傳達的善意淡化，因為其諷諫跟皇甫謐的〈釋勸論〉一樣，是向當朝傳遞訊息，表示自己並非與朝廷作對的人。不過相較於其他設論文，〈玄居釋〉與〈釋勸論〉二篇還是比較接近負俗申志，藉宣告東山之志，進一步表示自己不會與朝廷敵對。


東晉·郭璞（267-324）的〈客傲〉欲探討的問題與一般的設論文沒有太大的不同，即知識分子最大的價值究竟是出仕或退隱山林的討論：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叢會。蔭弱根于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于一臬，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于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⁹¹

有趣的是郭璞卻未如一般的設論文稱道當朝政治清明：

郭生粲然而笑曰：「鷓鴣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鰲。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採。皇運暫回，廓祚淮

⁹¹ 同註 52，頁 2152。以下〈客傲〉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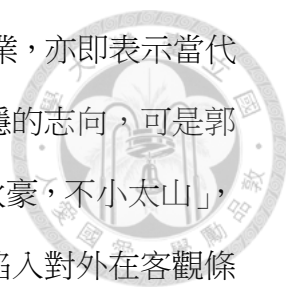


海。龍德時乘，群才云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

郭璞調過去政治清明的時代，不待在朝者徵召，四方俊才便自動聚集，所以一時人才濟濟。郭璞隨即以自己為道家思想的擁護者，不以兼善天下為高，不以寶藏于褐為低：

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塚，混光耀于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于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蟻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驚暴鱗。連城之寶藏于褐裡，三秀雖艷，靡于麗採。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泉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物化之器矣。

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蟋蟀之吟；豁雲台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嘆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復于嗟嘆，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于漆園，老萊婆娑于林窟，嚴平澄漠于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郭璞先論政治清明可自動吸引人才投誠，然後敘述自己無心事業，亦即表示當代的政治未能吸引他。相較於〈玄居釋〉，束皙明確表達自己退隱的志向，可是郭璞未採取相同的立場，他沒有提出排斥出仕的言論。他「不壯秋豪，不小太山」，因為以成敗來論定個人價值必定會「物物我我，是是非非」，陷入對外在客觀條件與標準的盲從，無法意識到個人真正的價值。這篇設論文雖隻字未提及當代的掌權者，可是他讚揚理想政治會自動凝聚人才、未排斥出仕、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訴求恰恰形成批判時政的論調——「朝政如果理想，人才便趨之若鶩；我甘於『幾韻於數賢』、『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只因當代政治未臻至清明。」至於時政距離清明之境還有多遠便有待世人自己評斷。

前述七篇設論文各有針對的讀者，欲傳達的訊息也不盡相同，不可籠統視之為發牢騷之作。時代較早，在西晉時期的夏侯湛〈抵疑〉、王沉〈釋時論〉，以及北朝末葉的盧思道〈勞生論〉則均有針砭時政的意味，其論調以〈抵疑〉、〈釋時論〉更為尖銳，〈勞生論〉因為對新朝代的期許釋出善意，所以較為緩和。在諸篇藉作政治表態的設論文當中，曹毗〈對儒〉擁戴當朝的立場最為鮮明，主體隨性自然，不必恪守道家以退隱山林為高風亮節的刻板價值，如果時機合適，不妨遵循儒家兼善天下的訴求。皇甫謐〈釋勸論〉則自曝疾篤之短，並諷喻新時代若要有新氣象所應採取的作為；束皙〈玄居釋〉則評估率性與從志兩者，然後選擇率性的立場，以「研六經」、「守寂泊」為人生的歸宿。〈釋勸論〉與〈玄居釋〉皆對當朝者釋出善意。在構築論述的手法上，〈對儒〉與〈玄居釋〉均以儒道兩種人生抉擇的思量模式展開論辨。郭璞〈客傲〉全篇則以道家的思維去突破塵俗以客觀條件衡量個人價值，可是內文卻隱隱然譏刺著當代政治不足以讓有志之士歸附。由此可見，設論文的內涵豐富，反映撰者對其關注的議題有著複雜微妙的意見。

實際上，臻至魏晉南北朝，設論體不僅僅用於書寫人生的出處進退，許多論辨文章或早已確立書寫模式的文體也多少摻入了設論「客問主答」的筆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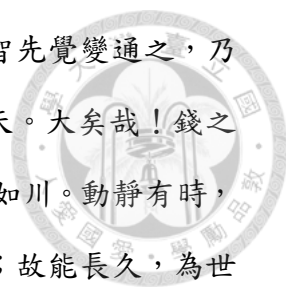
人先生傳)歷來被視為阮籍的自傳,⁹²即包含兩段設論對話;〈達莊論〉顧名思義,即敷陳莊子的哲思,也是以設論展開論辯。西晉時魯褒(?-?)〈錢神論〉也曾以設論的形式,設計一位貴族司空公子與憧憬伯樂的綦毋先生之間的對話。綦毋先生博覽經書,司空公子卻以為這套成人御世的學問早已過時: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賢,而子守實,無異于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于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⁹³

於是司空公子先敷陳金錢由來已久的歷史,然後闡述從上至下金錢掛帥之現實:

⁹² 陳伯君氏注引兩項材料為證,一為《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此亦籍胸懷之本趣也。」另一項材料為《世說·棲逸》注引:「〈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傳〉,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合,亦近乎目擊道存矣。』」見〔三國魏〕阮籍著、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頁161-162。

⁹³ 同註52,頁2106-2107。以下〈錢神論〉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大矣哉！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損。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嗚呼富人，哀此滄獨！』豈是之謂乎？

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克之于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

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始終。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云：『錢無耳，可閤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于人乎？

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賑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

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和塵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傳統的價值觀一般訴諸道德，引導人心向善。然而這套道德觀在現實中卻沒有多大的用處。「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現實是有錢的人便可輕易獲得眾人敬重的地位，沒錢的人就必須服從有錢的人，跟道德一點關係都沒有。然後有錢的人代代安康，沒錢的人世世為僕。所以有錢無往不利，有錢能使鬼推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解決紛爭異議不是是非對錯，而是金錢的多寡，於是強凌弱眾暴寡的時代蒞臨。

〈錢神論〉所呈現的荒謬在於儘管大家都知道應該建構合乎道德價值的社會，可是魯褒所敘述有關金錢萬能的現象，無論多麼醜陋，才是時人面對的現實。不但如此，「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和塵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道德一點都不值錢。魯褒或許言過其實，但是千百年來，有錢萬能的現象依然是今天的實況，可見每一個荒唐現象的背後往往都有一個可悲的現實。

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較為嚴肅的文體如公文與議論文常被當時的文人以營造不協調、矛盾的方式，注入新生命。文章隱晦的程度各不相同，有的直白，有的較為婉轉。這些文章或用以突顯社會與朝政的荒謬或陋習，或傳達撰者的企盼與意願等訊息。文章所載負的新目的反而喧賓奪主，取代文體本來肩負的作用，為諧趣開闢一個精彩的時代。

第二節 附和流俗的新書寫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也在探尋新的流俗題材與寫作手法，茲分述如下：



一、「不怕低俗」的題材與筆法

魏晉南北朝是個打破禁忌的時代，時人任誕出格的行徑有不少記載，如此精神自然不限於言行舉止，也將反映在他們的創作上，其中題材方面便出現新穎的選擇。若從時人種種荒誕風氣來看，⁹⁴時人對於鄙俗的事物不但不再避而不談，反而藉機挑戰既有的道德傳統與既定的界限，後來又演變成趕流行的現象。

首先，過去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通俗卑賤的物件與人事會成為書寫的對象。在以往，卑微的事物也曾偶爾出現在文人作品中，如〈碩鼠〉以及《莊子·列禦寇》的舐痔，但是這些事物多只為作品中的配角，用以譏刺某人某事，並非主要描述歌詠的對象。至魏晉南北朝則不然。雖然撰者也常是意有所指，但是對這些人事物的興趣大幅增加，多躍升為單獨詠嘆的對象。時人不但不會避諱過去被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物件、行徑、特質，反而饒有興趣地去研究，然後仔細記錄所聞所見所感。茲列舉此時期的作品為證。

傅咸（239-294）〈叩頭蟲賦並序〉，歌詠一種叫叩頭蟲的小蟲：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之不祥，故莫之害也。⁹⁵

這篇賦有缺文，所以今人難以得知傅咸對叩頭蟲完整的描述。然而傅咸精確地把握一隻微不足道的小蟲叩頭的傾向，以及他人因此對其不予傷害的態度，然後以此為喻，闡述做人應該懂得識時務服軟才可避禍的道理：

⁹⁴ 當時的風氣可參見《世說新語·任誕篇》，25 條余嘉錫案語：……魏、晉之間，蔑棄禮法，放蕩無檢，似此者多矣。……《抱樸子·疾謬篇》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

同註 29，頁 872-873。

⁹⁵ 同註 52，頁 1755。以下〈叩頭蟲賦並序〉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仇。無咎生于惕厲，悔吝來亦有由。仲尼唯諾于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才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仇？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恆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傅咸光以孔夫子（前 551-前 479）與韓信（前 231-前 196）為例，兩人因為一時服軟，得以解決紛爭，沒有引來殺身之禍。此話雖不錯，但是孔夫子與韓信青史留名並非純粹因為一時服軟，實際上這不過是兩人波瀾壯闊的人生中一個小插曲而已。〈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太史公憧憬孔夫子的理由是因為孔夫子奠定了後代六藝的基礎，跟他對陽虎（?-?）一時唯唯諾諾無關。〈淮陰侯列傳〉：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的成敗也與胯下之辱無關。倘若韓信沒有才幹，成為左右劉邦（前 247-前 195）與項羽（前 232-前 202）成敗的人物，歷史根本不會記錄他任何事蹟，他也只不過是當時市井之徒取笑的膽小鬼，終將湮沒在茫茫人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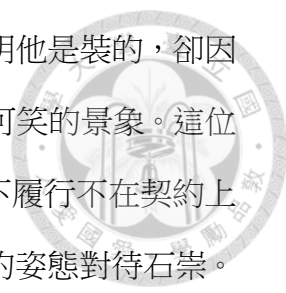
舌存齒亡並非指一味示弱低頭，而是指做事留有轉圜的餘地。然而傅咸將典故的意思移花接木，孜孜不倦地訴求人必須隨時準備屈服，才可避免受到致命的傷害，示弱可以使強勢的人不忍進一步加害。傅咸的說法自然不絕對合理，強勢的人未必不忍傷害弱者，他們也很可能因為對方繳械屈服而摧毀對方。而且傅咸有意喋喋細數屈從的好處，全然未顧及示弱一方將造成失去尊嚴的後果。其論述不但違反儒家主流的道德價值觀，也不符合嵇阮掀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風的叛逆性。因此與其視傅咸頌讚叩頭蟲，不如說他示弱的論述是反語，藉以突顯卑躬屈膝的可憐相。若然，則傅咸的本意與文中的言語便呈現一種不協調，而別有諧趣感了。

石崇（249-300）〈奴券〉是記錄他與一名態度惡劣的羝奴相遇的雜文：

余元康之際，出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太祖，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柰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匹。聞謂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為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牀。負之安邑，梨慄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莢榆之轂，無尾鬪體之狀，大良白槐之幅，河東茱萸之輞，亂櫛桑轆，大山桑光。長安□□，雙入白屋。釘金巢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槻，烏嗥拓桑。張金好墨，過市數蠹。並市豪筆，備即寫書。嗥角幘道，金案玉碗。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而歸。⁹⁶

這篇雜文有許多不協調之處，構成一段滑稽的故事。首先，石崇的友人出錢買了一個奴僕，身為主人卻對這個身材健碩但好吃懶做的惡奴無可奈何，每當要使喚

⁹⁶ 同註 52，頁 1651。以下〈奴券〉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這個奴僕，他便裝病。一個彪形大漢動輒稱病，大家都心知肚明他是裝的，卻因為他身形健碩而懲處不了他，只能摸摸鼻子作罷，這是一個很可笑的景象。這位刁奴居然膽敢自稱「胡王子」，知會欲買下他的石崇，他絕對不履行不在契約上的事項。石崇是當代赫赫有名的人物，這個奴僕竟以平起平坐的姿態對待石崇。契約內羅列的事項也是有意為難主人家，他僅僅願意使用或處理一等一的材料，否則另請高明。在契約中，他也不忘自吹自擂：「釘金巢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楓，鳥噪拓桑。張金好墨，過市數蠹。。並市豪筆，備即寫書。嗥角幘道，金案玉碗。宜勤供筆，更作多辭。」石崇或許以為他比友人高明，可以駕馭這個奴僕，聽完契約的內容，二話不說就收起絹絲走了。羝奴根本未把石崇在身份地位上的優勢放在眼裡，對石崇百般戲弄；石崇在外形上處於劣勢，所以也不能拿羝奴怎麼辦，只能啞巴吃黃連。兩人優劣勢的犄角相抵形成種種不諧調，遂鋪成一段精彩的諧趣。

束皙〈餅賦〉則書寫餅在四季的吃法，過去微不足道的東西，如今也成為觀摩關注的對象：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為臠，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粬糗之倫，豚耳狗後之屬，劍帶案盛，餕飩髓燭。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

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溫不至熱。于時享宴，則曼頭宜設。吳回司方，純陽布暢，服絺飲水，隨陰而涼。此時為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翮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起漉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便，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

四時從用，無所不宜，唯牢丸乎？爾乃重羅之麩，塵飛雪白。膠黏筋韌，膈液柔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鬻若繩首，珠連礫散。薑株葱本，荖口切判。辛桂剉末，椒蘭是畔。和鹽漉豉，攪合膠亂。于是火盛湯涌，

猛氣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麵彌離于指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電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麵。妹媮冽軟，薄而不綻。嵩嵩和和，膿色外見。弱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咥唇，立侍者乾咽。爾乃濯以玄醢，鈔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據。盤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唇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⁹⁷

束皙對最宜四季食用的餅食皆有心得，春季剛剛回暖，適合吃饅頭；夏季炎熱，需要清涼的食品，這時適合吃薄壯；秋季天氣開始放涼，適合吃偏溫的麵食起澆；冬天最冷，氣管口腔涼，最適合吃湯餅。可是束皙的心頭之愛莫過於牢丸，他對製作牢丸的材料十分熟悉，餅皮需用細滑的重羅麩；肉則應參雜羊蹄膀與豬排骨肉，肥瘦參半，蒸出來方能「膠黏筋韌，膈液柔澤」；至於肉餡的佐料，薑及葱需切片，辛桂則切成末，與椒蘭、鹽、豆豉攪拌。蒸好以後「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麵彌離于指端，手縈回而交錯」，在手裡發燙的蒸餅，兩手交替持握生動的樣子勾引食客滿心的期待。蒸餅不但賣相佳，「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咥唇，立侍者乾咽」，香氣引人垂涎欲滴，望眼欲穿，店家應接不暇，剛上菜轉眼就如秋風掃落葉，一搶而空，新單又接踵而至。食客吃了三幾籠以後，口腹之欲稍稍被馴服，才恢復理智。束皙對牢丸從製作、販售到食客的狀態無一不細細描述。

〈奴券〉的奴僕以及〈餅賦〉中日常的餅食為過去最微不足道的人物與物品，至魏晉南北朝卻搖身一變，成為文人細細觀察，並且饒有興致書寫的對象。這個態度上的轉變與過去的品味大相徑庭。文人彷彿放下身段，拿著放大鏡，仔細品味新穎物件與人物，挑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微子篇》）的正統儒家態度。文人在關注新對象的過程中，被評為「小

⁹⁷ 同註 52，頁 1962-1963。以下〈餅券〉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道」的小人物小物件展現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特質，於是他們把其中可愛有趣的觀察，以生動白描，毫無死角的敘述筆法，將他們發掘的驚艷轉化成令人莞爾的諧趣。〈奴券〉將奴僕「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種種的外形與舉止的細節描述地愈發詳盡，愈把讀者帶入實景去觀摩蠻奴幾近詼諧古怪的刁鑽性格，以及對比石崇的莫之奈何；〈餅賦〉中，光看而沒得吃的旁觀者——「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瞠目咽口水的忘我模樣，打破一般人矜持守分的形象，撰者不惜將於正常情況下，必定會遮掩的窘況、尷尬和難堪，種種細節洋洋灑灑地攤在人前。這個書寫的新態度與過去重視威儀堂堂的立場構成鮮明的不協調，也開展了一個新穎的諧趣風格。

束皙也撰寫過〈貧家賦〉，此賦雖有闕文，但亦有助於觀察此時期社會生活形態以及其間所呈現的諧趣：

余遭家之輻輳，嬰六極之困屯。恆勤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元憲之厚德，有斯民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羅縷而自陳。有漏狹之草屋，不蔽覆而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嗷嗷于膳珍。欲恚怒而無益，徒拂鬱而獨嗔。蒙乾坤之徧覆，庶無財則有仁。涉孟春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夜長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銜賣葉而難售，遂前至于飢年。舉短柄之口掘，執偏隳之漏銅。煮黃當之草菜，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于堂上，妻妾嘆于竈間。悲風噉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⁹⁸

貧窮雖然不可恥，但也不是什麼值得津津樂道的事。然而，束皙將衣食住行上每

⁹⁸ 同註 52，頁 1962。以下〈貧家賦〉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件狼狽不堪的細節都作寫實的描述——有牀無被，雙手抓空的景象、捉襟見肘的衣服、殘破的用具、黃掉的蔬菜、稀釋的羹湯。束皙其實已美化某些遭遇，如「債家至而相敦」、「作汪洋之羹饘」，債家的「敦促」必定難以消受，所以才拆東牆補西牆、向人借錢；「汪洋」似的羹湯，實際上就近乎白水；束皙真實的境況可憐到可笑又無奈的程度。

再談另一篇訴窮之文。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屈原賈生列傳〉)，南朝宋·喬道元(??)〈與天公牋〉即有向天訴冤的意味：

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無有高門大戶，來風致涼，積汗累燠，體貌萎黃，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冬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綿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縊，袷以四升之粗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腳則足出，攀捲則脊露。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搯。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獐，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駟雞。他無所役，遣詣阿嵇。復被狗咋，困熟如泥。有露車一乘，轅復摧折，以犁轅續之，左崎右嶮，強弱相負，傍行斫轅。

99

此篇亦有闕文，但與〈貧家賦〉一樣，也是對貧困生活的描述。喬道元居住的房子十分破舊，沒有足以擋風遮雨的門戶，而且蒙上陳年污垢的居所相當邋邇。冬天的時候，他只有兩條沾滿毛絮的小薄被，處處有補丁，而且面積小到「伸腳則足出，攀捲則脊露。」他家也是拐瓜劣棗的大本營，奴婢長得一個比一個奇怪，

⁹⁹ 同註 52，頁 2747。以下喬道元〈與天公牋〉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而且一點忙都幫不上。高安兩手殘廢不能幹活，兒子雖名「饒」，卻特別命苦，肚子長瘤，能吃不能做；借了一個童僕，卻不幸手被狗咬至重傷；長婢來成眼睛不好，多次掉到井裡，需要人搭救；次婢良信腿不方便，還有不為人知的病痛，話也說不好；小婢從成最可怖，「形如驚獐，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駢雞」，令人不敢恭維。最後喬道元別無他法，唯有差遣去尋阿嵇，又被狗咬，所有倒楣事都被這一家人趕上了。喬道元細細盤點他一家荒唐的遭遇，本該遭到同情的可憐際遇，卻因為喬道元碰上令人難以置信的機率而不禁發笑，也不得不認同他向天埋怨有理——他的倒楣或許真該由老天來負責！

貧窮固然不是該拿來說嘴的事，子孫不長進也是如此。陶淵明(365-427)〈責子〉即違反了這個立場：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¹⁰⁰

陶淵明年紀大了，審視鬢白的頭髮與失去彈性的肌膚，心頭感嘆兒子個個都是不學無術的渾小子。阿舒十六歲，很懶惰；阿宣十五歲，不愛念書；阿雍、阿端均十三歲，愚而不慧；通子九歲，嗜吃。陶淵明的無奈無處發洩，唯有買醉解憂。從陶淵明細數各個兒子的愚鈍，可看出他作為一位父親的焦慮卻無可奈何的心情，想跟命運妥協，卻心有不甘的矛盾，〈責子〉即陶淵明苦中作樂的作品。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開拓寫作的新題材，這些新題材是過去忽略或不予置評的卑微人物及物件。時人不怕丟失面子，勇於詠嘆自己不幸的遭遇，如貧困、兒孫不濟。他們也樂於發掘卑微人物，如奴婢的新面向。在過程中，他們往往發現令他們驚艷的舉止，於是他們樂此不疲地把跟他們交往的經歷寫成趣聞。對於

¹⁰⁰ 楊勇著：《陶淵明集箋》（臺北：學術資料編印館，1970年4月），頁178。以下〈責子〉引文均同，其他陶作均引自本書，將僅提供篇名，茲不贅述。

稀鬆平常的物件，他們也饒有興致地去觀察及研究，然後作為書寫的題材。他們不在乎這是小道之物，反而孜孜不倦把品味入微的結果，鉅細靡遺地著錄在文章裡。他們不但不準備遮掩及閃躲令人尷尬、不適的境況，而且不怕丟失面子，如此書寫的態度與一般提倡體面的價值觀產生不協調，甚至衝突，形成新風格的諧趣。無論題材、書寫態度、書寫手法，這個時代的這些作品全都令人耳目一新。

二、「不顧禮貌」的筆法

魏晉南北朝的文人不但不怕尷尬，他們也不閃避衝突，反而似乎有意採取主動出擊頂撞他人的書寫策略。最顯著的特徵可見於文章的標題，往往直接披露他們挑起衝突的態度，例如標題含有「責」、「嘲」、「絕交」等字眼。這類文章不包括執行公務之際，無可避免與人起衝突而書寫的公文，而是指私交的書信以及為創作而書寫的文章。前述陶淵明〈責子〉即為一例。兒子的不才固然是難堪的窘況，而〈責子〉亦顯示陶淵明有意採取責備兒子的態度。其他作品包括繁欽（?-218）〈嘲應德璉文〉¹⁰¹、嵇康（223-262）〈與山巨源絕交書〉、張敏（?-?)〈頭責子羽文〉、陸雲（262-303）〈牛責季友〉、孫楚（?-293）〈反金人銘〉以及張湛（?-?)〈嘲范甯〉，全為同類之作。茲就各篇進行討論。

繁欽〈嘲應德璉文〉如篇名所言，著錄一段應瑒（?-217）不太光彩的出身：

應德溫云，昔與季叔才俱到富波，飲于酒肆，日暮留宿。主人有養女，年十五，肥頭赤面，形似鮮卑。偶說之，夜與通奸，便生足下。¹⁰²

繁欽揭露應瑒的父親應珣曾在酒店留宿，與主人家外形肥胖，貌似鮮卑的養女通

¹⁰¹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作「璉」，然應瑒字德璉，故改之。

¹⁰² 同註 52，頁 978。《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作「便住足下」。《太平御覽》此條「住」作「生」，據《太》改之。〔宋〕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卷 828，頁 705。

姦，遂生應瑒一事。繁欽有意揭人之短，譏笑應珣飢不擇食，有失名士的格調，也譏笑應瑒的生母為不可登大雅之堂的醜女。這篇短文提供一個除了「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文心雕龍·明詩篇》）以外，文人交往中相互開玩笑彼此嘲諷的互動。

〈與山巨源絕交書〉是嵇康的名篇，嵇康以荒唐怪異，半自嘲半嘲諷山濤（205-283）的口吻，拒絕山濤代表的司馬氏集團所遞出的橄欖枝：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¹⁰³

嵇康先恭維山濤多才藝，個性寬容，又自嘲自己是度量狹隘之人，這似乎很符合書信的禮儀。但是嵇康隨即以庖人比喻山濤，唯恐山濤以雙手「羶腥」拖自己去當官。嵇康自比尸祝，顯得優雅莊重，山濤則一身腥臭。這個比喻即推翻先前的禮儀，才是嵇康真正的心聲。

〈與山巨源絕交書〉與束皙〈玄居釋〉一樣，也有對「率性」與「從志」充分的討論：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

¹⁰³ 同註 26，頁 1077-1082。

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玄居釋〉及〈與山巨源絕交書〉都主張「率性」，不強求「從志」，向前來招攬自己的人釋放拒絕出仕的訊號；信函的論述這時一度恢復理性的討論。但是束皙未竭盡所能地數落自己的不是，嵇康則隨即不遺餘力地自嘲：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餼，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鬻塵臭處，千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又聞道士遺言，餌求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嵇康以大量的篇幅形容自己種種不是，企圖證明自己個性上的偏狹，乃從小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所養成。儘管了解自己不識人情的缺點，也有阮籍作為絕口不減否人物的榜樣，可是天性如此，他也改不了。嵇康羅列自己「不堪者七」，皆其天性的好惡，以及「甚不可者二」，也是天性所致而出現的舉措。如此細細書寫「不堪者」及「甚不可者」，與上節「不怕低俗」的筆法相似，皆不憚於自曝其短，把自己種種缺點細細地序列。不但如此，嵇康更刻意大力渲染，其中不乏齷齪的描繪，如「性復疏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嵇康把如此齷齪的影像，植入山濤的腦海裡，污穢的描述成為嵇康無形的武器，讓作為讀者的山濤彷彿沾上他的小便及蝨子，他悶癢的肌膚往山濤身上磨蹭。這實際上已超越不怕尷尬或有失顏面的程度，因為上節諸篇文章多數都沒有特別針對的對象，所以撰者自曝窘境或詠嘆卑微的人事物，僅可視為撰者不怕難看；但是〈與山巨源絕交書〉是一封信函，具有針對性的讀者——山濤。當嵇康超乎常度，積極迫使山濤想像他的污穢物，這是明顯的挑釁行為。尤其嵇康在「甚不可者二」更有意無意地透露不滿欲篡天下的司馬昭，¹⁰⁴然後又稱出仕違背其天性，把請他出仕說成會令他短命的原因：「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態度荒誕輕浮，挑釁意味十足。嵇康雖然

¹⁰⁴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湯、武為開國之君，即影射司馬昭。司馬氏提倡儒家禮教，嵇康「非湯武薄周孔」即可視為反對司馬昭。



自嘲，可是其自嘲皆挑戰對方的利器。

自嘲一番以後，嵇康轉向嘲諷山濤：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

嵇康譏笑山濤強人所難的行為十分低級，猶如自己喜歡餵食，便強行餵人死鼠。

嵇康同時也侮辱山濤的人格——什麼樣的人會對腐鼠趨之若鶩？

嵇康隨即又回到自嘲：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嵇康以為真正有賢德的人不會汲汲營營於功名利祿，這才是可貴的品行。自己不過是因為一身病痛而欲頤養天年，山濤怎麼可以假設我不求名利僅是姿態？這就像假設太監一定有節操一般，分明是故意曲解。表面上，嵇康提點山濤對他的看法並不理智，也不正確；但是與前述「不堪者七」以及「甚不可者二」的自嘲態度一樣，嵇康有意運用閹臣與不舉的例子來給山濤難堪。嵇康大可不必加入「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這段話，也已經傳達了自己不夠格的意思；加入以後，便似以閹臣指桑罵槐，影射山濤及司馬氏——別錯把不舉當貞操。這大概是全篇最侮辱最冒犯山濤與司馬氏的話。若說不顧禮貌，這已是不夠禮貌之極致。

〈與山巨源絕交書〉即以「絕交」為篇名，內容卻充滿自嘲。嵇康的口氣似乎祈求對方的諒解，其筆法又竭盡能事書寫最齷齪最卑賤的事物，態度極為輕浮荒誕，藉詞表達他對司馬氏集團極度的蔑視。究竟〈與山巨源絕交書〉是一篇辱罵文抑或諧趣文？司馬氏集團顯然將之視為辱罵文，嵇康對他們的鄙視大抵是高高在上的權臣最無法忍受的待遇，嵇康也因此招來殺身之禍。然而，山濤是否也如此認為？正如叔本華所言，發笑與諷諧的對立面是認真。要檢視〈與山巨源絕交書〉是否為一諧趣文，則必須找到對比的「認真」。除了〈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還寫過另一篇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得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吾，與之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擊都，以子父交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擊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吾又非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書恨恨。嵇康白。¹⁰⁵

這封絕交書是嵇康寫給呂安的兄長，呂巽的。信中，嵇康嚴正地交待與呂巽的恩怨，描述呂巽如何陷害其弟呂安，以及嵇康如何錯信呂巽的謊言，導致呂安成為階下囚的來龍去脈。嵇康稱呂巽「苞藏禍心」，雖效法「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對呂巽卻萬分失望。這封絕交信函十分簡短，嵇康的描述直白有力，表明態度以後，便不欲多言，頗有以直報怨的姿態。〈與山巨源絕交書〉則非如此，嵇康表面上欲絕交，卻不斷數落自己的缺點，難道嵇康自慚形穢，所以不得不與山濤絕交？這根本不符合邏輯。嵇康隨即又奚落山濤對腐鼠趨之若鶩，若然如此，嗜腐鼠的山濤跟諸多不是的嵇康為絕配？為什麼嵇康揚言要絕交？由此可見，「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云云均反語，對山濤的訕笑儘管令人為之捏一把冷汗，因為行文幾近辱罵，卻也是玩笑話。那麼山濤是否也如此認為？張雲璈（1747-1829）《選學膠言》引《晉書·山濤傳》：「（嵇康）臨終謂子紹曰：『巨源在，汝

¹⁰⁵ 〔三國魏〕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4月），頁230-231。

不孤矣。」張雲璈以為嵇康根本沒有與山濤絕交的意思。¹⁰⁶葉渭清（1886-1966）亦云：「按中散與山公交契至深，此書特以寄意，非真告絕也。」¹⁰⁶嵇康過世以後，山濤亦提携嵇紹，語在《晉書·嵇紹傳》，則山濤亦知絕交云云乃嵇康之玩笑話，〈與山巨源絕交書〉為一諧趣文亦毋庸置疑矣。

張敏〈頭責子羽文〉是一篇帶有寓言性質的設論文，借秦子羽的頭發難，責問他一事無成。文章開篇便解釋撰寫的緣由，張敏註明此文有兩個目的，一為秦子羽打抱不平，一為譏刺當代赫赫有名的權貴大官未能推賢進士：

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顥、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上郡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翽，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子羽〉之文以戲之，並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¹⁰⁷

秦子羽生平不詳，¹⁰⁸但是張敏形容他樣貌出眾，雖然有意出仕，始終「屢沽而無善價」，未遇伯樂。六位才情不如他的人早已飛黃騰達，但不識其賢，也沒有拔擢他的意思：

頭責子羽曰：「吾托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發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攜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奉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帔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汙黑。歲暮年過，曾不

¹⁰⁶ 同註 105，頁 195。

¹⁰⁷ 同註 52，頁 1919。以下〈頭責子羽文〉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¹⁰⁸ 劉孝標註曰：「子羽未詳」。同註 29，頁 919。

自悔。子厭我于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之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

「頭」像個怨婦般抱怨自己勞苦功高，讓子羽長得一表人才，可是子羽卻沒有功成名就，反而簞食瓢飲，「隈摧園閒，糞壤汗黑」。

這篇設論文實際上也觸及出處進退的問題，但是主要的論述卻不是士人的回應，反而站在「客問」的立場去質疑士人的人生選擇。在文中，「頭」陳列各種出處的方向，然後責備子羽未能選擇任何一個選項，狠下心成為箇中翹楚，永世留名，結果落得一個進退失據，貧賤困頓的下場：

「子欲為仁賢也，則當如皋陶、後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灑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

「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于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

「頭」完全站在追逐名利的角度出發，能封王封侯最好，就算退隱、恬淡，也極力要求子羽做到許由、老聃諸人一般，務必「千歲流芳」，也算「顯身成名」，賺取顯赫的身後名。

子羽則針對「頭」所陳列的出處方向，一一作出回應：

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

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

子羽以為自己受到天性的拘束，無法不遵守禮義教誨，但是在這個時代選擇當忠義之士，必定落得丟失性命的下場，所以他不敢爭取。這是針砭時政的論調，在混濁不清的政治環境，如果堅守節操便會遭人猜忌，惹來殺身之禍。張敏接著祭出更嚴厲的批判——他點名當朝權貴大官，明裡調侃打趣他們，實則批評他們該為混濁不清的政治負責：

（頭曰：）子不如太原溫甬、潁川荀寓、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翽，此數子者，或謔吃無宮商，或虺陋稀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驪騮少智譎，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齧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沉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

《世說新語·排調篇》7條¹⁰⁹亦節錄此處對六人的調侃，其中不乏對六人外形特徵的譏笑，似乎是無傷大雅的玩笑；隨即又云六人是因為才氣才成為大官，挽回對他們外形的譏笑。但是張敏下文馬上提出更嚴正更辛辣的批判，他雖說六人「攀龍附鳳，並登天府」，這是正面的說法，但又提出負面的說法是這六人乃「舐痔得車，沉淵得珠」。儘管張敏明裡指稱「舐痔得車」為秦子羽必需付出的代價——要得志就不得不寡廉鮮恥——但是這句話道出在官場力爭上游的人不得不遵循的原則，而此六位當朝的大官，他們難道不是「舐痔得車」才得以成為人中龍鳳？這就不只是區區「排調」，而近乎嬉笑怒罵了。

¹⁰⁹ 《世說新語·排調篇》7條：「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甬、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翽。此數子者，或謔喫無宮商，或虺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驪騮少智譎，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齧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所以張敏以守節之士的待遇作為全文的總結：

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瓮，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阱之虎、石間飢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總之，守節之士在此時窮途困頓，要出人頭地，唯有蠅營狗苟，背棄良心道義。張敏借助天馬行空的想像，設計一段「頭」與秦子羽荒誕的對話，包裝他對時政的嬉笑怒罵，以及對權貴的鄙視。

陸雲〈牛責季友〉也是一篇奇文，茲錄全文再作討論：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同乎人。今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圓規以儀天，該芳靈之疑素，挺協氣于皓玄。故神窮來□，思洞無間。踊翰則憤凌洪波，吐辭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穎秀暢谷，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雖子之服，既朱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珥，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輶輅，望紫微而風行，踐蘭塗而安步，而崎嶇隴阪，息駕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呼季友，盛時可惜。迨良期于風柔，競悲颯于葉落。陳讜言于洪範，圖□形于霄閣。使景絕而音流芬，身薦而榮赫奕。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迹于桃林之薄。¹¹⁰

季友是春秋時代，魯莊公之弟。當時魯莊公沒有嫡子，只有庶子公子斑，魯莊公有意立公子斑為國君。但是魯莊公庶兄慶父卻想奪位，魯莊公深患之。於是魯莊公請季友輔佐公子斑成為國君。魯莊公卒，季友立公子斑為君，但是公子斑遭慶父追殺，慶父隨即立公子開為潛公，於是季友逃到陳國。後來，慶父又弑潛公奪

¹¹⁰ 同註 52，頁 2050。以下〈牛責季友〉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位。季友於是回到魯國。因慶父不得民心，魯人欲殺之，慶父便出逃到莒。季友立魯莊公少子子申為釐公。慶父在季友步步進逼之下自殺，季友立下大功，於是拜為魯相，語在《史記·魯周世家》。



季友恪守君臣之道，並未「不能建功以及時」，也不曾退卻於政治舞臺，何以陸雲責難季友？論斷一位古人的功過是非，何以需要藉牛口發端？筆者推測，〈牛責季友〉的「季友」或可猜想並非真指魯莊公之弟季友，而是指齊王司馬攸（248-283）。「友」與「攸」諧音；¹¹¹司馬攸又是晉文帝與文明王皇后成年的幼子，也符合「季」的排行。¹¹²齊王攸性至孝，當時在政壇與民間都深得人心。《晉書·齊王攸傳》曰：「及（武）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只有佞臣荀勗（?-289）、馮紆（?-286）獻策於晉武帝，把齊王攸封到齊。齊王攸當時不悅，後來祈求留守母后陵寢，遭晉武帝拒絕，於是憤怨而死。〈齊王攸傳〉稱其「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可見齊王攸個性溫厚，鮮少與人爭鋒。〈牛責季友〉所欲諷諫者即敦促齊王攸要積極爭取大位。陸雲稱「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圓規以儀天，該芳靈之疑素，挺協氣于皓玄」，即指齊王攸品行善良，因此齊王攸應該「絕淵而躍」，因為人心

¹¹¹ 「友」與「攸」南北朝時期的韻部均為「尤侯幽」，參考網路資源「小學堂資料庫」，「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108>；

「攸」：<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615>；檢索日期為 2018 年 5 月 5 日 0005 分。

¹¹² 《晉書·后妃上·文明王皇后》：「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據《晉書·文六王》，遼東悼王定國「年三歲薨」；城陽哀王兆「年十歲而夭」；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三國志·魏書·后妃傳第五》注引〈晉諸公贊〉曰：「（甄）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參見〔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2 月），頁 164），則京兆公主為長女，晉武帝為長兄，齊王攸排行最幼。

所向，齊王攸已然「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有機會成為天子。陸雲以為齊王攸地位一直停滯不前——「雖子之服，既朱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不改度」，所以奉勸齊王攸大可「望紫微而風行」。《晉書·天文志上》曰：「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則陸雲勸諫齊王攸踐祚皇位之意明矣。

至於〈牛責季友〉之奇在於文章以責難為掩護，行諷諫之實。陸雲藉牛口，口氣不無幽怨，有恨鐵不成鋼之勢：「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最後還挑釁地說道：「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迹于桃林之薄」。然而，這不過是聲東擊西，實際上陸雲是假借牛的身份，一來向齊王攸輸誠：「子何不使玄貂左珥，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輅」，陸雲以「玄貂」、「華蟬」、「青軒」、「軺輅」自期，有為之效命之意；二來陸雲要齊王攸「迨良期于風柔，競悲颿于葉落」，把握時機建立功業，「使景絕而音流芬，身薦而榮赫奕。」所以說這篇文章激起強烈的衝突感，是陸雲預設的書寫策略。在形式上採取責難的態度，實則具有利他的目的。

至於孫楚〈反金人銘〉，則以反駁劉向〈金人銘〉為目的。〈反金人銘〉的行文用語多處有意與〈金人銘〉針鋒相對，〈金人銘〉曰：「我古之慎言人也」¹¹³，〈反金人銘〉即言：「我古之多言人也」¹¹⁴；〈金人銘〉曰：「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反金人銘〉即言：「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金人銘〉認為多說多錯，弄不好還會惹禍上身，因此要杜絕言論所帶來的禍害，便要從小言小事做起，無時無刻小心謹慎發言，不與人爭，才能避免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人也不會因為糾紛而傷及自己：

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

¹¹³ 同註 52，頁 10。以下〈金人銘〉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¹¹⁴ 同註 52，頁 1804。以下〈反金人銘〉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無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孫楚則對〈金人銘〉所謂謹小卑下的作風十分不以為然，何以有才之士必須如此委屈求全，時刻擔心動輒得咎？孫楚有意推翻這樣鄉愿的態度，於是大膽疾呼：「我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蹟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鉤。故言滿天下，則無口尤。」隨即孫楚又為有才之士的窩囊相打抱不平：「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為塊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叉手」——何以說真話如此艱難，逼得人不得不卑躬屈膝，如冷冰冰的金人一般，一動也不動，三緘其口來避禍？因此〈反金人銘〉以為言論是否會釀禍，不在個人的修為與品行，而取決於時代的治亂：

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孫楚以為個人的特質是天生的，有人是貪財的凡夫俗子，有人願意殺身成仁，在好的時代，「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主政者胸襟廣闊，可以容納百川；在末世亡國前，「禮教彌衰」，於是人云亦云，否則「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所以人人選擇保持沉默，以求自存。這是時代的悲劇，不是行為的標準。

〈金人銘〉所說的「言」，與〈反金人銘〉並非全然相同。〈金人銘〉以為人不應逞口舌之快，因為言語最容易得罪他人，引起糾紛，〈金人銘〉訴求的是個人修養的範疇；〈反金人銘〉所討論的「言」指涉對政治與社會現狀的批評，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孫楚以挑戰古人的方式，嬉笑怒罵地批評言論空間遭到壓縮，發洩在位者逼迫有識之士看到不平之事，也不得不畢恭畢敬閉嘴的政治現實，正是饒有深趣的諧趣文。

張湛〈嘲范甯〉則展現文人之間相互打趣的交際：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¹¹⁵

張湛起先營造神秘氣息，告訴范甯有一道以可治眼疾的古方。為了增加古方的可信度，張湛引述多名患有眼疾的古人都曾採用過這道古方。可是當古方揭曉，卻是一道人人皆知，說了也白說，調治作息的方法，讓原本滿心期待古方的奇效瞬間落空。張湛以調侃的方式，奉勸范甯少讀書多休息，早睡早起便能延年益壽。此篇小文自娛娛人，雖曰「嘲」而沒有辛辣意味，只展現文人酬酢之際的風趣。

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放下彬彬有禮的儀態，興起以嘲諷、戲謔等挑釁的方式進行無論是諷諫、酬酢、批判政治社會陋象，或是表達輕蔑與人針鋒相對的互動，不但在行文上進行挑釁及調侃，而且從篇名便已挑明態度。他們不僅在對待他人時採取冒犯的態度，對於自己的不光彩的窘境也不加以遮掩，對於卑賤的人事物饒有興趣，細細描述詠嘆，以此挑戰社會形成已久的莊重與典雅

¹¹⁵ 同註 52，頁 2256。以下〈嘲范甯〉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的標準，開展出一種新型的諧趣風格。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諧作的綜合分析



諧趣為有潛力（但不必然）使人感到愉悅或引人發笑的不協調特質。有些人以追求這份愉悅感為目標，撰者或說者作為創造諧趣的一方（第一人），為了自娛娛人，打趣或調侃某個對象（第二人）。諧文的讀者或一段玩笑的旁觀與旁聽者（第三人）同時也感受到這份愉悅感，成為諧趣的受惠者之一。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諧趣帶來的愉悅感並不是第一人的終極目標，第一人可能使用諧趣帶來的愉悅包裝他給予第二人的諷諫，使第二人領悟到自己犯下的錯誤或應改善的地方。另外有些人則把諧趣當成諷刺及侮辱他人的武器，從揭人之短的過程中，得到報復或伸張正義的滿足感。使用諧趣來諷諫他人者為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所序列的第一個諧趣目的；以諧趣自娛娛人者為第二個諧趣目的；以諧趣作為攻擊他人的武器為第三個諧趣目的。第四個諧趣目的偏向個人的自存，第一人感受到來自外界的壓迫，於是為了個人的生存空間，也為了能夠不同流合污，所以選擇荒誕的形式作風，消除外界對自己的猜忌。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諧作多數為了自娛娛人及諷刺或攻擊他人。石崇〈奴券〉、束皙〈餅賦〉是當時文人對以往視為卑賤的人事物產生濃厚興趣，把所觀所聞所感作為詠嘆描述對象的作品；另外他們甚至連自身的窘迫、尷尬的處境也不加掩飾，喬道元〈與天公牋〉及陶淵明〈責子〉即屬於這一類型的作品。他人的糗事、缺點也不時用於酬酢的書寫，曹操〈追稱丁幼陽令〉、繁欽〈嘲應德棻文〉以及張湛〈嘲范甯〉即文人之間無傷大雅的相互調侃，透過打趣對方聯絡感情。以上作品均為自娛娛人的諧趣。

另外，此一時期諷刺或攻擊他人的作品數量甚多，要以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拒絕徵召已然成為次要目的，嵇康這篇信函主要是為了侮辱山濤以及刺激司馬氏集團。當時有許多針砭時政的作品，雖然作者的本意



有關懷大我的意味，但是這些作品依然不足以判定為意在諷諫的諧趣，因為他們與〈滑稽列傳〉中的人物有一個非常大的區別——〈滑稽列傳〉的人物不但指出問題的所在，也提供他們所諷諫的國君對策或可付諸實行的方案。淳于髡暗示齊威王去趙國搬救兵解楚兵圍城的黃金太少，要齊威王增加預算，然後成功從趙國請來救兵，也暗示齊威王「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要齊威王取消長夜之飲；優孟以諧趣諷諫楚莊王不可厚葬愛馬，以免貽笑四方，以及要善待功臣的後裔，以便留住進而招攬人才；優旃以諧趣改善侍衛的值班時間，勸諫秦始皇不可擴建苑囿，以及諷諫秦二世不可浪費資源漆城；三個人物都針對某個問題而提出具體的建議，這顯示以諷諫為目的的諧趣，人臣（第一人）有意與國君（第二人）合作，所以才提出對策，甚至執行計劃解決問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三種目的的諧作都沒有合作的態度：傅咸〈叩頭蟲賦並序〉故意倡導似是而非的示弱態度；夏侯湛〈抵疑〉、張敏〈頭責子羽文〉及王沉〈釋時論〉刻劃當世政治的混濁與權貴的醜陋，魯褒〈錢神論〉敘述拜金亂象，孫楚〈反金人銘〉批評鄉愿唯否，可是要如何改善政治、教化民心的辦法隻字未提；郭璞〈客傲〉謂清明的政治將使有識之士前來歸附，可是如何致治，郭璞沒說；至於袁淑三篇九錫文與〈勸進牋〉、孔稚珪〈北山移文〉、吳均〈食移〉及〈檄江神責周穆王璧〉、王琳〈鮒表〉則為純粹的諷刺之作，以諧趣討伐他們不以為然的對象。這些作品沒有任何建議，作者絲毫未有與批評對象合作的意圖，更不用說助其一臂之力了。因此這些作品也僅可視為作者宣洩對現實的不滿，而歸類為諷刺性或帶有攻擊性的諧作。

以諷諫為目的的諧作相比之下少之又少。皇甫謐〈釋勸論〉、束皙〈玄居釋〉以及曹毗〈對儒〉雖對在位者的態度較和善，但是各篇皆有釋放某種自利訊息的傾向——皇甫謐以疾篤拒絕徵召，束皙欲率性不願出仕，曹毗擁戴入朝當官的出處選項——所以並非純粹的諷諫諧作。〈牛責季友〉則比較符合諷諫諧作的標準，陸雲雖以責難的口吻行文，實則因為太子，即後來的晉惠帝（259-306）無能，於是諷諫齊王攸進取大位，而且陸雲也有意貢獻自己的力量，所以這篇文章或可視

為諷諫諧作。這在當時是極罕見的。

《文心雕龍·諧讖篇》認為諧趣從〈滑稽列傳〉到東方朔、枚皋等人，再到魏晉時代，呈現一個逐漸墮落的現象。〈滑稽列傳〉的人物有「抑止昏暴」的意圖；東方朔、枚皋「舖糟啜醢」，以少量的義理包裝俳諧之作，取悅君王，已有拾人牙慧之迹；魏晉時代的諧趣有的用於「揄笑衽席」，有的誤入歧途，以書寫醜婦、賣餅等鄙陋之人事物為樂，更甚者則以譏笑他人的外形特徵為趣；劉勰以為無論文辭多麼藻麗，實在「有虧德音」。然而，以諷諫為標的的諧作固然在魏晉以降大量減少，但從時人書寫鄙陋物件可窺望時人關照的旨趣獲得莫大的拓展，反映他們嗜好的多樣性，以及平素起居的趣味。這可以算是人生趣味的開放，也可以算是寫作態度的開放。至於運用諧趣為攻擊他人或針砭時政的作品，雖然未及得上〈滑稽列傳〉以諷諫為目的的諧趣，但是也反映時人對當代的反省與痛心，在某個程度上他們拒絕同流合污，也可視作知識分子的傲骨。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諧作雖然有不同的目的，但是許多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即撰寫得十分隱晦。各篇設論文在鋪陳各種不協調之餘，在論調上又來來回回地認同或反駁篇中的矛盾之處；在典故的運用上，作者往往有意不正確使用典故，如〈牛責季友〉，季友在政治作為上，並沒有陸雲描述的退卻；在〈反金人銘〉，孫楚有意偏離〈金人銘〉所訴求的個人修養範疇的「言」，轉而批判言論自由空間的「言」；又如〈檄江神責周穆王璧〉，周穆王未曾在南方沉璧；至於創造新角色，以動物、神話人物、世外高人等等來進行政治與社會批判的作品比比皆是，王沉〈釋時論〉、袁淑三篇九錫文與〈勸進牋〉、孔稚珪〈北山移文〉、王琳〈鮒表〉等均以虛幻人物展開論調。時人必須如此隱晦，以各種諧趣筆法抒發內心的不平之氣，很大程度上因為忌諱批判的對象會採取報復行為，為了自保所以不得不如此。雖然作者的初衷是為諷刺及攻擊某個對象，但是當其作品呈現高度的隱晦及不協調，難免引人側目；而且作品的數量一旦變多，作者便須塑造出荒誕的姿態或風格，以求自保。這也是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所序列的第四個諧趣目

的。雖然此期的諧作寫得隱晦，但是這不表示撰者不希望他人了解他書寫的動機。但凡以諷諫、自娛娛人、諷刺為標的的諧趣都希望對方理解——被諷諫之君王如果不解說者的意圖，諷諫就失敗了；要娛樂他人，怎麼會不希冀對方或旁觀旁聽者理解自己的意思？被諷刺或攻擊的人如果不理解諧趣的意涵，就等同在攻擊中全身而退，說者或作者也就未達到攻擊對方之目的。質言之，諧作的隱晦只是撰者的保護色，提供他們一個相對安全的途徑發聲，避免言論成為被迫害的理由；其荒誕狀則是撰寫諧作的外包裝，而隱晦與荒誕也更增添了文學的巧妙性與趣味性。

自娛娛人的諧趣文，顧名思義，乃撰者自得其樂的文章。然而，以攻擊他人為標的的諧趣相對最為盛行，原因當歸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社會亂象。錢穆氏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有一段精闢的分析：

東漢以來，社會早走上虛偽文飾之途。曹氏司馬氏篡竊相承，醜態百出，更令有心人深惡痛疾。又自郭泰許靖提倡人倫，臧否人物，社會上交朋接友，彼此推尊，漸成風氣，因此朋黨交遊虛文末節，更充滿了整個社會。朱穆〈絕交論〉，劉梁〈破群論〉，都想針對其弊而施匡救，但積重難返，直到魏晉之際，上下虛偽成習。¹¹⁶

實際上，虛偽之風到魏晉以後都沒有改善的跡象，只有越演越烈，所以後代九錫文才層出不窮，權臣此起彼落，篡竊之事一再發生。篡竊若成功，新政權多選擇以法治國，以鞏固中央集權；若王室大權旁落，權臣便結交朋黨，形成權貴集團，極盡能事去弄權營私，排擠忠良。於是志士既憤慨又痛心，一個個靠篡竊上位的權貴集團如攔路大石，讓他們莫可奈何，所以訴諸諧趣揭露權貴集團虛假的面具。袁淑的九錫文歌頌三隻禽畜、孔稚珪〈北山移文〉對言不由衷的假隱士憤

¹¹⁶ 錢穆：〈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7月），頁72-73。

懣不已、吳均兩篇批判官場用人陋習以及南齊的檄移文、各篇設論文對「時」的檢討等等，皆扎根在當時政治與社會各種荒唐狀之中。所以說，諧趣文常是現實批判的出口。這些文人在文學的場域，能夠得到洩憤與批判的機會，雖然這些的攻擊未必可以起多大撥亂反正作用。

另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導思想也從儒家轉向道家。逢耀東氏對當時的思潮如此評述：

儒家思想經長期凝結固定而失去其原有的彈性，無法適應漢末魏晉變動的社會。所以，就不得不自儒家之外，尋求能適應這混亂時期的精神指導原則，於是老莊之學便應運而生。老莊之學的清談也流行於當時的士族社會，的倫理生活，突破漢代禮教形式的約束，產生個人意識的自覺。因為在這個變動期，老莊之學較儒家思想更具有彈性，因此一躍而成爲這個時代新的精神指導原則。……由於儒家思想根基深厚，在社會中仍然具有潛力，儒家思想並不因老莊思想的勃興而被棄置。儒家的經典仍然被尊重，儒家的道德仍然是士族的生活規範，作爲世家大族在這個時代發展的重要支柱。……老莊、儒家思想仍然並存於魏晉社會之中，尤其是在成爲這個時代重要的社會結構環節的世家大族中，構成魏晉社會道德規範的雙層性。

117

即便儒家人物也不一定就古板無趣，不懂詼諧。孔子跟學生或友人之間有不少相互打趣的對話：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論語·先進篇》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

¹¹⁷ 逢耀東著：〈魏晉玄學與個人意識醒覺的關係〉，《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2月），頁154-155。

杖叩其脛。

《論語·憲問篇》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論語·陽貨篇》

孔子與顏淵身陷困境，隨時有生命之虞，兩人卻相互以「死」問候對方；原壤雖然坐相難看，值得批評，可是孔子的責罵卻不成比例，而且堂堂大學問家居然還要糾正學生坐姿這等事，大抵也令孔子又好氣又好笑，甚至莫可奈何；子游認真落實孔子的教誨，令打趣子游「割雞焉用牛刀」的孔子尷尬不已，訕訕地對大家自我修正道「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幽默感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因為不諧調感或違和感是人皆能夠感知的事。但是諧趣並非儒家的中心思想。反觀老莊思想則往往在不諧調感與矛盾之上，闡述義理。以《道德經》為例：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¹¹⁸ 〈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第三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第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

¹¹⁸ 王弼著：《老子王弼注》，《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2。以下《老子》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
柔弱處上。

〈第七十六章〉

人人爭相追求「美」、「善」的結果是不好的；「有」、「無」這對兩極的概念一體兩面，「難易」、「長短」、「前後」都是如此。不推崇賢德之人，百姓就不會爭艷奪麗，爭先恐後；不稀罕貴重物件，百姓就不會起貪念去盜奪；不要樹立該追求的東西，民心就不會亂；因此要治國，在上位者反而要「無為」，能夠「無為」，天下得治。色彩太豐富反而讓人目盲，音聲太多反而讓人耳聾，口味太多太重反而讓人失去品味的能力，馳騁田獵本該是痛快之事，卻反而讓人內心奔湧發狂，珍貴的物件反而掣肘人的行動。人求生的時候是柔弱的，求死的時候反而剛強，可是剛強者往往處下風，柔軟者反而處上風，強兵黷武反而無法讓人心服口服，讓人生生不息的價值儘管柔弱，才是真理大道。《道德經》處處都運用兩極的概念闡述義理，其矛盾之處正是這部經典最精彩與耐人尋味的地方之一。然而，它僅僅在哲學的層面作論述，開人心目；但沒有任何可以賦予愉悅感的諧趣元素。但是《莊子》就不同。《莊子》透過講述寓言，利用人物以及故事情節，給兩極概念畫龍點睛：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絛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絛，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絛，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內篇·逍遙遊〉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鱷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蝮猴然乎哉？三者

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蝮、獾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內篇·齊物論〉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
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
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外篇·至樂〉

大葫蘆在惠子來看，一無是處，莊子卻以為可以做大船；宋人只會把不讓手龜裂
的藥方用來洗衣裳，有人卻可以用來進獻給吳王在冬天打仗，從此發了大財；人
不可睡在潮濕的地方，泥鳅卻不然；人在樹上會驚恐，猿猴卻不然；人吃肉，麋
鹿卻只愛吃草；蜈蚣吃小蛇、貓頭鷹與烏鴉吃老鼠，人卻吃不了這些東西；毛嬙
與麗姬乃人間尤物，魚鳥卻毫不欣賞；妻子過世，莊子卻違反禮俗，坐姿隨便，
然後鼓盆而歌。《莊子》反對以偏概全，甲之熊掌，乙之砒霜，人間的議論紛紛，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內篇·齊物論〉)。《莊子》喚醒對既定僵
化觀念的反思，恰恰提供反對權威與傳說的基礎。

如果寓言的人物與故事情節給兩極概念畫龍點睛，那麼寓言的諧趣元素就給
兩極概念換上一層鮮麗的外衣，眉飛色舞地突顯各種矛盾之處以及荒誕狀，讓人
粲然之餘又無法移開目光：

湯之問棘也是已。……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
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內篇·逍遙遊〉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外篇·秋水〉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外篇·秋水〉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外篇·至樂〉

鵬鳥巨大無比，可輕而易舉地遨遊在天地之間，然而小鷓雀卻夜郎自大地嘲笑牠；受一國之君的禮遇本是尊貴之事，莊子卻寧願「曳尾塗中」。莊子與惠子「子非魚」的對話千古聞名，兩人是當時當地著名的知識分子，卻在莊子一句閑話「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之上爭吵不休，更甚者，莊子一向雄辯滔滔，卻一度居下風，差一點陰溝裡翻船。莊子問髑髏的三件事——「貪生失理」、「亡國之事」、「不善之行」——均指桑罵槐；髑髏在夢中給莊子闡述死亡的義理，以為雖「南面王樂」都不會超越不必向人間榮耀俯首的苦樂，可是莊子不相信，他以為髑髏



只不過自欺欺人，如果可以復生，髑髏便會流露貪生怕死的醜態。但髑髏反而真心實意認為死亡是解脫。莊子藉不協調營造諧趣，突顯人間榮辱、認知之本、死生之惑的各種矛盾與盲點。

魏晉南北朝的諧作常從《莊子》汲取養分，獲益匪淺，從而開創一個新形式文學創作。各篇設論文常以「客問」先序陳撰者所欲推翻的立場、反對的現狀，這些現狀一般都是僵化的、令人窒息的，然後撰者再以「主答」申論反對的原因。莊子與髑髏的對話也是類似的結構。袁淑九錫文的雞豬驢、孔稚珪移文的山神、吳均檄文的江神、王琳表文的鮪、張敏與陸雲雜文中的頭與牛，均以天馬行空的情節及虛構的角色意有所指，藉「正言若反」的筆法指桑罵槐，突顯社會與政治的荒唐狀以警世，都是借鏡《莊子》的寓言。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自述不洗頭、不沐浴、忍無可忍才起身小便，喬道元〈與天公牋〉的潦倒相，陶淵明〈責子詩〉諸子的愚鈍貌，也有《莊子》道在「螻蟻」、「稊稗」、「瓦礫」、「屎溺」，秦醫舐痔、烏龜曳尾塗中、枕髑髏而臥，援卑賤物以嬉笑怒罵人間百態的影子。雖然如此，魏晉南北朝的諧作跟莊老還是有所不同，莊老以不協調或諧趣闡述義理以警世，但是魏晉南北朝的諧作在層次上不如莊老深廣，它們多著眼於批判當代社會與政治亂象以及嘲諷特定對象，這是時人所作出的選擇。

要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諧作主要用以自娛娛人以及諷刺、攻擊、批判他人或現象為主，以諷諫為目的的諧作則甚少。這個分佈大抵受到當時莊老成為主流思想的學術風潮之影響，時人從莊老思想汲取養分，融入諧作的撰寫中。儘管以〈諧讖篇〉崇尚大我精神的標準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諧趣呈現走下坡的趨勢，但是此期的諧作反映在個人層面上，文人的品趣大量擴充；在出處進退的人生選擇上，他們不願與權貴合作，未能提出改善政治的方案，可是也不想全面配合權貴；此期的諧作即呈現時人各種雅俗的品味以及他們的人生選擇。



第四節 小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諧趣出現莫大的拓展。雖然從〈諧讖篇〉的角度來看，當時的諧趣已不再用於諷諫君王是一個墮落的趨勢，但是時人在題材上，將視角轉向新對象，對以往被視作卑賤的人事物產生興趣。他們孜孜不倦地觀察及品味，為這些對象違反規範或常態而驚艷不已，於是把這些收穫當成趣聞書寫在文章中以自娛娛人。他們關照的對象甚至包括自己遭遇的窘境如貧困、子孫不肖等。在書寫的過程中，他們不但不會閃躲或遮掩可能有損顏面的事，反而樂於把所有細節，從各個角度一一著錄下來。他們不但詳盡地書寫自己的窘迫，也無意顧及他們要諷刺與攻擊對象的顏面。對於他們想冒犯的對象，諧趣成為有力的工具，他們在衡量過自己可以承受的後果以後，適度地把持文章的隱晦程度，有勇於侮辱且開門見山地鄙視對方者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也有巧妙運用典故，曲折地挑戰當權者如吳均的〈檄江神責周穆王璧〉。至於籠統地批判政治與社會荒誕現象的諧作，數量就更多了。

無論是以自娛娛人或攻擊他人為標的，諧趣的書寫基礎都在於違反事物一貫的作法或挑戰社會現有的規範，製造矛盾或不協調，以達到突顯現象的荒唐性的隱藏目的。在儒家影響衰退，道家思想興起進而興旺的時代，時人從莊老思想得到新養分，展開新思考：敍寫過去不值一顧的事物，如餅食、刁奴即違反過去重視有價值物件或重要人物的作風；細述窘境、子孫不肖則違反家醜不外揚的精神；諷刺與侮辱他人即挑戰人際關係由來已久的禮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時人不但在題材與筆法上挑戰行之有年的成規，也意圖挑戰既有的文體典範，尤其是公文或較為嚴肅的論辯與說明文體。這些文體原本皆用以書寫正式的官方事宜，但是時人偷天換日，冒充它們的嚴肅性，設計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境，以襯托撰寫這些公文的官員的虛偽。袁淑三篇九錫文與〈勸進賤〉、吳均〈食移〉以及王琳〈鮒表〉皆有這層用意。孔稚珪〈北山移文〉則以公文文體批判假隱士的社會陋象；

吳均〈檄江神責周穆王璧〉雖忠於檄體責難討伐對象的初衷，但這篇檄文所注入的神幻色彩及迂迴亦挑戰了檄體本有的嚴肅性以及既定簡易的筆法。設論體原為文人探討出處進退的選擇，至魏晉南北朝，討論的中心逐漸轉向對「時」或世道的批判。不但如此，設論體不再限於討論出處進退，很多議題的辯論與現象的批判都借助設論體展開。

要之，魏晉南北朝時人選擇以諧趣作為自娛娛人以及攻擊他人的工具，不單以諧趣進行諷諫。在諧趣的表現方面，時人在題材的選擇、筆法的創新以及文體的新創都作出突破。無論從文學或思想的角度來看，這些變化都值得鄭重注意。

(空白頁)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文人生活的諧趣表現

如第三章第三節所論，逢耀東氏以為儒家思想在魏晉南北朝已不處在主導地位，老莊的道家思想則得到擁戴。這是此一時代的大事，因為它意味著時人的思維模式出現翻地覆地的改變。

從東漢至魏晉時代的思潮轉化，錢穆氏有更簡要的說法：

政治無出路，激起莊老個人思想的復活。但個人思想盛行，則政治更無出路。因此儒學衰而道學盛，濟其偏者必為法家。¹¹⁹

據趙翼（1727-1814）考察，西漢的開國功臣多半是亡命無賴，可是東漢的開國功臣卻大多是儒臣。¹²⁰然而時至東漢末，錢氏以為政府為了整飭社會，實施嚴刑峻法，法家儼然成為主流思想，乃至魏晉，曹氏、司馬氏皆跟進，以法儒兼濟整肅朝綱。何晏與王弼為魏晉之際的大學者，思想屬性應偏向儒家，然而其援莊老講孔子的作法，導致時人推挹莊老在孔子之上，開創魏晉玄學之先河。嵇康、阮籍則為了司馬氏主政之下的虛偽文飾的禮法禮制，轉向莊老，擁戴崇尚質樸率真的思想，魏晉玄學遂大盛。迨至元康，向秀、郭象之輩甘於墮落，已無嵇康、阮籍的絕俗之概，他們以莊老之名，放蕩越禮，元康以降大致如是。¹²¹從儒家至道家的思潮轉變意味著時人在思想上，放棄禮法禮制的單一性、約束性，轉而投向道家的多樣性、開放性——道在「螻蟻」、「稊稗」、「瓦礫」、「屎溺」，連各種最卑微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必然性。這樣的啟發很容易轉嫁到時人對自我的評價——自己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於是魏晉迎來思想解放的年代，自我意識覺醒促使時人爭艷奪麗，所以一時姹紫嫣紅，成為這個時代的潮流。只不過樹大易有枯枝：

¹¹⁹ 同註 116，頁 125。

¹²⁰ 〔清〕趙翼撰：《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9月），〈東漢功臣多近儒〉，頁 89。

¹²¹ 同註 116，頁 126-133。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雅量篇〉19條

王羲之面對前來選婿的郗鑒（269-339）不屑一顧，隨興地躺在榻上，而且衣冠不整。然而，在衆多認真以對的王家子弟中，郗鑒卻選擇了王羲之。擺脫禮法禮制的束縛，進而從道學獲得正當性以後，時人獲得嶄新的自由，末流之徒甚至把最無禮的失態粉飾為風流行徑，博得美名。無論如何，這無疑是儒學式微，道學崛起的副作用。

諧趣在道學如此盛行的環境中，因應而生而盛。如第三章第三節所論，諧趣的結構與老莊之學推演義理的方式有很許多吻合的地方，說諧趣得以盛行是因為注入道家學養也不為過，這點在情境諧趣中更為明顯。老莊之學除了開拓當時撰文的題材與筆法，給文章注入了大量的生命力，其不協調之妙趣充斥在時人往來交際的方方面面。時人日常的交往同樣以「不怕低俗」、「不顧禮貌」的姿態表現諧趣，以新穎的角度審視所關照的人事物。本章將針對不同情景的對話，第一節將探析魏晉南北朝時人在生活中，與他人往來時所展現的諧趣現象；第二節則探析關懷大我的諧趣在情景對話當中之發展以及其人物典範；由於以任誕求自存的諧趣與關懷大我的諧趣皆有人格特質的因素存在，第三節也將探析這一類型及其人物典範。第四節為本章之小結。

第一節 俯拾即是的生活諧趣

魏晉南北朝時人對於諧趣十分敏銳，對諧趣高度欣賞。他們對平日的對白與家常瑣事的詼諧元素津津樂道，以發掘諧趣滋養生活情調為樂。因此，有關機鋒相對的歷史記載往往饒富情趣。茲列時人的詼諧品趣。



一、童言童趣

魏晉南北朝是個天才少年輩出的時代，時人重視天才、崇拜天才，乃是這個年代最顯著的現象之一。¹²²另外，時人也喜作人倫品鑒，而幼童自然也成爲他們品鑒的對象之一。幼童自然的、甚至反射性的機智對答常常出乎他們意料，使他們驚艷，箇中詼諧的小趣味帶給時人許多純粹的娛樂效果：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言語篇〉4條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言語篇〉11條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夙惠篇〉3條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排調篇〉33條

¹²² 參看張師蓓蓓：〈魏晉學風窺豹〉，《中古學術論略》（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5月），第壹節，頁94-104。

徐之才八歲從周舍宅聽《老子》，舍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¹²³

孔融（153-208）兩個兒子均表現超出他們年齡的心智，小小年紀就偷學大人飲酒。偷酒本屬違禮之事，大兒子卻念及未經許可便喝父親的酒，理應偷偷拜謝才合乎禮儀，他似是而非的守禮，顯露對偷酒行徑忐忑不安，一個六歲的兒童展現複雜的思慮，所以顯得既可愛又詼諧；小兒子乾脆厚著臉皮承認偷酒已是違禮之事，不必多此一舉拜謝，弟弟比哥哥爽快，同時顯示他多一分誠實，雖然這份誠實是用在偷酒中。在行偷的過程，不但哥哥的糾結及弟弟的乾脆有詼諧的效果，偷竊當下，行動本該利索，兩個孩子卻花時間，而且發出聲音討論要不要拜謝的問題，這個過程也充滿童趣。鍾毓（?-263）與鍾會兩兄弟謁見魏文帝之際，兩人都十分害怕，鍾毓嚇得汗出如漿，本該是緊張情緒最極致的表現，殊不知鍾會居然「技高一籌」，嚇得連汗都不敢出。晉明帝先以太陽比長安遠，因為從未聽過有人來自太陽，說得頭頭是道。第二天，晉元帝要炫耀晉明帝的聰慧，再次提問同樣的問題時，晉明帝卻以長安比太陽遠，因為舉頭可見太陽卻不見長安，相反的答案又一次說得頭頭是道，兩次都給晉元帝帶來驚喜。東晉·庾爰之（?-?)與正當幼兒之孫放（330-?)兩人的互侃也是趣味十足，由庾爰之首先「發難」，犯孫放父字諱，孫放的父親孫盛，字安國；孫放隨即以同樣的規格回敬，犯庾爰之父親庾翼（305-345）字諱（稚恭）。可是庾爰之沒有因此而認栽，反而進一步犯孫放父名諱，孫放的回擊也跟著升級。在第二輪交鋒之中，庾爰之犯孫放父名諱犯得非常高明，因為他假借讚許孫家兒孫輩大「盛」而趁機犯諱。孫放也沒有示弱，客氣地謙讓庾家後代「翼翼」回敬犯諱。孫放機智且沉著地應對，見招拆招，雖然孫放當時年幼，能夠配合庾爰之冒犯的程度進行適度的反擊，表現十分出色。

¹²³ [明]林茂桂撰，詹子忠評，高洪鈞校注：《南北朝新語》（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捷對篇〉，頁245。

並且孫放以疊字「翼翼」犯了庾爰之父名諱兩次而贏過「諸孫大『盛』」，所以洋洋得意。由此可見，庾爰之與孫放均享受這段互相調侃的過程，也因而鋪成一段諧趣的佳話。徐之才（492-572）年僅八歲，就出人意料地引經據典反駁別人的調侃，而且應對得十分得體有趣，所以令人喜出望外。孔融兩個兒子被發現偷酒喝，大抵惴惴不安；鍾氏兄弟覲見魏文帝，兩人惶惶慄慄，哪能自娛娛人？年幼的晉明帝亮度回答父親的問題，也沒有詼諧的姿態；八歲的徐之才只積極為自己果腹的行為辯護。這些幼童都沒有自娛娛人的意識。反觀這些童子身邊的大人卻往往有意打趣他們，期待他們會說出超出他們年紀的話，被他們的言行逗樂，晉元帝、庾爰之與周舍（469-524）最爲明顯，顯然兒童的口角諧趣也被認爲是天才的表現之一。

大人常會跟幼童開一些自以爲詼諧的玩笑，自以爲風流風趣，殊不知在幼童的立場，卻往往認定爲攻擊性的言語，這個認知上的差異反而激化了幼童不服輸的鬥志，他們因此認真地反唇相譏，增強了詼諧效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言語篇〉43 條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排調篇〉30 條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排調篇〉40 條

孔坦（286-336）以友人的姓氏逗其子，把楊家一姓的莊嚴性降至一顆小楊梅般不足掛齒，其實把楊姓與楊梅掛鈎的邏輯一點都不通，孔坦以爲九歲的楊氏子會啞口無言，可是楊氏子隨即反將一軍，用的是同一套邏輯，把孔氏淪爲跟孔雀相提

並論。孔坦自然是爲了逗趣所以調侃楊氏子，然而楊氏子的回應隱隱然機鋒相對，含有些許報復的意味。東晉·張玄之（?-?）八歲乳牙掉了，有長輩把他掉牙的孔比喻成狗洞。張玄之反應急速，隨即回答是爲了方便如對方的狗輩出入。這段對應顯示長輩知道張玄之聰慧，所以有意試探，長輩的初衷是爲了自娛娛人。可是當時還是孩童的張玄之可能不曉長輩的調侃，以爲長輩貶損他爲狗。於是張玄之把調侃當作攻擊，所以用力回擊，嘲諷長輩爲狗。張鎮與張憑祖孫這段對話有兩個詼諧點，一則是張鎮以褒爲貶，明裡羨慕他的兒子比他強，因爲有生出張憑這麼一個兒子，實則以退爲進，調侃他的兒子不是理想的人才；一則最年幼的張憑反而是三人中最成熟的一位，認真地勸誡張鎮以子戲父不宜。大人或許以爲與孩子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在孩子看來卻是遭到攻擊，而必須予以報復，顯示說者與聽者對同一句話的解讀有所不同，聽者於是對說者的意圖，乃至於對說者的品格特性，也會出現不同的見解。

與幼童相關的諧趣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此常見，也顯示諧趣深深融合在時人的生活當中，幼童從小就浸淫在如此氛圍中，所以妙口生花，長大以後能夠在名士交往的場合馳騁詼諧與風流。

二、社交場合的諧趣

諧趣在文人的交往之間最爲常見。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對那些玩笑開得有分寸的人，稱爲機智，因爲他們有種觸景生情、見機行事的本領。……事物的可笑方面俯拾即是，大多數人在娛樂和玩笑中更爲開心，甚至把戲弄也稱爲機智，因爲戲弄被認爲是逗人喜歡的。」¹²⁴愈是妙才巧思的文人愈是妙語如珠。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時人的諧趣在孩童時期便漸露圭角，那麼成年以後的諧趣就如狂襲的

¹²⁴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譯：《尼各馬科倫理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1月），頁85。

浪潮般，充斥在文人各種往來交際之間，箇中樂趣無窮：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言語篇〉40 條

王丞相枕周伯仁腹，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排調篇〉18 條

周顛（269-322）雖然被王導間接害死，可是兩人關係本來極要好，相互調侃甚是常見。王導見到周顛儀表堂堂，但是下車時卻要好幾個人攙扶，坐下以後又撮唇吹口哨，態度輕浮，與舉止容貌不相符，想必在王導眼裡，周顛自詡俊逸，卻花樣百出，所以忍俊不住反詰周顛欲習嵇、阮之任誕。周顛也非省油的燈，立即回敬自己乃是以王導為師。兩人關係的親密從肢體語言便可看出，王導可以枕在周顛的膝蓋聊天，如果不是特別要好，難以如此近距離接觸。王導問周顛腹中有何物，實則暗示周顛雞腸小肚，周顛卻順水推舟，承認其腹「空洞無物」，雖然如此，卻也還容得下數百個猶如王導等級的人物。周顛一來抬高了自己的度量，二來又貶低王導小人之心的胸懷。兩人棋逢敵手，周顛似乎略勝一籌，日常上的機鋒相對逐漸砌成他們深厚的交情。無怪王導以為周顛見死不救而心生怨恨，因而對摯友袖手旁觀，以致王敦（266-324）殺死周顛以後，王導發現真相而直呼「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悔恨至深（〈尤悔篇〉6 條）。詼諧的言談並不限於王導與周顛之間，時人多隨意揮灑諧趣：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寵禮篇〉4 條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排調篇〉6 條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
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排調篇〉12條

李業興，學問該洽，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
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
當著被罵。」¹²⁵

顏延之、何尚之二人少相好，並短小，何稱延之為猿，顏目何為猴。同遊
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我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自
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¹²⁶

盧元明因戲徐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即答云：「卿安亡為『虐』，在
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¹²⁷

許詢(?-345)是當時甚有名氣的清談名士，在丹陽逗留了一個月，劉惔每天去拜訪，雖是京尹仰慕過度，反而自嘲要是許詢再不走，自己就要失職。孫楚機智地引用許由洗耳的典故把口誤順水推舟轉化成固守清高的意志，而且「漱石」以「礪其齒」是爲了增進自己辯護的口才。這些諧趣都有助於時人為對話平添趣味的功效。王導問諸葛恢(284-345)兩人並提時，諸葛恢為何居前，這個問題本來也是王導有意調侃諸葛恢，¹²⁸口吻有些興師問罪，挑戰諸葛恢怎會比他出色。諸葛恢以驢馬為例，把自己比作馬，有意與馬的英姿結合，把王導比喻為驢，以驢作為家畜拉磨負重的劣勢打趣王導，暗示自己確實要比王導高明。孫騰(481-548)有

¹²⁵ 同註 123，〈誕傲篇〉，頁 425。

¹²⁶ 同註 123，〈嘲詆篇〉，頁 451。

¹²⁷ 同註 123，〈嘲詆篇〉，頁 457。

¹²⁸ 余嘉錫案曰：「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後如夏商、孔顏之類，則必以平聲居前，仄聲居後，此乃順乎聲音之自然，在未有四聲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驢馬，不言葛、王馬驢，本不以先後為勝負也。」同註 29，頁 930。

意突顯李業興（484-549）在南人面前失態，李業興卻反唇相譏自己只有被人取笑，換作孫騰則恐怕要至招罵的程度。顏延之及何尚之（382-460）的互動亦透露兩人交情匪淺，他們平時可互相譏笑對方樣貌醜惡似猿猴。兩人共遊太子西池，顏延之隨便找了路人問他們兩人誰長得像猴子，顯示其隨性的一面。路人的回答也妙趣橫生，他以何尚之長得像猴子，顏延之則是真猴，不但沒有與顏延之合作取笑何尚之，反而將顏延之一軍。顏、何與陌生人的交際能夠載入史冊，顯示諧趣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用姓名作文章的諧趣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層出不窮，或犯諱或取笑他人的名字，盧元明（?-?）與徐之才的對話便是一例。盧元明說徐姓是「未入人」，牙尖嘴利的徐之才便「舉一反四」，以「虐」、「虛」、「虜」、「驢」譏笑盧姓。取笑別人的名字姓氏似乎是徐之才慣用的諧趣伎倆。他亦曾嘲笑王昕的姓氏：「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¹²⁹時人運用各種妙語構建日常的言談情趣，從而點綴他們往來交際的品味。

諧趣不但流行於士人之間，即便皇帝與下臣的對話亦是如此：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排調篇〉11條

齊高帝出太極殿西室，張融入見，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融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¹³⁰

李彪為李冲劾除名，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¹³¹

蕭琛為尚書侍中，預宴醉伏，上以棗投之。琛起，取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即答曰：

¹²⁹ 同註 87，卷 90，頁 2972。

¹³⁰ 同註 123，〈捷對篇〉，頁 238。

¹³¹ 同註 123，〈捷對篇〉，頁 253。

「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上笑悅。¹³²

晉元帝（277-322）喜得皇子，故賞賜群臣，並接受眾臣恭賀。在這樣的場合，殷羨（?-?）自謙無功受賜，他的恭賀乃客套話，雖然顯得有些笨拙，卻也沒有十分出格。然而晉元帝沒有放過打趣殷羨的機會，笑稱生兒子的事也輪不到別人來出力。皇帝不但調侃臣屬，臣屬也會捉弄皇帝。張融（444-497）謁見齊高帝（427-482）居然姍姍來遲，齊高帝問他遲到的理由，張融把齊高帝比作天，登天快不了，因而遲到。這個是一個有意取巧的回答，可是詼諧十足，齊高帝也沒有為難他。張融與齊高帝諧趣的對話並不限於這樁。張融對自己的草書很得意，齊高帝對他說：「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張融對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¹³³李彪（444-501）十分得寵於北魏孝文帝（467-499），孝文帝稱：「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¹³⁴兩人久別重逢以後，孝文帝劈頭就驚嘆「朕以卿為已死」，觸李彪楣頭；李彪也不遑多讓：「子在，回何敢死」，引用孔夫子與顏回的對話，一方面拉高談話的高度，同時又撥開了「死」的惡詛。兩人的對話著實讓人捏了一把冷汗，如果不是交情甚篤，絕不可能當作玩笑話。蕭琛（478-529）在梁武帝宴請之際，因為梁武帝用棗子丟他，所以拿起栗子便回擲梁武帝，正中梁武帝的臉。梁武帝面子掛不住，故意發作訓斥蕭琛，蕭琛巧妙地運用「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離婁下》）的邏輯，稱他不過是投之以「棗」，報之以「栗」，回報梁武帝。梁武帝驚艷於蕭琛的機敏，本來的攻擊出乎意料地轉化為善意，所以被逗樂了。蕭琛的回答同時也隱晦地暗示始作俑者是梁武帝，因為是他開始丟棗子的。從諸例來看，連皇帝也好諧趣，而且當場合、交情、玩笑話的分寸與執行等拿捏得當，諧趣可以充分達到自娛娛人、聯絡感情

¹³² 同註 123，〈捷對篇〉，頁 235。

¹³³ 〔唐〕李延壽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南史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11 月），卷 32，頁 853。

¹³⁴ 同註 87，頁 1459。

的功效，而且不會引起對方的報復。

諧趣能夠完成自娛娛人的使命，一方面也是因為它有化解尷尬的功能：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

「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言語篇〉17 條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

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言語篇〉20 條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閤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

「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賢媛篇〉22 條

齊高帝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

王儉等未及答，褚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

「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佑久矣。」¹³⁵

鄧艾與滿奮身上都某些缺陷，鄧艾有口吃，滿奮怕吹風，無論旁人是善意還是惡意，兩人平生大抵受到外界不少嘲弄，時常處於尷尬的狀態。然而兩人都運用諧趣成功化解尷尬，鄧艾被戲弄時，引用楚狂接輿對孔夫子唱的歌詞，回復「鳳兮鳳兮」，自詡還是一鳳；滿奮則自嘲是畏熱的「吳牛」，連見到月亮都會發熱，氣喘吁吁；前者提升自己的面子，後者則稍稍自損，均為無傷大雅的玩笑，諧趣所發揮的愉悅感因此緩和了可能造成的尷尬氣氛。庾友是庾冰的三子，也是庾希的弟弟、桓溫侄女的夫婿。庾希被桓溫以謀反的罪名羅織，庾友夫婦因連坐，也將被誅殺，所以桓溫的侄女急得連鞋子也不穿就跑去找桓溫哭訴。其實她大可不必

¹³⁵ 同註 123，〈捷對篇〉，頁 243。

這麼急，余嘉錫案曰：「友若不獲赦，則宣武亦當從坐。故曰『婿故自急』」，¹³⁶桓溫一定要赦免庾友，才能避免被連坐，所以侄女本來不求情，其夫婿也會沒事。要赦免庾友，桓溫勢必引起徇私的非議，所以赦免一事本應低調處理。殊不知侄女居然大哭大鬧，儀容狼狽地衝到桓溫跟前求情，讓桓溫哭笑不得，所以開玩笑庾友「婿故自急」，化解尷尬。齊高帝（427-482）原本是南朝宋的權臣，後來受禪，成為南朝齊的開國之君，故與昔日同袍，今日之臣屬宴飲時，打趣王儉等人過去不見得支持他當皇帝。褚彥回（435-482）的回復則其來有自。元徽二年，褚彥回與從弟褚炯在路上偶遇齊高帝，褚彥回對褚炯曰：「此非常人也。」後來對別人說道齊高帝再次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¹³⁷齊高帝開玩笑地翻舊賬的時候，褚彥回也搬出往事反駁齊高帝，以為齊高帝把他與其他人相提並論實在冤枉了他，因為他早就品鑒出齊高帝前途無量。齊高帝反被將了一軍。此時已經成為皇帝的齊高帝餘裕十足，褚彥回重提兩人的往事，藉著突顯齊高帝天生不凡，成功取悅齊高帝，也化解齊高帝製造出來的尷尬。諧趣能夠化解尷尬主要因為它可以讓聽者分享到說者所製造出來的愉悅感，所以化解尷尬是諧趣重要的功用之一。

於是，諧趣在文人的社交場合成為重要的話術，在談論的過程中尤其有用。諧趣除了可以展現說者個人的機智特質或者品性格調，若是談題或對話觸及人倫品鑒不免臧否人物，諧趣也能夠提供緩衝作用，緩和對他人的批評。此類情況甚常見，茲舉數例：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品藻篇〉35 條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

¹³⁶ 同註 29，〈賢媛篇〉，頁 816。

¹³⁷ 同註 133，頁 750。

逮。」

〈品藻篇〉78 條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

「敬豫事事似王公。」

〈容止篇〉25 條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排調篇〉

1 條

范啟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郝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排調篇〉50 條

祖廣行恆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排調篇〉64 條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輕詆篇〉30 條

上党王渙材武絕倫，恆以將略自許。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¹³⁸

桓溫出身武將，名士或多或少有點瞧不起他。桓溫曾以勁裝打扮遇到劉惔，劉惔不客氣地問他：「老賊欲持此何作？」（〈排調篇〉24 條）桓溫曾與王濛、劉惔出遊，酒酣耳熱之際，劉惔竟把腳放在桓溫的脖子，桓溫把腳撥開。回去以後，王濛還對劉惔說：「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方正篇〉54 條）因此當桓溫問殷浩（303-356）他比起自己如何，殷浩對桓溫的不以為然也呼之欲出，加上兩人本

¹³⁸ 同註 123，〈才略篇〉，頁 340。

來就有矛盾，故殷浩說「寧作我」，其不以為然之意雖然溢於言表，可是殷浩避免直接一一道出桓溫的缺點。謝安問王恭（?-398），他的祖父王濛比得上劉惔與否。劉注曰：「言濛質，而惔文也」，王恭以為王濛更有內涵，沒必要趕上劉惔，但是王恭表達了優越感的同時，口吻仍較為含蓄，對王濛的摯友還是留有情面。王恬（?-?) 是王導的次子，王導寵愛長子王悅（?-?)，對次子難有和顏悅色的時候。¹³⁹王恬跟王導請安的時候，王導打趣王恬「阿奴，恨才不稱！」這是一句讓人哭笑不得的話，因為王導讚賞王恬出眾外形的同時又狠狠地譏笑他才氣不足。雖然如此，王導詼諧的打趣總是比嗔怒對待王恬來得和善許多。有趣的是，劉義慶補充時人云：「敬豫事事似王公」，也顯示劉氏作為撰者的諧趣——王導嫌棄王恬，可是王恬很像王導，則王導並沒有比他不鍾愛的兒子高明多少。諸葛瑾（174-241）的別駕因諸葛瑾提及兒子諸葛恪（203-253）善於清談，所以前去拜會。可是諸葛恪架子很大，不願與別駕會面。別駕想必很不忿，欲挫其銳氣，所以在另一場合，有意冒犯諸葛恪，以「咄咄」叫喚他。諸葛恪還是懷著一股傲氣，指責別駕有失規矩。接下來兩人便唇槍舌戰，別駕以「君明臣賢，未聞其亂」反駁諸葛恪，意在堵住的諸葛恪的去路，因為諸葛恪的父親即他的長官，英明的諸葛瑾帶領賢達的部屬，何以有亂？無論在立場還是論述上，諸葛恪都無法攻擊別駕。殊不知諸葛恪又以唐堯比喻父親，四凶比喻別駕，突破別駕的防守，譏刺了別駕一番。別駕也不退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同樣的邏輯，先保留唐堯比諸葛瑾，卻以丹朱比諸葛恪。兩人一來一往展現機智，比喻露骨但又不直接謾罵對方，別駕技高一籌，居然贏過素有談名的諸葛恪，諸葛恪栽在自己邏輯的譏刺上，所以惹得哄堂大笑。范啟（?-?) 的個性虛假惹人厭，如此個性容易成為譏刺的對象，何況是他先發難譏笑王獻之，所以郗超（336-378）便回擊范啟。范啟

¹³⁹ 〈德行篇〉29條：「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

劉注引《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同註29，頁37。

及郗超與諸葛恪及別駕的對話性質相近，都有暗中較勁的意思，惟郗超的攻擊性較強，比較認真，其諧趣遊走在社交場合的風趣以及矛盾衝突的對峙之間。桓玄（369-404）打趣祖廣（?-?）縮頭狼狽的體態，與支道林形容王徽之兄弟諸人宛如一群吵鬧的白頸鳥，皆以對方外形作文章，前者的玩笑意味甚濃，桓玄似乎被祖廣尷尬的舉止逗樂，忍俊不住而調侃他；後者則稍有嫌棄的意味，彷彿對王氏兄弟的聒噪不以為然，以諧趣的方式諷刺他們。高渙（534-558）為北齊神武帝的第七子，很有武才，故對擁有文才的博士不以為然，以玩笑告誡不可成為博士，以此取笑博士多為書呆子。從以上各例來看，在諧趣的包裝之下，說者的攻擊性無論多少，都得到緩和，避免最激烈的僵持與衝突。

從人倫品鑒中的臧否人物諸例來看，自娛娛人以及諷刺、攻擊他人兩者的界線其實十分模糊。殷浩說「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此話繞口又古怪，雖然是句玩笑，輕視桓溫之意也是溢於言表；諸葛恪比喻別駕為「四凶」，別駕又比喻諸葛恪為「丹朱」，也有犄角相牴的態勢；郗超嘲諷范啟「舉體非真」，隱隱然有將發作翻臉的跡象。茲再舉數例補充說明：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言語篇〉98 條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方正篇〉20 條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忿狷篇〉3 條

李庶以清辯知名，生而天鬣。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

謹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¹⁴⁰

在以上各例中，說者在言語間往往帶著濃厚的弦外之音，他們到底是自娛娛人，以諧趣聯絡感情，還是藉機揶揄他人，其實雌雄難辨。他們很可能都抱持一個以上的目的打趣與之對話的人，如司馬道子（364-403）戲弄謝重（?-?）之語便是如此。司馬道子戲語的背景見於〈言語篇〉100條：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謝重與王恭（?-398）交好，於私兩人是親家，於公王恭極力拉攏謝重於旗下。司馬道子與王恭是死敵，司馬道子在王恭生前處處受王恭掣肘（語在《晉書》，卷84）。王恭謀反失敗，謝重雖未被牽連，但是以兩人的交情，自然遭司馬道子猜忌。司馬道子問謝重「王甯異謀，云是卿為其計」即是對謝重的政治立場有種種疑問。但憑謝重、王恭兩人過去交情甚篤還是難免惹人非議，今王恭已死，司馬道子遷怒於謝重也是有可能的。如此一來，「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一語就帶有試探的意味，也有可能是秋後算賬的前奏曲，而非僅僅一句無傷大雅的玩笑。另一則，王衍（256-311）與庾敳（263-312）的認知也是不盡相同的。王衍很抗拒庾敳以「卿」相稱呼，以為兩人的交情未至以「卿」相稱的地步。庾敳卻視若無睹，賣俏地說：「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一口氣用了數個「卿」字叫喚王衍，故意惹王衍不快。庾敳收穫自娛娛人的快感，王衍卻十分厭惡。王胡之（?-348）與王恬（?-?）亦是如此，王胡之惹得王恬不

¹⁴⁰ 同註 123，〈嘲詆篇〉，頁 473-474。

快，有意跟王恬示好，可是王恬越發生氣，把王胡之的手比作「鬼手」。北齊的李庶（?-?）與崔謚（?-?）兩人同樣不同調。李庶生來有殘疾，是天閹，旁人若遵循禮貌，本該有所避忌。崔謚卻自詡風趣，以李庶的殘疾作文章，教他種鬚鬚的方法。李庶隨即反擊，叫他把方法留待自家使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揶揄崔謚家族有遺傳病導致缺眉、病瘦、早夭；不過這個尖銳的訊息已經透過諧趣包裝，所以在一旁的邢子才了然於心，哈哈大笑。崔謚就算想發作，但是這場玩笑式的交鋒由他引起，此時若是翻臉，會越發顯得沒有風度，礙於面子，崔謚大抵也只能認栽作罷。以上諸例皆是說者與聽者處於不同調的狀況，而且說者或秉持一個以上的諧趣目的，因此自娛娛人與諷刺他人兩種目的往往是相交錯的。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收穫此類諧趣的愉悅感的一方，有時候往往不是犄角相抵的說者與付出面子代價的人，而是在一旁的旁聽者——李庶與崔謚相互譏笑對方的生理缺陷時，邢邵（496-?）在一旁哈哈大笑；諸葛恪以別駕為四凶，別駕以諸葛恪為丹朱，兩人鬥嘴時，隔岸觀火的旁人也是覺得十分有趣而大笑的；劉義慶補充時人云：「敬豫事事似王公」（〈容止篇〉25條），也是在嘲笑王導五十步笑百步。質言之，不僅僅在一旁的人覺得好笑，後來的讀者也能感受到詼諧而莞爾發笑。當諧趣的參與者有了餘裕，即不必承受當事人的怨懟之氣的時候，這個參與者（多為旁聽者或讀者）能夠欣賞或找到不協調的情況所帶來的樂趣，從而愉悅地發笑。這也說明無論是哪一方，參與者的立場將決定他能否收穫諧趣的愉悅感，哪一方的心理有餘裕，就可能發掘與收割諧趣帶來的心理紅利。

在一段對話中，諧趣會隨著參與者的反應發生變化，發揮不同的效果，有時可以緩和矛盾，有時卻會招來禍害：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賢媛篇〉24條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

「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排調篇〉61條

齊豫章王嶷，少時與瞻友。瞻常候嶷。（齊）武帝在大床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耶！」帝笑稱多王（嶷小名）：「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以跪拜不如儀，付廷尉殺之。¹⁴¹

桓沖（328-384）與夫人這段互動本來沒有諧趣的成分。相反地，兩人有些僵持。桓沖因為夫人送來新衣，不是舒服的舊衣而不快，氣沖沖地使人把衣服送還。夫人也動了氣，覺得桓沖不可理喻：「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此話在情在理，桓沖被反將一軍，意識到自己無理取鬧，反而笑了。由於桓沖的反應起了變化，原本緊張的氛圍頓時變得輕鬆詼諧，桓沖也無意間收穫諧趣帶來的愉悅感。在清談的場合，桓玄、殷仲堪（?-398）和顧愷之（341-402）作機智戲語，氣氛本來生動有趣，人人享受著精神的競技，來自他方旗鼓相當的交鋒。作危語的時候，三人的危語內容充斥著各種危險氣氛，「矛頭淅米劍頭炊」¹⁴²，生死交戰之際，洗米、炊飯都是險象環生；「百歲老翁攀枯枝」，百歲老翁已老態龍鍾，卻攀爬枯枝；「井上轆轤臥嬰兒」，轉動的轆轤隨時會把沒有自救能力的嬰兒跌落；最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因素更多，盲人已看不見，卻擇瞎馬而騎，盲人、瞎馬已夠危險，卻在夜半之際跑到深池，若到遇險，根本無人搭救。此番一來一往原本是馳騁清談雅興，可是殷仲堪的參軍插嘴說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¹⁴¹ 同註 123，〈誕傲篇〉，頁 417。

¹⁴² 余嘉錫按曰：「此不過於戰場中造飯，死生呼吸，所以為危也。」同註 29，〈排調篇〉，頁 965。

碰觸到殷仲堪一隻眼睛瞎掉的痛處，殷仲堪頓時覺得被攻擊被冒犯。對殷仲堪而言，歡娛的氣氛隨即急轉直下。更甚者有因諧趣目的變質而慘遭殺身之禍，如王瞻（?-?）。王瞻確實禍從口出，在齊武帝未成為皇帝之前，得罪他。王瞻與齊豫章王蕭嶷素有來往，一次指著齊武帝正在就寢的帳篷，對蕭嶷說：「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那人也跟一般人一樣起臥有時。王瞻的話對齊武帝或許有些不屑，但是仍屬玩笑。齊武帝知道以後，對蕭嶷自嘲地說到必定是自己愚笨，才惹來王瞻的貶低。王瞻故意附和齊武帝的謙辭，確定齊武帝真的愚蠢，自己不願意與他清談。齊武帝文武雙才，那裡受得了個性孤傲，說話刻薄的王瞻這番鄙視？於是，一場社交場合的笑語便產生質變，齊武帝當時沒有發作，但是日後找個機會就把王瞻殺了。由此可見，諧趣的情趣會出現變化，也顯示參與者容易徘徊在自娛娛人與諷刺他人兩種諧趣之間。

以巧妙的言語揭露他人短處，並加以恥笑的諧趣在此時期十分常見，茲舉數條為例：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文學篇〉33 條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品藻篇〉29 條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閒物，亦不可得也。」 〈排調篇〉65 條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輕詆篇〉15 條

殷浩與劉惔清談，理屈以後不肯承認，劉惔雖當面不說什麼，內心十分鄙夷殷浩的做法，故在背後說殷浩是個沒見識的村夫也想學人清談，言語間充滿不屑。劉惔口才佳，經常以看似玩笑的方式嬉笑謾罵。王羲之稱讚郗府傭人優秀，可是劉惔竟把一句讚美的話挪用於貶低家主的兒子郗愔，以為那個僕人若是勝不過郗愔，也不見得優秀。桓玄向桓崖（?-?) 求桃，可是桓崖不給，桓玄只好自我解嘲說大概我品德不足服人，人品要是讓人佩服，就算遠古肅慎氏珍貴的楛矢都能呈上；如果品行低劣，連種在院子的東西都得不著。孫綽（314-371）之作〈列仙商丘子贊〉備受好評。劉注引《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起須要，言『但食老朮、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¹⁴³〈列仙商丘子贊〉的用意是要彰顯商丘子不為世間榮辱所擾，貴其逍遙自在。可是王述（303-368）卻看不上孫綽，不僅不呼其字號官位，稱其「孫家兒」，也鄙視他以「真豬」一詞入文。事實上，時人多不看重孫綽，有《世說新語》有兩條材料為證：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輕詆篇〉9 條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

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方正篇〉48 條

劉注引《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¹⁴⁴孫綽雖富文才，向褚裒求饒之貌卑賤且狼狽可笑；以文辭示好，卻討好不到庾羲，庾羲斥責他借故套交情，其父庾亮位高權重，未曾如誄辭所言：「咨予與公，風流同歸。」

¹⁴³ 同註 29，頁 984。

¹⁴⁴ 同註 29，頁 631。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悔非」，¹⁴⁵與孫綽如此親近。時人看不上孫綽，褚裒、庾羲是如此，王述也是如此，進而鄙視其文。說者不必以強烈的言語表示鄙視，有時只有幾句輕描淡寫的話，但諷刺的力道已經很大。這是高明的攻擊，也是高明的諧趣。

諧趣在社交場合上，往往可以發揮莫大的效用。諧趣可以增進與他人的感情、化解尷尬氣氛，同時也可以不留斧鑿之痕地去諷刺或攻擊他人。前者屬多方因諧趣而受惠的情況，後者則可能暗潮洶湧。高明者如謝安則能夠把握諧趣的特性，用諸搭救他人。實際上，最能享受諧趣的人有時候反而是置身事外的旁人，例如當時在場的人。諧趣在社交場合的效果顯著，乃時人交際手腕重要的工具。

三、關於認同的諧趣

從儒家式微到道教成爲主流思想，魏晉南北朝人從僵化的儒家禮法解放，並得到道家思想的啓發，轉向內觀，發掘自我的價值，人倫品鑒因而十分盛行，時人喜對人品頭論足，從裡到外皆如此，不但品鑒他人，也多自視甚高。時人對身分的認同有強烈的追求，從外形上的俊美到內在神采飄逸的個性美都成爲此期爭相追捧的風潮。除此以外，在家重於國的時代觀念下，家族的榮光也是神聖不可侵的。因此，個人的外形以及從內而外的風采，還有家族的姓氏名諱，都成爲相互打趣與攻擊的絕佳點諧趣題材。這種強烈的身份認同也延伸到地域觀，尤其南北人物對彼此帶著或多或少的反感。這些都是時人在身份認同上會面對的議題。

以外形及神采打趣別人的例子不勝枚舉，前節已多作分析，茲增列數例補充說明：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¹⁴⁵ 同註 29，頁 385。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沈昭略，文叔之子，使酒仗氣，路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勝肥，狂勝癡。」¹⁴⁶

周顛口才甚佳，是時無人不曉，他問庾亮「何所欣說而忽肥」就顯得有些不懷好意，庾亮自然有所防備，反問周顛「何所憂慘而忽瘦」。周顛巧舌如簧，藉著自己沒有煩惱，自然清虛來隔山打虎，譏笑庾亮渣滓多又肥。頭髮白得早就顯老，顧悅之（320-?）以蒲柳謙稱自己資質欠佳，外形只會隨著時間走下坡，反觀簡文帝卻有如「松柏之質」，年紀愈長愈好看。沈昭略（?-500）在酒醉之際，仍牙尖嘴利，以自己精瘦輕狂，還是略勝王約（?-?）肥胖愚鈍。以上例子皆顯示外形與氣質乃時人在交際場合的兵家必爭之地，周顛、庾亮、沈昭略、王約均採取攻勢，盡力挖苦對方；顧悅之則採取守勢，自謙不如簡文帝風華，從而化解尷尬。諸番攻防皆因當時個人的身份及名譽都至關重要。

對於魏晉南北朝人的家族觀，張師蓓蓓在解釋「禮」於此時期的重要性時，有一段精要的描述：

門第家風必須維持，是魏晉人無法絕然棄去禮法的一個主因。當時朝市革易甚速，政治上無可為，自保門第成爲時人的終極理想；而門第究不能只以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支撐，終須有佳子弟，才能談得上安親保榮；於是家風與家教一時大見重視。而良好的家風家教便少不得禮。¹⁴⁷

¹⁴⁶ 同註 123，〈嘲詆篇〉，頁 469。

¹⁴⁷ 同註 122，頁 131-132。

儘管魏晉南北朝人崇尚逍遙，爭相標新立異以示風流，門第家族仍是他們驕傲與身份的基石。正因重視門第家族，當時一些攻擊他人門第家族的諧趣便接踵出現，犯諱、調侃對法的名字姓氏都是慣用的手法，不敬之意往往惹得對方很不高興，然後進行反擊：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 〈言語篇〉28 條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言語篇〉84 條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名播海內，甯有不知？鬼子敢爾！」 〈方正篇〉18 條

魏遣李道固來，使張融接對。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¹⁴⁸

虞寄字次安，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¹⁴⁹

西晉·崔豹對陳姓都郡將與陸機對盧志的反擊十分相似。崔杼（?-前 546）是春秋時代弑殺齊君的大夫，陳姓都郡將問崔豹「君去崔杼幾世」，已經假設崔杼是崔豹先祖。崔豹如果與陳姓都郡將交情深，如此冒進的玩笑固可博君一粲，崔杼回嘴「如明府之去陳恆」，以陳恆也是弑殺齊君的大夫，便可收穫同樣的滑稽效果。但是從崔杼自稱「民」，而稱對方官階來看，兩人相當陌生。如此一來，陳

¹⁴⁸ 同註 123，〈捷對篇〉，頁 239。

¹⁴⁹ 同註 123，〈捷對篇〉，頁 252。

姓都郡將的提問就有辱崔杼及其祖上，是十分無禮的。孫綽（314-371）與高柔（?-?）兩人是鄰居的關係，交情比崔豹與陳姓都郡將大概來得較為親近，但是相互犯諱，也順便暗指對方祖上一無是處，也隱含較勁的意味，不怎麼友善。陸機與盧志亦是如此，前述已詳論陸機當時北上求官的窘境（參見第二章第三節），茲不贅述。李道固（?-?）是北魏的使者，張融代表南齊與他接洽，兩人在工作的場合會面，理應正式而有節度。然而，李道固劈頭就直呼張融的名字，已經十分無禮。更甚的是直呼張融父親張暢（408-457）的大名，這更是大大的不敬。張融深深被冒犯，於是嘆道父親名聲遠揚於夷國真是家門不幸，暗諷對方是野蠻人「夷」。有客人造訪虞寄（510-579）的父親，趁機以諧音捉弄虞寄姓「虞」，必定「愚」也。客人雖嘲笑虞寄愚笨，實際上用虞姓做文章，也等同嘲笑虞家。於是虞寄回嘴搶白客人「文字不辨」，才是愚笨的人。以上諸例顯示犯諱以及用對方祖上或姓氏為諧趣題材一般多含有刺激對方的意圖，就算要好如鍾會、晉文帝、陳騫、陳泰四人，他們相互犯諱調侃對方時，都不免有較勁的意味（參見第二章第三節），何況是不敬之意溢於言表的譏刺。

陸機陸雲兩兄弟以南方名門的身份入洛求功名，盧志故意犯陸氏兄弟父祖之諱，導致陸機反彈（〈方正篇〉18條），其中不乏南北人敵對的情結。這種情結有複雜的地緣政治因素，簡而言之，西晉渡江以前，以北人為尊，因為吳國被納入中原版圖，所以南人處於相對弱勢；渡江以後，北人反而仰仗南土人力物力，因此南人對丟掉半壁江山的北人倍感不屑。時人壁壘分明，諧趣往往多所反映：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言語篇〉22條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

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排調篇〉10條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淘？」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排調篇〉13條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

「『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排調篇〉41條

西晉時代的蔡洪(??)跟陸機陸雲的處境相似，入洛之際遭到奚落，激起他維護南方的氣概，反譏北人是頑民後裔。〈排調篇〉10、13、41條都是南渡以後的事。南北人都有相互瞧不起對方的態度。陸玩(278-341)因北方奶酪小吃而吃壞肚子，遂寫信給王導說自己「幾為傖鬼」，雖是玩笑語，其南北意識也是涇渭分明；劉惔則對王導用吳人的詞彙「淘」不以為然，反映出他內心深層的意識形態；孫綽嘲笑習鑿齒(317-384)是「蠻荆」，習鑿齒也嘲笑孫綽是「獫狁」，這除了引用經典以示博學，也有濃厚的鄉土意識。南北人敵對的情結反映時人對身份的執著與堅持，侮辱故土即意味對個人的侮辱。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個人有強烈的身份認同，而構成個人身份認同者包括其外形與神采、家族門第及地域故土，於是這些均成為諧趣常見的素材。時人愛惜羽毛，於是對攻擊代表個人身份的事物極力捍衛，勾勒出時人對體面的態度，也給諧趣平添不少意味。

四、形成輿論的諧趣

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可以同時把攻擊他人及自娛的諧趣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個現象是精煉的輿論。這些評論通常會濃縮成一句話或一段順口溜，傳神地諷刺或取笑某人某事。這樣的輿論其實自古亦有，但多屬譏刺，不似本時代富有諧趣。

從這些輿論當中，也可深刻地體會到當說者跟付出顏面代價者隔開一段安全的距離，在心理餘裕充足的情況下——不必與付出顏面代價者直接衝突——輿論諧趣所迸發出來的生命力：

（羊）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¹⁵⁰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賞譽篇〉62 條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任誕篇〉28 條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任誕篇〉43 條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輕詆篇〉28 條

王瑩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¹⁵¹

王叡有內寵，其女將嫁，先入宮，太后親禦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¹⁵²

庾士文性苛刻，無所寬貸，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俱用法深刻，但長史

¹⁵⁰ 同註 28，卷 34，頁 1017。

¹⁵¹ 同註 123，〈規箴篇〉，頁 85。

¹⁵² 同註 123，〈規箴篇〉，頁 382。

(孫騰)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¹⁵³

前已論及羊祜為人爲官的風骨高潔，對從甥王衍也沒有包庇，王戎、王衍（256-311）兩人懷恨在心，一旦當政對羊祜沒有好話。時人皆深知箇中原因，故以反語諷刺「二王當國，羊公無德」，言語稍委婉，但輕蔑之意溢於言表。時人重才重機智，王述早年未能展露才氣，所以被時人論定為「癡」。周顛常年醉酒不管事，落得「三日僕射」的名聲。¹⁵⁴王述與周顛的評語雙雙皆是當時人倫品鑒畫龍點睛的產物。東晉的張湛（?-?）與袁山松（?-401）有奇特的癖好。劉注引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鴿鷓」，¹⁵⁵張湛於齋舍前種了許多松柏，也養了許多八哥，大樹林立，空氣中只有八哥啞啞作聲，氣氛想必蕭瑟孤冷；裴啟進而曰：「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¹⁵⁶也是不甚吉利的偏好，出遊宛若出殯，十分晦氣。於是時人把兩人作聯想，譏笑他們一個「屋下陳屍」，一個「道上行殯」。魏晉南北朝時代喜俊美的外形，〈容止篇〉7條曾記載潘安姿容好神情，婦人趨之若鶩；左思東施效顰，則引來婦人吐口水，不得不倉皇而逃。東晉韓康伯的外形肥碩，也是遭到時人嫌棄。〈品藻篇〉66條：「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范啟索性說韓康伯長得像「肉鴨」，¹⁵⁷皆嘲笑韓康伯毫無風采。南朝梁王瑩（?-?）位至左光祿大夫，¹⁵⁸開府的規格比擬三公，本來欲往南拓展，

¹⁵³ 同註 123，〈嘲詆篇〉，頁 465。


¹⁵⁴ 余注引馬國翰《語林》輯本注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案劉（孝標）引當與《御覽》同。後人以《世說》有三人不醒語，遂改兩醒字。止訛為正，三訛為二耳」。同註 29，頁 875。

¹⁵⁵ 同註 29，頁 890。

¹⁵⁶ 同註 29，頁 890。

¹⁵⁷ 同註 29，頁 994。

¹⁵⁸ 同註 133，卷 23，頁 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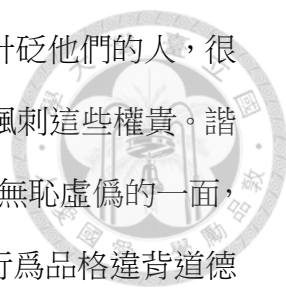


南鄰朱侃(??)深怕土地被侵佔，便花錢消災。王瑩依仗公權力不勞而獲，得了朱侃百萬錢，便把府邸轉往東拓展。公權力為私人方便服務，威儀掃地，時人因而譏王貪財：「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王叡(434-481)的事蹟收錄在《魏書·恩倖傳》，王叡為魏孝文帝(467-499)時期，文明太后(441-490)的寵臣。王叡排場浩大，與太后私通之事毫不遮掩，人盡皆知。因此王叡嫁女，女兒先入宮見太后，惹人竊竊私語：「天子、太后嫁女。」孫騰(481-548)、隋·庫士文(??)、韋焜(??)及趙達(??)皆名聲狼藉的權貴及官吏。據《北史·孫騰傳》，孫騰早年「質直，明解吏事」¹⁵⁹，後來依附高歡(496-547)，得到高歡信任以後，「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餽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諂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¹⁶⁰時人謂其「有惠政」，乃反語，指孫騰僅眷顧投其所好的小人，至少比起庫士文、韋焜、趙達這些酷吏來得好。庫士文為人雖說鐵面無私，實則刻薄寡恩。庫士文嘗因兒子吃了官廚的餅，把兒子「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對自己的兒子如此，對外人更是無情。庫士文出任貝州刺史，查辦姦吏，小至「尺布斗粟之贓」也不放過，以致逮捕千人，全數發配到嶺南戍邊做苦役，「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發配到嶺南的人十之八九皆死於當地瘴厲。這些人的父母妻兒痛哭求情，庫士文居然也把這些人逮捕，施以鞭刑，幾近喪心病狂，語在《北齊書·庫士文傳》，無怪時人贈其「羅殺政」之譽。

上述諸個輿論的例子之間是有區別的。時人對王述、周顛、張湛、袁山松與韓康伯的評論屬於調侃的性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無非是博君一粲，順便自娛自樂。然而，對王戎、王衍、王瑩、王叡、文明太后、孫騰、庫士文、韋焜與趙達的褒貶則不折不扣出自道德公心，其揶揄的成分其實來自對人物的不滿及蔑視。

¹⁵⁹ 同註 87，卷 54，頁 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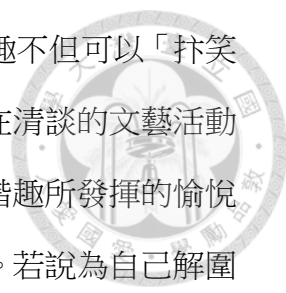
¹⁶⁰ 同註 87，卷 54，頁 1944。



這些人物多為達官顯要，權力次一點的，也是州官縣令。反觀針砭他們的人，很可能是一群無法撼動這些權貴的人，於是他們只能訴諸諧趣，諷刺這些權貴。諧趣成爲批判權貴的武器，供他們發洩憤恨。諧趣可以揭發權貴最無恥虛僞的一面，畢竟諧趣是建立在不諧調的基礎上，所以很容易用以突顯權貴行爲品格違背道德規範的矛盾本質，尤其當權貴虛與委蛇如王戎、王衍、王瑩之輩，或者無惡不作卻享盡榮華富貴及權力如王叡、文明太后、孫騰、庾士文、韋焜與趙達之屬。以諧趣為骨幹的輿論實際上都反映了人人心目中的大實話，但是這些話卻無法以正氣凜然的方式訓斥，必須以諧趣進行，一來可以避開以卵擊石的後果，同時又可以把實話說出來，因爲諧趣的詼諧感及愉悅感可以緩衝批判的力道，成爲說者推脫的藉口——所言所論是玩笑而不是真相；二來說者能夠以諧趣的輕佻來怠慢權貴地位的分量，更能讓他們表達對權貴的蔑視，因爲所有人，包括付出顏面代價的權貴都知道，無論輿論內容是不是事實，他們都深刻體會到製造及助長這些輿論的人對他們深惡痛絕。如此一來，這些「小人物」就達到了對權貴的報復。儘管輿論大多數沒能直接撼動權貴的地位，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輿論還是發揮了一些影響，如庾士文發配千人至嶺南，鬧得民怨沸騰，隋文帝以爲「士文暴過猛獸」，於是免了他的官以暫時平息民怨，雖然不久後還是重新啓用他出任雍州長史。¹⁶¹政治的荒謬豈是研讀歷史的讀者才能發現？時人深受其害，早已道出其可笑可悲之處。

誠如〈諧讖篇〉所言，魏晉南北朝時代充斥著「憑宴會而發嘲調」，以自娛娛人為目的的諧趣。此外，以揭人之短來達到攻擊他人之目的的「魏晉滑稽，盛相驅扇」，也獲得時人的追捧。可是此期的諧趣精神是否皆屬「無所匡正，而詆嫚嫖弄」，「曾是莠言，有虧德音」的「溺者之妄笑」與「胥靡之狂歌」？這倒也不盡然。時人欣賞各式各樣的人格特質，尤其是捷對的才華，諧趣於是成爲展現

¹⁶¹ 〔唐〕魏徵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隋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2月），頁1693。



這些特質的媒介，童言童趣獲得推崇也是此種風氣的產物。諧趣不但可以「拊笑衽席」聯絡感情，也可以緩和尷尬的氣氛，開脫個人的窘境。在清談的文藝活動中，諧趣也是慣用的談論手法之一，尤其在臧否人物的時候，諧趣所發揮的愉悅感可以緩和緊張的氛圍，從而可見諧趣在諸多社交場合的用處。若說為自己解圍是「防守」式的功能，那麼諧趣另有一主動「出擊」的面向。這類諧趣通常以冷嘲熱諷的形式出現，以揭露某人某事的醜態或失態言行、習性，藉此使得被嘲諷的對象丟臉。自娛娛人與攻擊他人的諧趣往往分界難斷，因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解讀就出現分歧。另外，說者也可能帶著一個以上的目的嬉笑怒罵，以致調侃、譏刺難分。當時有一現象把這兩種類型的諧趣高度融合，即濃縮成一句話或一段順口溜的輿論。有些輿論固然是為了自娛娛人而進行調侃，但是也有許多輿論出於公心及道德規範，去批判不公且荒謬可笑的現象。這類的輿論便不見得是「有虧德音」的妄笑與狂歌了。

第二節 以諧趣濟世助人

從關懷大我出發的諧趣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相當少見，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再無史家能夠如太史公一般，撰寫〈滑稽列傳〉一般的史傳，因此要完整地看到相同類型的滑稽人物以關懷大我的諧趣完成諷諫，難度大大提升。這個時期沒有〈滑稽列傳〉一般的史傳，終歸因為儒家式微，道家興盛，名士的忠誠不再投注在君王之上，而是個人的家族門第；而且時人重視人倫品鑒，以揮灑獨立人格特質為高；於是如〈滑稽列傳〉一般諷諫人君的舉動便大幅減少。因此，此期關懷大我的諧趣所諷諫的對象不限於人君，而涵括所有說者以諧趣勸誡他人的諧趣。儘管少見，但是關懷大我的諧趣並沒有絕迹。本節將先探析此類諧趣在此期的發展，然後分析此類諧趣的典範人物。



一、傳統諧趣在當代的轉化

儘管許多輿論出自時人的公心，但是這類諧趣仍不屬於如〈滑稽列傳〉諸君策略性運用諧趣，以達到一個大我無私的目標之行徑，因為畢竟輿論是用於揭露時弊，而且沒有提供解決的方案，所以其性質較傾向於訕笑與攻擊他人的諧趣。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大我無私的諧趣較為罕見，但是並非絕迹，只可惜〈滑稽列傳〉成爲古今正史之絕唱，若透過如《世說新語》般的語錄去認識時人的諧趣風尚，則僅能觀察到某人之諧趣特質或某事之詼諧。

東晉·羅友雖未有傳記，卻是少數在《世說新語》語錄式的記載中，甚能自如揮灑諧趣的人物之一。《世說新語》記載他特立獨行的言語及舉止：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標。

羅友本身的資質應該相當不錯，他的記憶力驚人，雖然行爲有所乖違，卻並不會爲了討好權貴而怠慢地位比他低的屬下，決然爲一個正派的人。羅友嘗有以諧趣激勵桓溫的故事記載於劉注：

《晉陽秋》曰：「(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

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162

或許向桓溫毛遂自薦，會蒙上自利的嫌疑，但是以羅友當官以後表現優異來看，他不避諱地向權臣自我舉薦，尋求貢獻才幹的機會，是可以諒解的行徑。再者，羅友編造與鬼的對話是不折不扣的鬼扯，退則十分符合他平素天馬行空的作風，讓人容易哈哈一笑，不與他計較；進則可抒發一直未得官職的不滿，然後委婉地向桓溫求官。羅友的行爲模式與〈滑稽列傳〉的淳于髡、優孟及優旃都十分相似。

儘管少見，《世說新語》也載錄了一個時人發揮大我關懷而發為諧趣的事件——勸阻晉武帝立晉惠帝為太子：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方正篇〉9條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

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規箴篇〉7條

這場諷諫晉武帝改立齊王攸的諧趣皆以失敗告終。和嶠（?-292）在晉武帝要求

¹⁶² 同註 29，頁 886。

下，前往探視時為太子的晉惠帝司馬衷。晉武帝滿心期盼和嶠將附和太子有所長進的見解，殊不知和嶠反其道而行，創造一個不協調之處。他十分禮貌卻直截了當地澆熄晉武帝希望——太子一如往常地愚笨。衛瓘（220-291）借酒意跑到晉武帝跟前，撫摸著晉武帝的床榻說可惜了這個席位，以突兀的行為，影射帝位若落在太子手中將成浪費。晉武帝知道衛瓘所指為何，卻不願接話，裝傻敷衍地回問衛瓘是否喝醉了。由此來看，諷諫失敗主要歸咎於晉武帝根本就想貫徹家天下的做法，沒有傳賢的意願。劉注又引了《晉陽秋》一段有關齊王攸憂憤而薨以後，晉武帝當時表現的記載：

（晉武帝）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勛、統間已，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嘔血薨。帝哭之慟。馮統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¹⁶³

馮統（?-286）的話道出一個關鍵，即齊王攸活著就會造成晉武帝立儲的兩難。晉武帝被馮統點破以後，哭聲嘎然而止，因為對他而言，齊王攸薨逝的時機對晉武帝是有利的。另一則記載則發生在衛瓘惋惜帝座以後：

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¹⁶⁴

要確認一個人有能力，或需要觀察較長的時間，然而要確認一個人是否不學無術則不必如此，因為愚笨之人經不起考驗。晉武帝已經知道兒子學業不好，若真要測試兒子的能力，為什麼選擇容易作弊的筆試？晉武帝是真心要檢視兒子的能力，抑或這只不過是一項面子工程，演給和嶠、衛瓘等人看的，藉此為立兒子為儲君

¹⁶³ 同註 29，頁 616。

¹⁶⁴ 同註 29，頁 656。

賦予正當性？和嶠、衛瓘的諧趣都沒有成功，他們沒有說動晉武帝，衛瓘甚至招惹了賈妃的外戚勢力，埋下禍端。¹⁶⁵然而，和、衛二人確實順著當下的情境，透過營造不協調，爲了天下福祉，舉重若輕且滑稽地諷諫晉武帝，這是不爭的事實。

若論有意義的諧趣，其他還有見風使舵，運用此類諧趣來拯救他人：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規箴篇〉19條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麀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規箴篇〉25條

（齊文宣帝）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斨其腹槁。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¹⁶⁶

趙郡王睿與庫狄顯安侍坐，（齊孝昭）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¹⁶⁷

¹⁶⁵ 《晉陽秋》：「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同註 29，頁 656。

¹⁶⁶ 同註 87，卷 7，頁 261。

¹⁶⁷ 同註 87，卷 7，頁 272。

桓溫很賞識羅含（292-372），三番幾次地提拔他，桓溫曾在同僚宴飲問眾人對羅含的看法，有人以為羅含是「荊楚之材」，桓溫也認為羅含「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¹⁶⁸羅含與謝尚（308-357）交好，桓溫命他去查核謝尚為官有無過失，羅含套用桓溫自己對謝尚的評價，成功化解對謝尚的調查。桓玄喜歡捆綁犯錯的人，桓道恭（?-?) 帶著紅色綿繩，假托自己恐怕受不了麻繩上粗糙的芒刺，所以自備綿繩，實際上卻是為了批評桓玄動輒問罪的粗暴行為。桓道恭特意選紅色綿繩，大抵也是為了引起桓玄的注意，進而詢問他，使他可以趁機進諫。齊文宣帝高洋（529-559）為人暴戾兼愛酗酒，剛登基時還相當勤政，後來自矜功業，於是放縱酒色，《北史》對其惡行惡狀有較詳盡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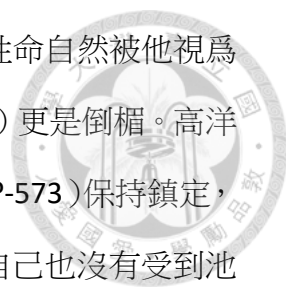
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慚恨，……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

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

……所幸薛嬪，其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枱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為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¹⁶⁹

¹⁶⁸ 同註 28，卷 92，頁 2403。

¹⁶⁹ 同註 87，卷 7，頁 260-262。



齊文宣帝不但有暴力傾向，而且喜怒無常，十分癡狂，他人的性命自然被他視為糞土，連自己的性命他也不愛惜，作為其宰輔的楊愔（511-560）更是倒楣。高洋用刀子劃破楊愔肚子的時候，楊愔已經岌岌可危，幸好崔季舒（?-573）保持鎮定，借著一句玩笑話，順勢把刀子奪去，不但挽救了楊愔的性命，自己也沒有受到池魚之殃。而齊孝昭帝高演（535-561）雖然對勸諫的接受度較高，但是他主動邀請趙郡王高睿（536-571）以及庫狄顯安（?-?) 直言我之不逮，之後會不會懷恨在心，卻也難說，畢竟齊孝昭帝也有不良記錄，其皇位即從他侄子齊廢帝高殷（545-561）手中奪過來的，如今齊孝昭帝要兩人「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不免讓人有所疑慮。不過庫狄顯安卻語出驚人，批評齊孝昭帝「陛下多妄言。」齊孝昭帝自然不解，追問之下，庫狄顯安指出齊孝昭帝過去對齊文宣帝抽打他人的行徑不以為然，如今卻自相矛盾，犯了同樣的毛病。庫狄顯安自然是避重就輕，諷諫齊孝昭帝當個明君，而這個諧趣也受到齊孝昭帝賞識。羅含、桓道恭、崔季舒、庫狄顯安能夠善用諧趣挽救他人與自己的性命的行為，可說是在薄冰上起舞，不得不令人欽佩。

要之，大我無私的諧趣隨著儒家思想式微變得相當少見。儘管此一時代沒有像〈滑稽列傳〉一般的史傳序陳諷諫人君的輔佐之臣，從史籍條目式的記載，發揮關懷大我諧趣的人仍然展現出過人的膽識與機智，〈滑稽列傳〉的傳統依然繼續有人。

二、人物典範——謝安

要發揮關懷大我的諧趣，說者必須要有捨己為人的胸襟，以及堅定和易的識見態度。鑑定這類諧趣的成敗與否往往與個人意志有莫大的關聯，因此要檢視這類諧趣，便有必要觀摩人物的特質。若論關懷大我、愛國愛人，而又常能出之以諧趣，謝安可謂一典範人物。

《晉書·謝安傳》言謝安有「東山之志」，可是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入仕的宿

命：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排調篇〉27 條

謝安的個性中有十分風趣的一面，無論是調侃他人，抑或被當成揶揄的對象，謝安皆保持一貫的風度，因應自如：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德行篇〉36 條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公大笑樂。

〈言語篇〉71 條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文學篇〉39 條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

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規箴篇〉21 條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排調篇〉26 條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

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通乃不惡，¹⁷⁰亦極有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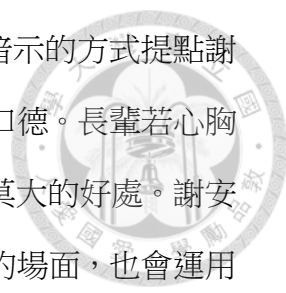
〈排調篇〉32條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紕漏篇〉5條

《世說新語》載錄了好幾條有關謝安教育後輩或與後輩相處的語錄，均如春風化雨，氣氛愉悅，這與謝安風趣的個性不無關係。謝安的夫人，劉夫人(??)問謝安何不教導兒女，是問他為什麼不督促兒女的課業，花時間傳授知識，可是謝安卻取了個巧，說自己以身教教育後輩。乍聽之下謝安似乎想對夫人的質問蒙混過去，可是仔細一想，傳授知識無非是為了教育下一代，而最好的教育莫過於身教，謝安的教育是捉大放小的做法，因此他往往不流於繁瑣的叨念或囑咐。即便謝萬吃敗仗要退兵，還計較用玉帖鐙裝飾，如此荒唐的舉措，謝安忍無可忍之下，亦僅曰：「當今豈須煩此？」事實上，謝安與後輩的相處一向愉快，謝安能夠發掘情境中的矛盾或不協調，然後選擇以輕鬆愉悅的心態面對，甚至欣賞不快、怨憤等負面情緒的荒唐之處。這也反映謝安獨特的人格以及心胸之寬闊。謝安問諸後輩「白雪紛紛何所似」，謝朗(323-361)作了一個俗不可耐，而且毫無邏輯可言的比喻「撒鹽空中」——難道地上花花白雪有如白飯，配上鹽巴剛剛好？謝朗的聯想確實令人啼笑皆非。反觀謝道韞(??)一介女流的境界來得更典雅，「未若柳絮因風起」體現萬物在四季轉變中的美感，兩人的高下立刻分曉。男不如女，雅大勝俗，謝安因此開懷大笑。謝朗還出過一次糗，他不知道父親謝據(318-351)曾在屋上熏老鼠，到處跟人說這件事，譏笑這個熏老鼠的人是個笨蛋。謝安知道

¹⁷⁰ 原文「通」作「過」。余注以《太平御覽》、《渚宮舊事》均作「通」(同註 29, 頁 945), 據改之。



以後，就假托大家都誤會謝朗的父親與他都熏過老鼠。謝安以暗示的方式提點謝朗休提此事，不但給謝朗留下顏面，同時教育了謝朗要謙卑有口德。長輩若心胸寬大，不拘小節，家族的氣氛必定融洽，對後輩的教育也會有莫大的好處。謝安不但對後輩施與寬容，對自己受到的揶揄也極有風度，在尷尬的場面，也會運用諧趣化解。謝安有東山之志是時人皆知的事，許多人都曾試圖招攬他，謝安最終也出山當了官。隱居的時候，名聲自然高雅，但是一旦出山，就瞬間從天上掉入凡塵，高崧（?-366）、郝隆（?-?）便是抓住這點揶揄謝安。謝安雖「笑而不答」、「甚有愧色」，不過玩笑就是玩笑，謝安還是相當泰然，未有記恨。這幾個情境皆屬平和的場合，那麼王夫人（?-?）打斷清談場合，則是不折不扣的衝突。當時座上有支道林、謝安及謝朗。謝朗剛病愈，身子尚虛弱，與支道林請談實則不堪重負。謝朗的母親王夫人很是擔心，遣人中止清談，可是謝安卻不肯，於是王夫人忍無可忍，衝出來打斷談論。王夫人因為兒子謝朗生病初愈，不忍他因清談而操勞過度，所以情急之下堅定地打斷清談。她打斷清談的說辭卻讓人十分錯愕，因為她打出悲情牌，把自己的可憐之處毫不修飾的展現人前——她守寡，一生的指望惟有兒子謝朗，言下之意指斥謝安、支道林等不體諒人，讓座上賓相當難堪，說完以後她哭著把謝朗帶走。在座的人實則未有意欺凌謝朗與王夫人，可能只是清談未盡興，所以不想中斷。可是王夫人這麼一鬧，顯得有些不分青紅皂白。謝安與賓客若要分辨他們沒有欺負謝朗的意圖也很困難，一來王夫人在氣頭上，二來當時謝朗確實身體有些不適，一再讓他持續清談，確實在不知不覺間有些強人所難，所以也有理虧之處。可是不分辨，賓客等人卻也被王夫人冤枉了。當時的情況想必非常尷尬，可是謝安卻以諧趣扭轉乾坤。他把王夫人強硬的舉止美化成「辭情忼慨」，十分精彩，值得稱道。同時他又把賓客受到的委屈大事化小，甚至化成一場大家眾樂樂觀看的表演，值得推薦給大家。換言之，謝安把眾人被冤枉的尷尬角色，重新定位為剛看過一場表演的觀眾。經過消毒脫敏，謝安成功為王夫人開脫，同時也化解在場賓客的尷尬。從諸例來看，謝安有兩個特質，一個是他樂於因材施教，或借助當下的情境傳達正確的義理，如欣然問後輩「白雪紛

紛何所似」，以及反詰謝萬「當今豈須煩此」；另一個是他面對尷尬及衝突的場面，都會風度翩翩地應對，適時運用諧趣化解。謝安這兩個特質都是發揮大我諧趣極佳的助力，因為教育對方正是大我諧趣的終極目標，而其風度以及運用諧趣的手段足以確保訊息以及個人的善意精準地傳達給對方，並且不會傷害到對方的面子，所以更能讓對方接受。

謝安的政治立場一直都是忠於晉朝的。他早年出任官職都為時不長，等到謝萬被罷黜，他決定出仕之際，人已四十餘歲，到桓溫麾下當司馬，備受桓溫器重。雖然如此，謝安並沒有把自己的忠誠投注在桓溫身上，而且三番幾次在關鍵時刻，挫敗桓溫，又能夠避免桓溫徹底撕破臉，以武力篡奪導致情勢失控；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於他的人格魅力與詼諧特質。謝安雖然未忠於桓溫，然而情勢上由於桓溫大權在握，他也不宜與桓溫決裂，因此謝安往往盡可能地試圖勸諫疏導桓溫，他操作的諧趣也都屬於暗示性的為多：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排調篇〉38 條

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¹⁷¹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雅量篇〉27 條

¹⁷¹ 同註 28，卷 79，頁 2073。

桓溫篡晉的心思昭然若揭，郗超投其所好，慫恿桓溫廢司馬奕（342-386）為海西公，以「鎮壓四海，震服宇內。」¹⁷²桓溫於是立司馬昱（321-372）為君，即簡文帝。謝安此時為侍中，侍奉皇帝左右，見到桓溫卻行跪拜之禮。桓溫既吃驚又好笑，因為謝安的舉動自然十分古怪，誰不知道桓溫不是皇帝？可是謝安卻回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現在的君臣之分有點搞不清楚！謝安的風格與淳于髡、優孟、優旃很相似，跪拜之舉不但讓對方始料未及，而且十分震驚。他委婉地點出桓溫排場盛大，乃僭越之舉止，¹⁷³進而暗示其不軌之心。但是他沒有直接諷諫桓溫不該如此，而是讓桓溫在阻止他跪拜的過程中，得出自己是臣子的身份，不應接受跪拜的結論。簡文帝駕崩之後，又是桓溫誅除異己，借勢篡位的時刻，因此情勢十分兇險。《世說新語》劉注引《晉安帝紀》：「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於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¹⁷⁴謝安當時確實有性命之虞，可是他異常冷靜，並且竭力展露風流姿態，而要做到這點，最好的方式便是透過諧趣。謝安既知桓溫已安排人待命誅殺他與王坦之，卻表現得不以為意，風度翩翩地調侃桓溫未能如古代稱職的諸侯一般守衛四方疆界，反而「壁後置人」，做一些雞鳴狗盜的事。桓溫也被逗樂，殺機也被謝安消磨殆盡，王、謝遂轉危為安。謝安不但保全自己，也保全其他朝臣。王、謝二人被桓溫喚到帳中，把前一晚擬定要誅除的朝臣名單丟給兩人看。王坦之把名單丟回去，說了一聲「多！」口氣自然不會太好，而且把名單丟來丟去，雙方的僵持只會進一步升級。此時，謝安見郗超偷偷在帷帳後面與桓溫共商計要如何修改名單，遂順勢調侃郗超是桓溫的入幕之賓，揶揄郗超向桓溫吹枕頭風。這三次諧趣，尤其是最後

¹⁷² 同註 28，卷 67，頁 1804。

¹⁷³ 《晉書·謝安傳》曰：「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同註 28，卷 98，頁 2577。

¹⁷⁴ 同註 29，頁 437。

兩次，謝安都冒著極大的風險諷諫桓溫。

從謝安與桓溫三次交手當中，很難說謝安的諧趣猶如〈滑稽列傳〉的人物一般成功，畢竟謝安未能讓桓溫改弦易轍，打消篡晉的念頭。然而，他不但保全了自己，也盡力保全了晉室免於桓溫的摧殘。桓溫病重之際，才催促朝廷給自己加九錫，當時謝安、王坦之得知他病重，所以故意拖延。桓溫至死都沒有當上皇帝。其次，謝安對桓溫到底有多大的善意？在〈滑稽列傳〉式的諧趣中，說者需帶有善意及關懷大我的意圖，提供諷諫對象作出改善的措施。雖然謝安可能經過形勢判斷，以為扳倒桓溫弊大於利，但是以謝安誨人不倦的個性，他很可能希望引導桓溫終不為逆臣，他的跪拜之舉、反詰桓溫是國之諸侯，何必「壁後置人」、調侃郗超吹枕頭風，都屬於婉轉地提醒桓溫是晉朝之臣，盡力把桓溫的危害降到最低。謝安保全了晉室，豈不是也保全了桓溫免於晉室勢力的反撲，也避免他晚節不保？最後，要檢驗謝安諧趣成果，不得不思考桓溫沒有誅殺謝安的原因。簡文帝駕崩以後，桓溫在新亭布下兵力，要掃除一切他登基的阻力，已經箭在弦上，而且桓溫也認定王、謝二人是他的阻力，難道堂堂一個叱吒沙場的大將軍，僅僅因為謝安的從容與風度而沒有動手？桓溫沒有誅殺謝安很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當時有「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排調篇〉26條）的說法，可見謝安的聲望之高。《晉書·桓溫傳》記載一段桓溫病篤之際，與桓沖的對話：

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¹⁷⁵

這段對話也佐證殺害謝安只會衝擊桓氏的聲譽。其次，桓溫似乎希望一個較和平的政權轉移：

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覩非望，或臥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

¹⁷⁵ 同註 28，卷 98，頁 2580。

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¹⁷⁶

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¹⁷⁷

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¹⁷⁸

或許時人皆知桓溫的司馬昭之心，但他還是寄望名垂青史，「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即表示在他的心目中，「流芳後世」是第一順位的，如果做不到，可以「遺臭萬載」也好。然而桓溫倒也未必真的想放手一搏，不惜「遺臭萬載」，否則他為什麼要先「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他為什麼期盼「簡文臨終禪位於己」？王、謝二人掌事的時期，他為什麼「憤憤少懷」，而不直接剷除王、謝二人，在新亭的時候，要與謝安「笑語移日」？說到底，桓溫仍然想要「流芳後世」，希望贏得當代與後世的尊敬，而不是真的要「遺臭萬載」。桓溫一生都在「流芳後世」與「遺臭萬載」之間搖擺，在留下萬世芳名以及實現野心之間天人交戰。桓溫追求「流芳後世」的原因或與他的出身有關。他出身武將，卻渴望融入名士之流：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品藻篇〉37 條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

「使君如馨地，甯可鬥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方正篇〉44 條

¹⁷⁶ 同註 28，卷 98，頁 2576。

¹⁷⁷ 同註 28，卷 98，頁 2577。

¹⁷⁸ 同註 28，卷 98，頁 2579。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

〈方正篇〉54 條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品藻篇〉35 條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排調篇〉24 條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翼如生母狗馨。」

〈文學篇〉22 條

桓溫與當時的名士劉惔、王濛交往甚密，劉惔似乎也視桓溫為我輩之流，即第一流的名士。然而桓溫是否真的與劉、王平起平坐則不必然。劉惔經常對桓溫武將的身份嗤之以鼻，桓溫雖然對此十分不滿，就算他自認帶領軍隊才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劉、王得以瀟灑清談皆拜他所賜，他也不曾疏遠劉惔、王濛等名士，反而經常加入他們清談。桓溫的確嚮往名士之流，與殷浩競爭之心即顯示他欲成為第一流名士的企圖心。王導主持的清談聚會結束以後，桓溫雖自謙「時復造心」，但實際上他把自己與殷浩、王導、謝尚歸為一類高明的名士，王濛及王述則是不入流的清談家。他的自謙以及對王濛、王述的鄙視在在顯露他對自己清談的造詣洋洋得意，對名士的身份沾沾自喜。如此一來，桓溫自然十分賞識，甚至傾慕謝安。謝安是清談的常客，出任桓溫的司馬一職以前，《晉書·謝安傳》記載謝安

當時閑居的狀況：「(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¹⁷⁹他們當時不僅僅遊樂山水，也會聚一堂清談，謝安更是當時人人仰慕的清談高手：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文學篇〉55 條

謝安有才，風格秀逸，是個翩翩佳公子。不但如此，謝安膽識過人，遇事從容鎮定，喜怒不形於色，往往胸有成竹：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雅量篇〉28 條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郝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

〈雅量篇〉30 條

桓溫對名士本就趨之若鶩，對謝安這位人人想招攬的人才更是愛重有加：

(謝安)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

¹⁷⁹ 同註 28，卷 79，頁 2072。

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¹⁸⁰

成功招攬謝安出任他的司馬以後，桓溫十分得意。郝隆影射謝安「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排調篇〉32條)，桓溫看著深懷愧色的謝安，含笑道：「郝參軍此通乃不惡，亦極有會」。他帶著隔岸觀火的心態，饒有興致地看謝安如何處理從隱士的神壇下來的尷尬。桓溫如此賞識謝安，與謝安為人詼諧風趣有關，因為這項特質讓桓溫為之心折。謝安不但沒有與桓溫交惡，而且在政治上，儘管後來與桓溫變成對手，謝安亦善用大我無私的諧趣，向桓溫傳達善意。因此桓溫並不見得討厭謝安，反而始終對謝安十分讚賞，所以在新亭，儘管桓溫已經布下重兵，準備大開殺戒，謝安打趣桓溫舉止鬼祟，這番笑語剛好呼應桓溫對名士風流的鍾情，桓溫的殺機隨即也消磨殆盡，遂與謝安「笑語移日」。因此，若從防止桓溫失控以及自全的意義上來說，謝安的諧趣是徹底成功的。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我無私的諧趣為數確實較自娛娛人及諷刺他人的諧趣來得少，然而〈滑稽列傳〉的傳統並非全然斷絕，和嶠、衛瓘諷諫晉武帝即為表率，用以挽救他人性命的例子亦有之，謝安更是其中的典範人物。

第三節 以諧趣安頓自我

魏晉南北朝不乏行徑任誕之徒，但是他們的任誕往往為了自娛娛人、諷刺他人、追隨潮流等理由，以自存為目的則十分罕見，畢竟這是一個極端的做法。關懷大我的諧趣以及安頓自我的諧趣有一些相似之處，它們都需要說者放棄某些東西。要發揮關懷大我的諧趣，說者必須冒險，一定程度地放棄個人的利益，例如人身安全；要發揮以任誕求自存的諧趣，說者必須做一些違背自己意志的事情，例如阮籍要軟性拒絕司馬昭的聯姻，不得不一連醉了六十天便是。因此，要檢視追求自我安頓的諧趣，同樣有必要觀摩人物的特質。此期以任誕求自存的人物當

¹⁸⁰ 同註 28，卷 79，頁 2072。

數劉伶及阮籍，陶淵明是繼兩位竹林名士以後，另一位以率任不羈求自存的人物。陶淵明也有關懷大我的情操，但是他的諧趣卻呈現另一種旨趣。



一、以任誕求存的轉化

阮籍與劉伶處在一個政治混沌不明的時代，由於權臣對帝位虎視眈眈，造成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得不站隊，選擇錯誤固然一敗塗地，要置身事外如阮、劉者也必須經過權臣領首。然而要如何得到允許則不得不取決於個人的智慧，於是阮籍與劉伶均選擇以任誕的行事作風來削弱他人的覬覦。

阮籍與劉伶固然都有相同的選擇，然而兩人付諸於行的風格還是有所不同。劉伶的任誕行事更為極緻，把內心的主張藏得更深。對恥笑他的人，他尖刻地反譏：「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幃為入我中」，但傳世的作品惟〈酒德頌〉，大放豪語「暮天席地，縱意所如」，但願快意人生。阮籍則未如劉伶般灑脫。他曾語出驚人，對晉文帝司馬昭道：「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又大醉六十天以推辭司馬昭的求親，以青白眼示人，因酒而求為步兵校尉，醉臥鄰家美婦之側（諸語均在《晉書·阮籍傳》）。然而阮籍實則欲濟世而不得，故「未嘗臧否人物」，希望遠離是非。儘管如此，阮籍傳世的詩文為數不少，其中以〈樂論〉為移風易俗的治平主張、以〈大人先生傳〉自述胸中之志，前者為國家制度而謀，後者以寄托逍遙自適，透露著阮籍欲暢所欲言又極力自我剋制的糾結情懷。二篇文章與平素的作風南轅北轍，其任誕不僅可以力抗世俗的虛偽文飾，也可力求消弭他人之覬覦，成全自己不同流合污的本心。若以阮、劉二人的作品數量來看，劉伶無疑更縱容自己任誕行事以藏志自全；阮籍的文章則顯示他對闡述個人治平與處事的哲學有較強的意願，諸般荒誕之舉不無偽裝本心的姿態。

以任誕求自存的風尚在阮、劉二人以後逐漸趨緩，其中緣故與時代的風潮有關。在竹林名士（主要為嵇、阮二人）引領風騷衝撞體制之下，魏末出現「名教」與「自然」之爭，歷經西晉的針鋒相對之後，於東晉時代，二者逐漸合而為一。

據張師蓓蓓考察，「名教」一詞乃嵇康所創，其用意是爲了反抗西晉政治集權以及做作的社會氛圍壓縮了人身自由，因而提倡道家的「自然」：

「名」實可泛指一切名物度數法則等等，舉凡名相、名色、名號、名目、名物、名數、名言、名分、名節、名行、名跡、名譽、名聲諸義都可包含在內。……嵇、阮棄儒歸道，造出「名教」一詞以菲薄世俗，……所謂「越名教而任自然」，其真義顯然應從道家「非名」的立場來做整體的認識才是。……嵇、阮反對的事實上應包括一切俗名俗譽、俗禮俗套、俗情俗見，甚至一切虛矯繁碎的名物制度。¹⁸¹

然而，到了東晉，「名教」一詞歷經樂廣（?-304）、王衍使用以後，其含義逐漸出現了轉變，而其中促成這個轉變最大的推手要數袁宏（328-376）：

袁宏在此用巧妙手法將「名」與「教」二字嵌入天地自然中而成爲天經地義。……「名教」就是以君臣父子的名分爲教，也就是順乎天理人情、義無可疑的人生大道。……袁宏賦予此詞的新義也合乎儒家學說的微旨。……儒家本即主張父子之親、尊卑之禮皆出於天性自然，非由外鑠。

182

「名教」一詞從西晉的貶義詞，泛指世俗繁文縟節的制度以及操縱榮辱的褒貶予奪，在東晉詞義轉移，而變成一褒義詞，成爲順性合道的處世態度，從此主張「自然」者不必反抗「名教」，因爲「名教」順乎人情義理，遵循「名教」即是自然的行爲反應。

竹林名士面對的是一個政權交替的年代，曹魏政權風雨飄搖，司馬氏虎視眈眈，知識分子也各自選擇擁護的對象。司馬氏奪得政權以後，開始清算擁護曹魏的知識分子，嵇康是最顯著的例子。前述〈與山巨源絕交書〉即已分析嵇康

¹⁸¹ 張師蓓蓓：〈「名教」探義〉，《中古學術論略》（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5月），頁24。

¹⁸² 同註181，頁30。

選擇運用諧趣攻擊山濤與司馬氏。阮籍以及劉伶要自存，自然不可忤逆司馬氏，可是他們並不盡然真心擁戴司馬氏。爲了維護本心與良知，他們選擇運用任誕作爲保護色，同時也希望因此消除世人對他們的覬覦。竹林名士與當權者種種交織催生了「名教」與「自然」的對立。這份對立的理論基礎經過袁宏等人的融合以後得到緩解。於是以任誕求自存的諧趣風格也變得沒那麼尖銳，後代的陶淵明已逐漸傳向運用諧趣來安頓自我矣。

二、人物典範——陶淵明

陶淵明生於東晉末，與嵇康、阮籍、劉伶的時代相距甚遠，約一百五十年。陶淵明的身上既出現竹林名士反抗制度的態度，也繼承「名教」與「自然」融合的精神。

從個人的傳記來看，陶淵明的行徑有竹林名士的遺風。陶淵明雖然沒有阮籍、劉伶來得激烈，但是魏末與東晉末的政治氛圍亦有相同之處。陶淵明處在東晉末，歷經晉室大權旁落，權臣劉裕（356-423）先把持朝政，繼而取而代之。或因陶淵明未有阮籍與劉伶那般盛名，所以不至於成爲主政者極力籠絡的對象，他也無需如二人般做出如此極端的行徑。即便如此，陶淵明還是面臨數次徵召、遊說，其中之一來自王弘（379-432）：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

「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

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¹⁸³

陶淵明的曾祖父是陶侃(259-334)，是東晉名臣，其外祖父是東晉名士孟嘉(??)。〈命子〉曰：「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陶淵明深以曾祖父陶侃的功勳為榮，尤其可貴的是陶侃能夠不恃寵生驕，不結交朋黨，戀棧權力。另外，陶淵明也為外祖父孟嘉撰寫〈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其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在陶淵明的筆下，其外祖父孟嘉亦是一位德行高尚的守節之士。反觀晉名門之後的王弘則投靠劉裕陣營，《南史·王弘傳》曰：

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¹⁸⁴

王弘所擁護的劉裕對晉室有不臣之心，而陶淵明祖上則為晉朝立下汗馬之功，陶淵明自然無法與王弘為伍。然而，王弘當時畢竟是一州之首，對陶淵明也十分禮遇，陶淵明基於人情或現實的考量，衝撞王弘，以致招怨於王弘，都是不智之舉。於是陶淵明要推辭王弘的招攬就必須運用智慧。惹不起但躲得起，陶淵明能避開與王弘會面就盡量避開，不能避開的時候，就隨遇而安，與王弘把酒言歡，也隨性自然，甚至有意無意放任自己做出誇張的行為，如伸出腳讓王弘的部下為自己度量尺寸造鞋，以及不以為意地坐著破舊的轎子，對他人豪華的軒駕視而不見，後來與王弘見面也安排在山林之間。陶淵明拿捏尺寸得當，既順了自己的心意，

¹⁸³ 同註 28，卷 94，頁 2462。

¹⁸⁴ 同註 133，卷 21，頁 569-570。

又不得罪王弘，只給王弘帶來不舒服感，陶淵明視地位階級如無物的不羈行徑也坐實他「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對王弘的抬舉不為所動也間接地告知王弘，他「非潔志慕聲」之人。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據齊師益壽的考察，有多達十一首是討論出處問題的詩篇，剩下的九首則是為了杜絕勸進而反復解釋自己出處選擇的詩篇。¹⁸⁵其中，第十四首形容酒客來訪的情景：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與來訪的客人交杯不久，陶淵明已喝醉，而且與訪客「雜亂言」，行為也「失行次」。可是陶淵明內心真正的價值觀，在座的訪客卻未必能知，陶淵明與他們除了杯中物以外，並不一定有其他交集。據齊師的考證，王弘、龐遵（?-?）、殷隱（?-?）、戴主簿（?-?）都是陶淵明遷居南村以後（義熙九年至元嘉四年，413-427）所結交的「新知」。¹⁸⁶從陶淵明書寫的詩篇中可看出他與各個「新知」交情的深淺。陶淵明寫給王弘的交遊詩是〈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遊雲倏無依。洲渚四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斂餘暉，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許多注本因最末二句「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引用《莊子·大宗師》「若人

¹⁸⁵ 請參考齊師益壽：〈陶淵明〈飲酒〉詩三問〉，《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4月），第三節。

¹⁸⁶ 請參考齊師益壽：〈從析疑賦詩到語默殊勢——試論陶淵明移居南村後的交遊與交遊詩〉，《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2月），第三節「移居南村後的交遊詩」，頁154-173。

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¹⁸⁷以為陶淵明可以灑脫地放下離別的悲切。¹⁸⁸可是與王弘離別是否真的給陶淵明帶來悲情，抑或「離言聿云悲」僅僅是交遊告別的套語？〈於王撫軍座送客〉有大篇幅的景語，感嘆時光的流逝，至於與王弘將面臨離別，陶淵明皆以虛筆來描寫他與王弘的互動。實際上，兩人走在「殊路」上，陶淵明終歸要「旋駕」，所以目送離去的王弘，陶淵明就「情隨萬化遺」，隨他去。反觀陶淵明寫與其他「新知」的詩篇都以實筆描述與他們的交往互動的過程：

〈與殷晉安別〉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大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遊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陶淵明與殷隱一見如故，兩人十分投機，彼此「信宿酬清話」，感情就越發升溫，所以當殷隱出任劉裕的參軍，¹⁸⁹與陶淵明「語默自殊勢」，陶淵明也深知兩人將漸行漸遠，而心有戚戚焉，感慨分離以後「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期盼未來

¹⁸⁷ 楊勇氏引自古直《陶靖節詩箋》，同註 100，頁 98。

¹⁸⁸ 楊勇氏引黃文煥《陶元亮詩析義》：「苦海不脫，只為情多，與化俱徂，則情隨之而遺落矣！鍾情語以遺情結，最工於鍾情。」同註 100，頁 98。

王叔岷按曰：「回舟愈遠，觀化愈多，情亦隨之而遷離也。陶公之深於情如此！」見王叔岷撰：

《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4月），頁 186。

袁行霈按曰：「蓋自淵明視之，萬物莫不處於變化之中，人之形骸亦復如是，故不必為離別而悲傷也。」見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頁 154。

¹⁸⁹ 見楊注，同註 100，頁 100。

殷隱「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若路過潯陽，可以去探訪他。另外，陶淵明也留下兩首跟龐遵往來的交遊詩：¹⁹⁰



〈答龐參軍〉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覲懷人。歡心孔洽，棟宇惟鄰。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答龐參軍〉

¹⁹⁰ 此二首〈答龐參軍〉備受爭議，有些注本主張「龐參軍」為陶淵明的「故人龐通之」，本文採用齊師益壽〈從析疑賦詩到語默殊勢——試論陶淵明移居南村後的交遊與交遊詩〉說法，以為〈答龐參軍〉所指的是龐遵，〈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的「龐參軍」才是龐通之，筆者認同齊師主張，〈答龐參軍〉的「龐參軍」是新交，不是「故人」（請參見〈從析疑賦詩到語默殊勢——試論陶淵明移居南村後的交遊與交遊詩〉第三節「移居南村後的交遊詩類型」之（三）「直抒本懷而質樸自然」，同註 186，頁 154-173）。後續之論述將在此前提下展開。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嘆，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唯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對於龐遵，陶淵明可是十分親厚，不但在序文仔細交代詩篇寫作的背景，而且亦以實筆描述兩人往來的互動與自己的心情——「嘉遊未斲，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陶淵明與龐遵同樣一見如故，兩人「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也同樣愛好杯中物，閑然歡飲，互贈詩歌，以作「相思之資」。五言詩末聯，陶淵明希望龐遵可以保重身體，以期來日再相會。何以對殷隱、龐遵二人，陶淵明沒有「情隨萬化遺」？再看陶淵明可是情感十分濃烈，寫詩敦促周續之「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對待王弘，陶淵明就「情隨萬化遺」，實在耐人尋味。大抵兩人離別以後，陶淵明就把王弘拋諸腦後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與殷晉安別〉以及兩首〈答龐參軍〉詩中，陶淵明都談及與兩人談笑風生，很明顯，陶淵明十分享受彼此詼諧的互動；在〈於王撫軍座送客〉，陶淵明於此隻字未提，這也很耐人尋味。因此，〈於王撫軍座送客〉的景語所營造的悲傷氣氛很可能是自我抒情或禮貌套語，兩人未見親厚，陶淵明所呈現的諧趣也並非其真心所致，而是為了自保而營造「性不狎世，因疾守閑」的形象才有意為之的結果。

到底陶淵明的率任不羈是他一貫的作風，還是有意為之的結果？《晉書·陶潛傳》曰：

(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



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¹⁹¹

時人以爲〈五柳先生傳〉的形容十分貼切，因此這篇自傳可視爲陶淵明真實的寫照。陶淵明自稱「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其個性看起來相當好。鄉里貴其「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知道他好酒，也樂於置酒招待他。在〈與子儼等疏〉中，陶淵明也自述親故對他伸出的援手：「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這顯示陶淵明的人緣不錯，不是個性古怪，難以相處的人。然而對待前來說服他出仕的訪客，陶淵明的行徑就有出格的現象，《宋書》亦有〈陶潛傳〉：

（陶）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¹⁹²

對於王弘送來的酒，陶淵明沒有抗拒，隨遇而安地接受便是。可是他心志堅定要貫徹以任誕行徑使前來與他培養感情的說客知難而退，所以諸如「我醉欲眠，卿可去」、把漉過酒的葛巾重新戴在頭上、伸出腳給讓王弘部下度量、毫無芥蒂地坐破轎去聚會的行徑就層出不窮。陶淵明寫過一首詩歌，表達他對這類訪客的觀感與態度：

¹⁹¹ 同註 28，卷 94，頁 100。

¹⁹² 〔唐〕房玄齡等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75 年 6 月），卷 93，頁 2288。

〈飲酒〉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¹⁹³「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縵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這段話大抵是遊說陶淵明用世的論述——出來當官就可飛黃騰達，不必挨窮；又勸陶淵明放棄節操，同流合污，反正天下烏鴉一般黑，何必爲了看不見摸不到的節操委屈自己？真正的說客自然不會毫不修飾就請求一位素有高尚情懷的隱士隨波逐流，隱士也不可能突然就應允；隱士應允的話，豈不是承認自己虛與委蛇，是個偽君子？這是鄉間老翁真心關切，所以才一大早過來見陶淵明，把狀況挑明的用詞。但是說客與鄉間老翁的意思終歸大同小異。陶淵明感激鄉間老翁的關切，同時也解釋自己「性不狎世」，不想違背自己的素志。陶淵明引用漁夫勸屈原「與世推移」的典故，露骨地把說客的說辭等同於勸他一同「汨泥揚波」，隱隱然也帶有諷刺說客的意味。陶淵明的回復也跟屈原一樣——「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¹⁹³當然陶淵明沒有屈原那麼激烈。他的舉止雖然有任誕的元素，但是沒有竹林名士般極端，做出驚世駭俗的行爲。

陶淵明與袁宏契合之處則呈現在其作品當中。袁宏重新定義「名教」為以君臣父子的名分為教，「名教」即人人自然而然所遵行的人情義理。陶淵明有許多作品都展現對祖上與同族的敬重，如前述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贈長沙公族祖〉；對從弟及妹妹的手足之情，如〈悲從弟仲德〉、〈祭從弟敬遠文〉、〈祭程氏妹文〉；對兒子慈愛，如前述的〈責子〉及〈命子〉、〈與子儼等疏〉。前已探討過陶淵明對曾祖父陶侃與外祖父孟嘉的自豪，將不贅述，茲另以〈與子

¹⁹³ 同註 37，頁 297。

儼等疏) 為例。這篇寫給五個兒子的家書寫在陶淵明以為自己將不久於世之際：

告儼、俟、份、佚、佟：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陶淵明寫給兒子的家書深情真切，他向他們解釋自己的人生選擇，同時也坦白因為自己的決定導致他們從小飽受貧困與飢寒的痛苦。他也希望他們兄弟之間都可以相敬友愛，以後家庭方可和樂融融。這篇家書字裡行間都透露著陶淵明對兒子真心溫暖的愛護。另外，陶淵明也曾撰寫〈五孝傳〉以及編錄〈四八目〉¹⁹⁴。〈五

¹⁹⁴ 楊勇引潘石禪新箋：「〈聖賢群輔錄〉，本名〈四八目〉，宋以前蓋未有稱『聖賢群輔錄』者。……

孝傳》由五篇傳贊組成——〈天子孝傳贊〉、〈諸侯孝傳贊〉、〈卿大夫孝傳贊〉、〈士孝傳贊〉以及〈庶人孝傳贊〉，序列歷史上作為孝道典範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人與庶人，反映陶淵明對當時整體社會結構的理想，也顯示陶淵明並不反對以孝道為核心的君臣名分。至於〈四八目〉，齊師作出以下的觀察：

〈四八目〉的性質，應該是一部以人物品目、品狀為綱，以時代先後為緯的一部通史綱要，上起三皇時代燧人氏四佐、伏羲氏六佐，下至東晉的王導、王敦（琅邪八王），王承、王述、王坦之（太原王），杜乂（京兆杜）等人。這一部通史綱要，不以皇帝諸侯為核心，而是以輔佐大臣為主脈，並突顯有操行可稱頌的特立獨行之士。陶淵明網羅古今，汰選出四百位具代表性的人物，以為「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¹⁹⁵

由此可見，陶淵明並未排斥傳統聖君賢臣的理念，而且汲汲想序列真正合乎儒家禮教的人物。

實際上，竹林名士反對「名教」是為了抵抗威權，而不是反對建立儒家和諧與道德的社會秩序。因此竹林名士的主張與後來袁宏重新定義的「名教」本質上是不衝突的，僅僅是兩者的側重不同，前者主張打假，後者則欲樹立儒家真精神。陶淵明的行事作風以及其作品往往同時反映竹林名士與儒家精神。雖然陶淵明的任誕沒有竹林名士來得激烈，不過這是因為他的知名度不及當時的竹林名士，所以也沒有如竹林名士一般被覬覦。儘管如此，陶淵明借率任作風以求自存的行徑，

『聖賢群輔錄』蓋出於後人所改題，非其本名如此也。」同註 100，頁 323。

¹⁹⁵ 齊師益壽：〈陶淵明的儒者襟抱與獨立精神〉，《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4月），頁 67。

過去〈四八目〉是否為陶淵明所著備受爭議，齊師文立基於潘重規氏〈聖賢群輔錄真偽辨〉一文（《大陸雜誌》第 19 卷，第 10、11 期合刊（1964），頁 104。），以為〈四八目〉為陶淵明所著。

本文將採齊師與潘氏之論。

還是有跡可尋。可以說陶淵明既不違名教，也崇尚自然，出處之間的矛盾則帶給他深刻的反思，以及諧趣的表達。



第四節 小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歷一場思潮的變革，處於主導的儒家思想式微，道家思想崛起，深刻地影響著時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魏晉南北朝人的人生態度與生活風貌可上溯到東漢末期。張師蓓蓓對於東漢後期士人的生活態度有一番觀察。張師以爲三國成立以後皆行法，是時戚宦也都被剷除，執政集團管控士人過問政治，士人因此必須在新時代中找到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此時，曹操順應時代潮流，標榜用人以才，進一步促使士人對「才」的重視，從此文學、藝術，包括書法、音樂、彈棋都受到追捧，個人的姿貌也獲得重視，清談自然不在話下。¹⁹⁶針對清談，張師曰：

魏世，「清談」也因為既可以炫示名士的風雅，又可以表現個人的才情，遂在清流原已奠立的基礎上大大地發達起來。士人原是為清談而清談，重點在談之本身，談什麼反倒不是重要的問題。¹⁹⁷

清談的流行也促使諧趣蓬勃地發展，因為清談提供一個高能見度的場合，讓士人有機會展露自己的「才」。於是諧趣作為一種話術便大派上用場。尤其是自娛娛人與諷刺或攻擊他人的諧趣，因為要製造詼諧的效果，諧趣就必須出乎意料，帶給聽者驚喜，只有機智且才學兼備者才有能力駕馭，因此人人爭相發揮諧趣，連童言童趣的詼諧也備受青睞，一代又一代的名士就是在如此重視諧趣的氛圍下成長成熟。其實不止清談場合，任何社交的場合，諧趣都佔據了時人的對話，上從

¹⁹⁶ 請參見張師蓓蓓：《東漢士風及其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5年6月），第四章「東漢士風的轉變（二）」之第二節「士人的生活態度」。

¹⁹⁷ 同註 196，頁 162。

皇帝與朝臣之間，下至士人宴飲與家庭生活，成功的諧趣都成為人人稱頌的美談。諧趣的功能多樣，從聯絡彼此感情、化解尷尬，到打趣、訕笑、譏刺他人，諧趣成為交際場上的工具，同時也是利器。



諧趣在社交場合自然很好發揮，然而滋長諷刺或攻擊他人的諧趣的土壤則是當時政治與社會的亂象（參見第三章第三節）。時人於是撰文或在各種場合，藉諧趣諷刺或攻擊製造荒唐現象的執政者或始作俑者。諧趣中的各種譬喻提供作者一個保護傘，同時又能夠把諷刺的對象與各種低賤的物件相提並論，藉此以貶低與諷刺目標人物。因此有許多文章看似天馬行空，實則意有所指，寓意甚深。撰文是其一，另外一種表現為時人出於道德公心，對某人某事，作出精闢的評斷。這類評論通常淬鍊成一句話或一段順口溜，恥笑製造亂象之罪魁禍首。諧趣作為一個話術以及行文的筆法，進可攻，退可守，所以得到時人的青睞。

關懷大我，〈滑稽列傳〉式的諧趣在此時期較為少見，但並非絕迹。此期只有在類似《世說新語》語錄式的記載中，可以看到這種諧趣的例子。由於當權者無意讓士人過問朝政，促使他們參與政治的意願降低，所以使用大我無私的諧趣進行進諫的機會也就隨之降低。士人轉而投入成就自我價值，排斥責任的束縛，導致當時就算有官職在身也無心事業的風氣，這也可能造成這類諧趣逐步減少：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政事篇〉18條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任誕篇〉28條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余嘉錫按曰：「《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劉謙《晉紀·應詹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¹⁹⁸王濛、劉惔、周顛、王徽之大抵皆「望白署空」之輩，兢兢業業於公務者不但成為他們嘲諷的對象，而且因為名氣沒有這些名士響亮，所以他們就算運用這類諧趣，也可能不會得到矚目而被記錄下來。這種社會氛圍也反映時人更樂於投注精力在自娛娛人以及攻擊諷刺他人的諧趣上，多過運用諧趣來進行諷諫行為。雖然如此，在重大的議題中，時人偶而還是會善用大我無私的諧趣，如諷諫晉武帝不要立晉惠帝為儲君便是一例。另外，若可較完整地序列謝安個人事蹟，也可發現謝安是一位真正善於運用大我無私諧趣之人。

最後，以任誕求自存的諧趣在西晉時代，曾經被竹林名士中的阮籍與劉伶發揮地淋漓盡致。嵇康、阮籍不滿當時虛偽文飾的社會風氣以及曹氏司馬氏篡竊相承，因而反抗社會虛偽的「名教」。竹林名士名氣大，成為當權者極力籠絡的對象。嵇康不願接受招攬而喪命，阮籍及劉伶為了自存，不惜以任誕作風來避免與當權者起正面衝突。時至東晉，袁宏等人給「名教」注入儒家的道德養分，把「名教」重新定義為以儒家為基礎的君臣父子的名分教化，來匡正社會秩序。自此，竹林名士重自然的主張與袁宏等人的理論基礎得到融合。東晉末，陶淵明的任誕行為及作品不及竹林名士一般極端，一來也是因為他的名氣沒有竹林名士大，所被覬覦的程度也不如竹林名士。在自然與名教達到融合的社會氛圍下，他的率任行為既如竹林名士一般，追求自然，排斥「名教」，其作品卻也認同以儒家道德

¹⁹⁸ 同註 29，頁 211。

為基準的君臣父子名分。

要之，諧趣的興盛與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及社會氛圍息息相關。作為一種話術或者透過詼諧任誕行徑傳達訊息的載具，諧趣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可發揮的空間甚大，所以受青睞。然而，關懷大我，〈滑稽列傳〉式的諧趣由於發揮的政治空間受到壓縮，相較之下就顯得少見；任誕作風在此期十分常見，大多乃自娛娛人及追逐流行的產物。以任誕求自存的諧趣則以竹林名士發揮地最極至，後代人物如陶淵明隨著時過境遷，已沒有竹林名士當時的極端色彩了。

第五章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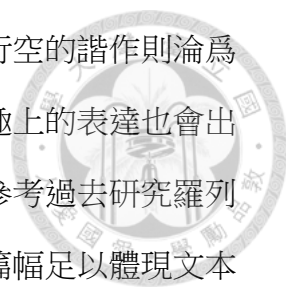


諧趣乃中國文學較冷僻之領域。對諧趣或幽默作較系統性討論的，要數林語堂的〈論幽默〉。林氏雖針對中國的幽默追本溯源至先秦諸子，尤其是莊老二子，對竹林名士與陶淵明只有寥寥數語，以為中國的真正的幽默文學應於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¹⁹⁹霎時間，南北朝諸士便湮沒在茫茫人海中，當時的諧作也淪為無足輕重的次品。現有關於中國諧趣的研究，包括林氏的〈論幽默〉，往往過於注重古人所呈現的機智才華與遊戲精神。這兩方面固然可貴，可是若以為魏晉南北朝的諧趣僅以此二方面的展開，無論廣度及深度都有可拓展的空間。這個時代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本來大一統的朝代走向分崩離析，群雄逐鹿中原，權臣潮起潮落，有些一步登天，更多的則一敗塗地。本來儒家思想為漢代絕對的主導地位，這個時代卻拒絕了溫良恭儉讓與君君臣臣，轉而投向夢蝶適志與神龜曳尾。在政治與社會承受如此巨變的大環境中，難道當代人只懂得沉溺在自得其樂的才智遊戲中，醉生夢死乎？過去的研究儘管也注意到諧趣用於諷刺的面向，卻沒有把利用諧趣挖苦、中傷他人，與用於諷諫的諧趣作區別。劉勰早在《文心雕龍·諧謔篇》已將〈滑稽列傳〉的諷諫傳統與後代的「詆嫚嫪弄」及拊笑衽席的嘲調區分，後來的研究實應對此作更深入的討論。另外，諧趣又常是時代中各種各樣問題的反影，也不只是單純的戲笑而已。

若要深入探析中國的諧趣，就不得不借助西方的幽默理論，因為畢竟西方在這方面琢磨已久，理論系統也相對成熟。因此要著手討論中國諧趣，必須先爬梳西方三大幽默理論，以資借鑑，也可為後來研究中國諧趣的學者提供一些理論基礎的簡介。西方的理論有助於解構諧趣，從每一個參與者的角度出發，去關照諧趣的本質與運作，從而理解參與者的目的。若沒能解構諧趣，理解不協調處所發

¹⁹⁹ 參見林語堂：〈論幽默〉，《無所不談合集》（上）（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5年），頁289-

302。



揮的角色，則諧趣容易被視作區區的遊戲精神，那些乍似天馬行空的諧作則淪為任誕風氣之下的無稽之談。由於文章及言語的媒介不同，在諧趣上的表達也會出現差異，故本文把諧作與情景諧趣分述處理。諧作的篩選主要參考過去研究羅列的文章，其中有缺文的文章絕大多數被摒除在外，除非現有的篇幅足以體現文本之內容與諧趣的特質，如喬道元的〈與天公牋〉。另外，當代的笑書也被摒除在本文關照之外，因為其中有大量的散佚與截取問題。但凡笑書由作者一人編撰，只能反映作者個人的旨趣，若要從笑書中窺豹當時的諧趣風尚，則笑書的數量必須充足。現存由魏晉南北朝人編撰的笑書只有魏人邯鄲淳（?-?）的《笑林》，²⁰⁰有關這個時代的笑話多為後人所收輯，反映的也是後人的觀點，因此在數量上笑書實在無法提供足夠的材料，去觀照當時諧趣的風尚。情景諧趣方面則主要取自《世說新語》以及《南北朝新語》，因為此二書的史料集中，對理解當代人的生活形態、人物的英姿有許多生動的刻畫，所以有助於收集情景諧趣的條目。這些條目會進而與諸史籍與類書核對，然後進行比對與分析。

中國古人很早就視諧趣為一種話術、撰文的技巧，或為傳達訊息的載具，在諧趣本質的議題上，反而沒有多大琢磨。晚至南朝梁時期，劉勰〈諧謔篇〉才序陳從先秦到兩漢，最後至魏晉以降，諧趣的起伏變化，同時也把各個時代的諧趣分作上中下等，以太史公〈滑稽列傳〉為最優，魏晉溺者妄笑之屬為最劣。西方則不然，西方的對幽默本質的研究與玩味甚早，所以理論基礎較多元厚實。儘管如此，由古希臘先哲提出的優越理論也馳騁了兩千多年。這派理論多以取笑、諷刺、攻擊他人的幽默為其基礎，以為幽默是幸災樂禍的產物。優越理論並不適用於中國古代的諧趣，很多諧作的撰者都不是保持幸災樂禍的態度，他們往往對時下的政治社會憂心忡忡，悲憤不已。到十九世紀，解放理論由一些有醫學背景且非純哲學家出身的學者提出，他們的理論多琢磨與幽默相關的生理及心理反應。

²⁰⁰ 此書也不全，大部分由後人收輯，參見王利器、王貞珉選編：《中國笑話大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1月），頁1。

解放理論，尤其是佛洛伊德的理論是以關照心理層面的問題出發，以資精神分析，故這派理論重視無目的，即「單純性」詼諧，認同它們在突顯詼諧問題上的價值。²⁰¹中國諧趣的取向與這個觀點也是南轅北轍，〈滑稽列傳〉的人物無一言一行不經過設計，魏晉以降的諧作也是撰者深思熟慮以後的產物，因此解放理論與中國諧趣在側重上是有分歧的。這是由於西方的幽默理論往往不注重被取笑的對象之反應，可是中國的諧趣既然是一話術或撰文的技巧，被取笑的對象不是一缺席的角色，其地位不亞於製作諧趣的一方，這也是東西方在文化上截然不同的選擇。比解放理論稍早的是出現在十八世紀的不協調理論，這派理論注意到幽默或諧趣的內容往往有兩個相左或相互矛盾的元素相互激發，說者透過打破聽者的期待，製造驚喜而催發愉悅感。這派理論能針對幽默或諧趣的內容展開論述，不似解放理論一般著重在單純性詼諧，所以成為本文解析諧趣內容主要的依據。

諧趣通常有三個參與者——說者、聽者、旁觀者。說者是製作諧趣的人，他發現一個負面且違背常規準則或道德典範的人事物，然後捅破這個他人未發現的現象或沒有想到的觀點；聽者是被說者打趣，付出顏面代價的對象；旁觀者如其名，是在一旁收穫諧趣愉悅感的第三方受益者。如果付出顏面代價是說者本人，這則屬於說者自嘲。至於說者製作諧趣的目的，劉勰在〈諧譏篇〉列舉了三個——諷諫他人、自娛娛人、諷刺他人。諷諫他人即如〈滑稽列傳〉中的人臣，運用諧趣進諫以匡正人君的觀念與行為。人臣透過諧趣的愉悅感，向人君傳達善意，藉此使人君更容易接受進諫的內容。自娛通常是終端的目的，是自利的；娛人則在利他之餘，說者有所圖，或希望取悅對方，或為了讓當下氣氛融洽。諷刺他人的諧趣則是說者為了攻擊聽者而進行嘲諷，說者可能企圖報復或為了伸張正義，

²⁰¹ 佛洛伊德：「單純性詼諧對我們來說肯定要比傾向性詼諧有價值得多。淺顯詼諧比深奧詼諧也更有價值。單純的和淺顯的詼諧可能會以最純正的形式向我們說明詼諧的問題，因此有了這些詼諧，我們不僅能避免自己被其目的弄糊塗。而且也能避免其合理的含義吧我們的判斷引入歧途。」同註 8，頁 136。

所以藉諧趣揭露對方的醜態。第四種目的不見於〈諧謔篇〉，是以荒誕的行徑求自存。說者有意一再以荒誕狀示人，目的是爲了消弭他人的覬覦。這四種目的均可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諧趣。

魏晉南北朝的諧作多以自娛娛人以及諷刺或攻擊他人爲目的，諷諫他人的諧作相當罕見。這個趨勢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及思潮的轉變息息相關。從東漢末開始，當權派對虛偽文飾趨之若鶩，一批批的人君與權臣上下交相賊，篡竊之事一再上演。當權派汲汲集中權力，打壓忠良，於是有志之士紛紛心灰意冷，門閥子弟投注忠誠的對象從人君轉到家族。虛偽文飾的追崇逐漸撼動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道家思想遂崛起。諧趣在此時代會如此興盛，與道家思想的崛起有莫大的關係。

《道德經》善用兩極的概念闡述義理；《莊子》進一步突顯各種矛盾之處，兩極的概念及矛盾之處正是諧趣運作所仰賴的元素。另一方面，擁抱道家思想促使時人放棄禮法禮制的單一性、約束性，轉而投入道家的多樣性、開放性思想，他們打破過去道德典範的條條框框，不再唾棄低俗的題材或拘泥於高雅的筆法，也無懼冒犯他人。

在撰文方面，時人常在現有的公文文體上，以奇幻的人物與角色以及虛構的情節，撰寫天馬行空的内容，藉此與公文的正式性質、莊重感形成衝突，製造出極大的反差、不協調。他們對過往不足為道的人事物產生莫大的興趣，進而不遺餘力地刻畫，也不惜衝撞現有禮儀、體面，對他人敢於冒犯，自己丟臉的事也可寫入諧作。於是，在題材與筆法上，時人皆作出極大的拓展。

由於道家多樣性與開放性思想，時人不再僅僅將目光投注在傳統所提倡的修身養性，而更積極於內觀自我的特質，進而外擴到品鑒他人的才學天賦。於是，人倫品鑒成爲全民運動。時人重視天才，所以幼童機智的問答及行爲反應，常被解讀成諧趣。在社交場合，諧趣能化解尷尬、透過打趣他人營造融洽氣氛，也因此成爲展現個人才華的工具，因爲一段成功的諧趣仰賴說者的機智。這個時期最常出現的是自娛娛人以及攻擊他人的諧趣。這兩類諧趣的界限往往模糊，所以常

常同時出現在同一段諧趣中。這兩類諧趣常見的理由也因為時人的社交發達，尤其因為清談之風鼎盛，時人喜露才揚己，而這兩類諧趣不但可以滿足他們展現才華的意圖，也可以用於凌駕他人，並且也最好發揮，所以最受歡迎。由於當時的名士頗以個人的品性天稟、門閥家族、出身的地域為榮為傲，所以個人的形貌、神采、姓氏、父祖名諱、南北地域成為時人樂此不疲的諧趣題材。諧趣深入魏晉南北朝的方方面面，使此期人物的人格特質與生活形態躍然紙上。

用於諷諫的諧趣在此時期少見。雖然出於道德公心，時人偶亦勇於評論當時寡廉鮮恥的權貴與官吏，這些評論通常都濃縮成精闢的一句話或一段順口溜，形成當時的輿論，但是這畢竟是爲了恥笑他們的所作所為，不能算作是關懷大我的諧趣。士人對參與政治一事意興闌珊，導致這類諧趣減少。以荒誕求自存的諧趣由魏末西晉初，竹林名士的阮籍與劉伶發揮地最徹底。竹林名士爲了反抗權貴篡竊，以及社會虛偽文飾成風，所以重自然而輕名教，形成自然與名教之爭。然而，到了東晉，歷經王衍、樂廣，尤其是袁宏，終於以儒家父子君臣的名分為自然，使自然與名教得到融合。這也反映在後代以率任求自存的陶淵明身上。陶淵明既以荒誕狀示前來遊說他用世之人，然而其作品卻也不乏認可儒家父子君臣名分的思想。

要之，正如叔本華所言——發笑與詼諧的對立面是認真。儒家思想成爲這個時代的認真，提供言行與人格體面的道德準繩。然而，提倡這些典範的菁英權貴在歷次朝政的篡奪謀算中，均違背了儒家的精神，政治與社會的虛偽文飾使得時人走向幻滅，家族門第取代國家朝廷，成爲時人投誠的對象，成就自我變成時人第一順位的人生目標，儒家思想正式退出當代的主流思想。道家思想則在此時提供了新養分，其「兩極」概念突顯各種不協調與矛盾，成爲建構本時代諧趣的骨幹成分。於是，在創作、舉止言行、日常生活等方面，鯤鵬之士紛紛戴上蝸鳴的面具，洋洋灑灑地調侃、諷刺、挖苦、諷諫，鑄成一個時代繽紛粲然，同時又沉重深刻的諧趣風尚。

以上即魏晉南北朝的諧趣風尚。在回應時代窘境的時候，魏晉南北朝人選擇含笑作樂，含怒笑罵。雖然劉勰以為當時多「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可是在妄笑與狂歌中，又有多少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酸與無奈？劉勰會如此評價不是沒有道理，且看：

郝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品藻篇〉29條


劉惔多麼詼諧，又多麼刻薄。嵇康就算反抗司馬氏有理，厭惡虛偽文飾有理，〈與山巨源絕交書〉就算再詼諧有趣，它也是一封十分刻薄的書信。諧趣是可以娛人，也可以傷人，所以劉勰才評之「有虧德音」。諧趣可以是一道甜味劑，把苦不堪言的人間荒唐事，變得沒那麼苦澀，沒那麼難堪，讓人可以笑著接受殘酷的真相；可是詼諧與刻薄往往也只是一線之隔。也因為如此，太史公的見識才可貴。太史公給予這個利器最崇高的用途——諧趣可用以載道，導人向善。這大抵是諧趣在古今中外最良善的用意了。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 ◇ 〔漢〕司馬遷著、〔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日本〕有井範評補標，《補標史記評林》（第五冊）（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3月）。
- ◇ 〔漢〕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
- ◇ 〔後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清〕錢大昕考異：《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3月）。
- ◇ 〔三國〕王弼著：《老子王弼注》，《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 〔三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1989年）。
- ◇ 〔三國魏〕阮籍著、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
- ◇ 〔三國魏〕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4月）。
- ◇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2月）。
- ◇ 〔晉〕陸雲著、劉運好校注整理：《陸士龍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12月）。
- ◇ 〔東晉〕葛洪著、陳飛龍註譯：《抱朴子外篇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
- ◇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6月）。
-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8月）。
- ◇ 〔南朝梁〕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10月）。
- ◇ 〔隋〕姚察、〔唐〕魏徵、姚思廉同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梁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80年）。

- 
- ✧ 〔唐〕魏徵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隋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2月）。
 - ✧ 〔唐〕房玄齡等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新校本晉書一百三十卷》（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79年2月）。
 - ✧ 〔唐〕房玄齡等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75年6月）。
 - ✧ 〔唐〕李延壽撰、〔民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85年3月）。
 - ✧ 〔唐〕李延壽撰、〔民國〕楊家駱：《新校本南史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11月）。
 - ✧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月刊社，1984年9月）。
 - ✧ 〔宋〕洪興祖撰：《楚辭補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9月）。
 - ✧ 〔明〕吳訥著：《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6月）。
 - ✧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6月）。
 - ✧ 〔明〕陳懋仁：《文章緣起注》，《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6月）。
 - ✧ 〔明〕林茂桂撰，詹子忠評，高洪鈞校注：《南北朝新語》（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 ✧ 〔清〕趙翼撰：《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9月）。
 -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日本：中文出版社，1981年6月）。
 - ✧ 〔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民 71.10.（1982.10.））。
 - ✧ 王叔岷撰：《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4月）。
 - ✧ 王叔岷撰：《莊子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
 - ✧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
 - ✧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9月）。
 - ✧ 楊勇著：《陶淵明集箋》（臺北：學術資料編印館，1970年4月）。

二、現代著作

(一) 專書


- ✧ 王能憲著：《世說新語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 ✧ 王利器、王貞珉選編：《中國笑話大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1月）。
- ✧ 仇國華：《秦漢魏晉南北朝奏議文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4月）。
- ✧ 牟宗三著：《才性與玄理》（臺北：學生書局，1980年3月）。
- ✧ 江建俊主編：《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7月）。
- ✧ 李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 ✧ 沈謙著：《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7月）。
- ✧ 姜亮夫著：《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 唐翼明著：《魏晉卿談》（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0月）。
- ✧ 張蓓蓓：《中古學術論略》（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5月）。
- ✧ 張蓓蓓：《東漢士風及其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5年6月）。
- ✧ 張蓓蓓：《魏晉學術人物新研》（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
- ✧ 遼耀東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2月）。
- ✧ 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二）（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9月）。
- ✧ 曹道衡編選：《漢魏六朝文精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
- ✧ 葉國良著，《禮制與風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
- ✧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03月）。
- ✧ 蔣伯潛編著：《文體論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42年6月）。
- ✧ 錢穆著：《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年11月）。
- ✧ 錢穆著：《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 ✧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6月）。
- ✧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1年2月）。
- ✧ 錢穆：《莊老通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

-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7月）。
- ✧ 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 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2月）。
- ✧ 蕭虹著：《世說新語整體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
- ✧ 顧實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6月）。

（二）單篇論文

- ✧ 尤雅姿：〈《世說新語》所表現之幽默現象及其意義之探討——從美學的觀點出發〉，《興大文史學報》第26期，1996年6月。
- ✧ 尤雅姿：〈從劉勰《文心雕龍·諧隱》探討傳統滑稽文學的生態結構與理論特點〉，《慶祝王更生教授嵩壽紀念文集》，臺北：文史哲，1997年。
- ✧ 阮芝生：〈滑稽與六藝——《史記·滑稽列傳》析論〉（臺灣：臺大歷史學報，20期85年11月）。
- ✧ 林語堂：〈論幽默〉，《無所不談合集》（上）（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5年）。
- ✧ 周鳳五：〈由文心辯騷詮賦諧謔論賦的起源〉，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文心雕龍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88年）。
- ✧ 張蓓蓓：〈《文選》與漢代文學傳統〉，《《文選》與中國文學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2011年8月。
- ✧ 唐長孺：〈清談與清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
- ✧ 廖蔚卿：〈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
- ✧ 潘重規：〈聖賢群輔錄真偽辨〉，《大陸雜誌》第19卷，第10、11期合刊（1964年）。
- ✧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魏晉思想》（乙編三種）（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8月）。
- ✧ 顏瑞芳：〈從《文心雕龍·論說》看唐宋說體寓言〉，《《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3月）。

（三）西方理論

- 
- ◇ 〔古希臘〕柏拉圖著，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 ◇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譯：《尼各馬科倫理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1月）。
 - ◇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著，傅東華譯：《詩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2月）。
 - ◇ Morreal, John. *The Philosophy of Laughter and Humo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 ◇ Freud, Sigmund 原著，彭舜、楊韶剛翻譯：《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臺北：胡桃木文化，2006年）。
 - ◇ Freud, Sigmund,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New York: The Norton Library, 1963.
 - ◇ Freud, Sigmund, translated by Brill, A.A., *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16
 - ◇ 霍布士著，朱敏章譯：《利維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 ◇ 康德著，牟宗三譯註：《判斷力之批判》（臺灣：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 ◇ 叔本華著，林建國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1月）。
 - ◇ Schopenhauer, Arthur, translated by E.F.J. Payne,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66

（四）博士論文

- ◇ 林佳燕：《世變、迂迴、荒唐之言——六朝諧隱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五）工具書

-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
-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 〔宋〕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

- ✧ 宗福邦、陳世鏐、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
- ✧ 張其昀監修，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71年6月）。



（六）網絡資源

- ✧ 小學堂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圖目錄

- ✧ 圖表 1：諧趣的結構，頁 27。

